

诗 歌

记 录

现在又到了灯亮的时候，
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
倒像清醒了，伸一个懒腰，
挣脱了怪沉重的白日梦。
从远处送来了一声“晚报！”
我吃了一惊，移乱了脚步，
丢开了一片皱折的白纸：
去吧，我这一整天的记录！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

傍 晚

倚着西山的夕阳，
和呆立着的庙墙，
对望着：想要说些什么呢？
怎又不说呢？驮着老汉的瘦驴
匆忙地赶回家去，
忒忒的，足蹄敲打着道儿——
枯涩的调儿！
半空里哇的一声，
一只乌鸦从树顶
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
依旧息下了。

一九三 年

（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寒 夜

一炉火。一屋灯光。
老陈捧着个茶杯，
对面坐的是老张。
老张衔着个烟卷。
老陈喝完了热水。
他们（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烟飘荡的
消着，又（像带着醉）
看着煤块很黄的
烧着，他们是昏昏
沉沉的，像已半睡……
！哪儿来的钟声？
又一下，再来一下……
沙沙，有人在院内
跑着：“下雪了，真大！”

一九三 年

(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个闲人

太阳偏在西南天的时候，
一个手叉在背后的闲人
在街路边，深一脚，浅一脚，
一步步踩着柔软的沙尘。
沙尘上脚印也不算少，
长的短的方的尖的都有。
一个人赶过去了又一个，
他不管，尽是低着头，低着头。
啊哈，你看他的手里
这两颗小核桃，多么滑亮，
轧轧的轧轧的磨着，磨着……
唉！不知磨过了多少时光？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一个和尚

一天的钟儿撞过了又一天，
一个和尚做着苍白的深梦：
过去多少年留下来的影踪
在记忆里看来就只是一片
在破殿里到处迷漫的香烟，
悲哀的残骸依旧在香炉中
伴着一些善男信女的苦衷，
厌倦也永远在佛经中蜿蜒。
昏沉沉的，梦话沸涌出了嘴，
他的头儿又和木鱼儿应对，
头儿木鱼儿一样空，一样重；
一声一声的，催眠了山和水，
山水在暮蔼里懒洋洋的睡，
他又算撞过了白天的丧钟。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影 子

一秋天，唉，我常觉得
身边仿佛丢了件什么东西，
使我更加寂寞了：是个影子，
是的，丢在那江南的田野中，
虽是瘦长点，你知道，那就是
老跟着你在斜阳下徘徊的。
现在寒夜了，你看炉边的墙上

有个影子陪着我发呆：
也沉默也低头，到底是知己呵！
虽是神情恍惚了些，我以为，
这是你暗里打发来的，远迢迢，
远迢迢的到这古城里来的。
我也想送个影子给你呢，
奈早已不清楚了：你在哪儿。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奈 何

(黄昏与一个人的对话)
“我看见你乱转过几十圈空磨，
看见你尘封座上的菩萨也做过，
你叫床铺把你的半段身体托住
也好久了，现在你要干什么呢？”
“真的，我要干什么呢？”
“你该知道吧，我先是在街路边，
不知怎的，回到了更清冷的庭院，
又到了屋子里，又挨近了墙跟前，
你替我想想看，我哪儿去好呢？”
“真的，你哪儿去好呢？”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群 鸦

啊，冷北风里的群鸦，
哪儿去，哪儿去，
哪儿是你们的老家？
啊，冷北风里的群鸦
落叶似的盘旋，
要降下了又不降下。
啊，冷北风里的群鸦，
活该！你们领着
惨淡的寒天来干吗？
啊，冷北风里的群鸦，
也罢，给我衔去，
衔去我扔掉的残花！
啊，冷北风里的群鸦
飘远了，一点点
消失在苍茫的天涯。
一九三 年
(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远 行

如果乘一线骆驼的波纹
涌上了沉睡的大漠，
当一串又轻又小的铃声
穿进了黄昏的寂寞，
我们便随地搭起了篷帐，
让辛苦酿成了酣眠，
又酸又甜，浓浓的一大缸，
把我们浑身都浸遍：
不用管能不能梦见绿洲，
反正是我们已烂醉；
一阵飓风抱沙石来偷偷
埋了我们倒也干脆。

一九三 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投

独自在山坡上，
小孩儿，我见你
一边走一边唱，
全都厌了，随地
捡一块小石头
向山谷中一投。
也说不定有人，
小孩儿，曾把你
（也不爱也不憎）
很好玩的捡起，
像一块小石头，
向尘世中一投。

一九三一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长 途

一条白热的长途
伸向旷野的边上，
像一条重的扁担
压上挑夫的肩膀。
几丝持续的蝉声
牵住西去的太阳，
晒得垂头的杨柳
呕也呕不出哀伤。
快点走，快点走吧，
那边有卖酸梅汤，
去到那绿荫底下，

喝一杯，再乘乘凉。
几丝持续的蝉声
牵住西去的太阳，
晒得垂头的杨柳
呕也呕不出哀伤。
暂时休息一下吧，

这儿好让我们躺，
可是静也静不下，
又不能不向前望。
一条白热的长途
伸向旷野的边上，
像一条重的扁担
压上挑夫的肩膀。
一九三一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酸梅汤

可不是？这几杯酸梅汤
怕没有人要喝了，我想，
你得带回家去，到明天
下午再来吧；不过一年
到底过了半了，快又是
在这儿街边上，摆些柿，
摆些花生的时候了。哦，
今年这儿的柿，一颗颗
总还是那么红，那么肿，
花生和去年的总也同
一样黄，一样瘦。我问你，
（老头儿，倒像生谁的气，
怎么你老不作声？）你说，
有什么不同吗？哈，不错，
只有你头上倒是在变，
一年比一年白了。……你看，
树叶掉在你杯里了。——哈哈，
老李，你也醒了。树底下
睡睡觉真有趣；你再睡
半天，保你有树叶作被。——
（哪儿去，先生，要车不要？）

不理我，谁也不理我！好，
走吧。……这儿倒有一大枚，

当时北平单铜板（十分钱）已少见，通用双铜板，叫“大枚”。——作者注

喝掉它！（老头儿，来一杯。）

今年再喝一杯酸梅汤，

最后一杯了。……啊哟，好凉！

一九三一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月 夜

月亮已经高了，

回去吧，时候

真的是不早了。

摸摸看，石头

简直有点潮了，

你看，我这手。

山是那么淡的，

灯又不大亮，

看是值得看的，

小心着了凉，

那我可不管的，

怎么，你尽唱！

一九三一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夜 风

一阵夜风孤零零

爬过了山巅

摸到了白杨树顶，

拨响了琴弦，

奏一曲“满城冷雨”，

你听，要不然

准是诉说那咽语——

冷涧的潺湲；

你听潺湲声激动

破阁的风铃，

仿佛悲哀的潮涌

摇曳着怆心。

啊，这颗心叮 响，

莫非，好朋友，

是你的？你这样

默默的垂头——

你听，夜风孤零零

走过了窗前，

踉跄的踩着虫声，

哭到了天边。

一九三一年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落

在你呵，似曾相识的知心，
在你的眼角里，一颗水星
我发现了，像是在黄昏天
当秋风已经在道上走厌，
嘘着长气，倚着一丛芦苇
天心里含着的摇摇欲坠
摇摇欲坠的孤泪。我真愁，
怕它掉下来向湖心里投。
那不要紧？可是我的平静——
唉，真掉下了我这颗命运！
一九三一年

(选自《鱼目集》，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望

小时候我总爱望夏日的晴空，
把它当作是一幅自然的地图：
蓝的一片是大洋，白云一朵朵
大的是洲，小的是岛屿在海中；
大陆上颜色深的是山岭山丛，
许多孔隙裂缝是冷落的江湖，
还有港湾像在望风帆的归途，
等它们报告发现新土的成功。
如今，正像是老话的沧海桑田，
满怀的花草换得了一把荒烟，
就是此刻我也得像一只迷羊，
带着一身灰沙，幸亏还有蔚蓝，
还有仿佛的云峰浮在缥缈间，
倒可以抬头望望这一个仙乡。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八月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新 秋

我道是谁呀，
灰淡的白云下
轻轻打着哨，
摸摸墙头草
又拉拉牵牛花，
一见我便溜，
那么样害羞！
原来是你呵，
一夜雨刚停住，

我还在床上，
你早来唱唱
又摇摇那小树，
等我走出来，
一笑又走开。
还只三天呢，
就跟我这样熟，
倚在我身边
看我学抽烟，
你倒像很寂寞，
陪你玩也好，

你可不要老。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八月

（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胡 琴

秋风里
冷静的街头
啾啾呀呀一阵
胡琴的哀愁
低诉与
脚踏落叶的行人。
不说话，
一个青年在
带些胡琴拉小调，
想叫哪个来
买一把，
有空好唱“笼中鸟”。
我尽走，
不想买胡琴，
痴看衰草在墙上，
寒鸦在树顶，
想寻求
算命小锣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十月

（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黄 昏

闷人的房间
渐渐，又渐渐
小了，又小，
缩得像一所
半空的坟墓——

啊，怎么好！
幸亏有寒鸦
拍落几个“哇”
跟随了风
敲颤了窗纸，
我劲儿一使，
推开了梦。
炉火饿死了，
昏暗把持了
一屋冷气，
我四顾苍茫，
像在荒野上
不辨东西，

乃头儿低着，
酸腿儿提着，
踱去踱来，
不知为什么
呕出了一个
乳白的“唉”。
一九三一年十月

（原载 1931 年《诗刊》第三期）

长的是

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树的，树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撑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墙上，晚照里的红墙上，
红墙也很长，墙外的蓝天，
北方的蓝天也很长，很长。
啊！老人，这道儿你一定
觉得是长的，这冬天的日子
也觉得长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来了，真不妨
一路谈谈话儿，谈谈话儿呢。
可是我们却一声不响，
只是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

一九三二年七月

（原载 1932 年《诗刊》第四期）

中南海

听市声远了，像江潮
环抱在孤山的脚下，

隐隐的，隐隐的，
比不上
满地的虫声像雨声，
更是比不上
满湖荷叶上的雨声像风声——
啊，轻轻的，轻轻的，
芦叶上涌来了秋风了！
我不学沉入回想的痴儿女
坐在长椅上
惋惜身旁空了的位置。
可是总觉得丢了什么了，——
到底丢了什么呢，
丢了什么呢？
我要问你钟声啊，
你仿佛微云，沉一沉，
荡过天边去。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雨中即景作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白石上

去吧，到废园去，
找一方白石、
不管从前作什么用的，
坐坐吧，坐下来
送夕阳下山，
一边听饶舌的白杨
告诉你旧事。
它也许告诉你
说从前有个人儿，
近黄昏，尤其在秋天，
常到这里来
倚在栏杆上
(你身旁从前有栏杆)
对夕阳低泣，
掩着两朵萎黄的红玫瑰；
说不久她埋到这里了，
可是若叫它指点给你看
是哪一抔黄土呢，
怨它老眼昏花了，

而且衰草已经藏去了
游人探访的足迹，
像迟暮的女子藏去了
绣花的腰带。

它也许还要说，
如果这方白石
早就躺在这里了，
你也许认得出
她的泪痕呢。
你细看白石，
只见长满了青苔，
仿佛半夜里
被秋风惊醒了
起来
用颤抖的手儿
揉揉酸溜溜的倦眼
在摇摇的烛影里
从箱子的深处
捡起来
多少年不忍想起的
一方素绢，
只见溅满了霉斑，
没有什么。
你抚摩它，
白石凉极了，

令你想起
从灯红酒绿中
飘出来的醉脸
不知在哪一条荒街上
淋到了冷雨。
不是雨，是风
起来了，可是很轻，
只能比叹息，
你不妨再坐一会儿
在白石上，
听浅湖的芦苇
（也白头了）
告诉你旧事
（近事吧）
一边看远山
渐渐的溶进黄昏去……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西长安街

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树的，树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撑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墙上，晚照里的红墙上，
红墙也很长，墙外的蓝天，
北方的蓝天也很长，很长。
啊！老人，这道儿你一定
觉得是长的，这冬天的日子
也觉得长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来了，真不妨
一路谈谈话，谈谈话儿呢。
可是我们却一声不响，
只是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这些影子，这些长影子？
前进又前进，又前进又前进，
到了旷野上，开出长城去吗？

仿佛有马号，是一大队骑兵
在前进，面对着一大轮朝阳，
朝阳是每个人的红脸，马蹄
扬起了金尘，十丈高，二十丈——
什么也没有，我依然在街边，
也不见旧的老人，两三个
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
(这是司令部？当年的什么府？)
他们像墓碑直立在那里，
不作声，不谈话，还思念乡土，
东北天底下的乡土？一定的！
可是这时候想也是徒然，
纵然想起这时候敌人的
几匹战马到家园的井旁
去喝水了，这时候一群家鸡
到高粱田里去徬徨了，也想
哪儿是暂时的住家呢。拍拍！
什么？枪声！打哪儿来的？
土枪声！自家的！不怕，不怕！……
可是蟋蟀声早已浸透了
青纱帐，青纱帐早已褪色了！
你想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明天再想吧，这时候只好
不作声，不谈话。低下头来吧。
看汽车掠过长街的柏油道，

多“摩登”，多舒服！尽管威风
可哪儿比得上从前的大旗

红日下展出满脸的笑容！
如果不相信，可以问前头
那三座大红门，如今怅望着
秋阳了。

啊！夕阳下我有
一个老朋友，他是在一所
更古老的城里，这时候怎样了？
说不定从一条荒街上走过，
伴着斜斜的淡淡的长影子？
告诉我你新到长安的印象吧，
（我身边仿佛有你的影子）
朋友，我们不要学老人，
谈谈话儿吧。……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海 愁

记得我告别大海，
她把我摇摇：
“去吧，一睡就远了，
游大陆也好。”
“不见我也不用怕，
如果你生病，
朋友也不在身边。
告我，托白云。”
“记好，我总关心你。

一定向蓝天
放出一小叶银帆
航到你窗前。”
如今我真想老家，
我埋怨白云；
他告我：“秋天到了，
大海也生病。”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过 节

叫我哪儿还得了这许多，
你来要账，他也来要账！
门上一阵响，又一阵响。
账条吗，别在桌子上笑我，

反正也经不起一把烈火。
管他！到后院去看月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苦 雨

茶馆老王懒得不开门；
小周躲在屋檐下等候，
隔了空洋车一排檐溜。
一把伞拖来了一个老人：
“早啊，今天还想卖烧饼？”
“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路过居

路过居在什么地方
你们问也不容易问到，
路过的很多，
却不大有人留心到
门上
一块满面云雾的木匾，
虽然它一定看过
几代人走过了。
大家只知道，
一条并不大
也并不荒凉的街上
有一家小茶馆：
一所小屋四个洞，
长的一个像嘴，
常常吸进拭汗水的，
吐出伸懒腰的；
方的三个像眼睛，
常常露出几个半身。

店主是谁
也不容易看出来，
里头的汉子
打扮
差不多全是一样，
衣服
也差不多全是一样

穿的蓝粗布，
到夏天
谁也赤膊；
而且有时候要水
这个去
那个也去
自动拿开壶。
他们平常是喝茶，
一边谈话；
有时候谈得
伸出大拳头捶桌子，
有时候大笑
直笑得坐也坐不稳了，
叫板凳也跳了，
一碗茶泼倒了，
泼到了谁脚上了，
那么骂，那么打，
打过了又哈哈的笑了；
有时候有人拉胡琴，

几个人围着他，要他唱，
他要唱又不唱了。
有时候也冷清清，
也许有一个年老的
抽旱烟，
喷出一口烟
又哼出一声长叹，
窗前
有一张《白话实事报》
被一阵怪风赶去了
追一片黄叶。
到黄昏
这儿也用电灯，
但只有一盏
而且很暗，
初看总以为
是仍然用油灯，
不过比别家小铺子
点得久。
在晚上
十一点光景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
有人在这儿
唱京调——

独自从市场回来的，
来得正好，你听：
“一马离了
西凉界……”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叫 卖

可怜门里那小孩，
妈妈不准他出来。
让我来再喊两声：
小玩艺儿，
好玩艺儿！……
唉！又叫人哭一阵。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一块破船片

潮来了，浪花捧给她
一块破船片。
不说话，
她又在崖石上坐定，
让夕阳把她的发影
描上破船片。
她许久
才又望大海的尽头，
不见了刚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只好送还
破船片
给大海漂去。
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几个人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口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登 城

朋友和我穿过了芦苇，
走上了长满乱草的城台。
守台的老兵和朋友攀谈：
“又是秋景了，芦苇黄了……”
大家凝望着田野和远山。
正合朋友的意思，他不愿
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
我对着淡淡的斜阳，也不愿
指点远处朋友的方向，
只说，“我真想到外边去呢！”
虽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
上哪儿去好，如果朋友
问我说，“你要上哪儿去呢？”
当我们低下头来看台底下
走过了一个骑驴的乡下人。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墙头草

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大 车

拖着一大车夕阳的黄金，
骡子摇摆着踉跄的脚步，
穿过无边的疏落的荒林，
无声的扬起一大阵黄土，
叫坐在远处的闲人梦想
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
腾云架雾去不可知的远方——

古木间涌出了浩叹的长风！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
(选自《三秋草》，1933年5月，新月书店)

还 乡

“大狗叫，小狗跳，”
阿西他们的声音也许在摇
窗外的杨柳。
什么！前头是奔牛站吗？
还有多少站？——一站两站……
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
电杆丈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
总喜欢向窗外发呆，
小时候我在教室里
常常把白云当作我的书页。
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
真的，火车头常使我
想起瓦特的开水壶。
“你瞧，壶盖动了，瓦特哥哥，
我知道你肚子里有鬼计，

别尽装瞌睡哪！”
奈端伯伯的瞌睡，
被一只苹果打断了！
“漂在海上的不是树枝吗，
哥伦布，哥伦布？”
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
可不是，孩子们窗口的天边
总是那么遥远呵。
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
电杆丈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
那时候老祖父最疼我。
老年人的身体是一只风雨表；
你瞧他眉头一皱天就阴了。
又到了什么站了？
我还记得：“好孩子，
抱你的小猫来，
让我瞧瞧他的眼睛吧——
是什么时候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北平
(原载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

寄 流 水

从秋街的败叶里

清道夫扫出了
一张少女的小影：
是雨呢还是泪
朦胧了红颜
谁知道！但令人想起
古屋中磨损的镜里
认不真的愁容；
背面却认得清
“永远不许你丢掉！”
“情用劳结，”
唉，别再想古代美女的情书
沦落在蒲昌海边的流沙里
叫西洋的浪人捡起来
放到伦敦多少对碧眼前。
多少未发现的命运呢？
有人会忧愁。有人会说：

还是这样好——寄流水。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芦叶船

古国的凉风
吹落了人手里的蒲扇，
浸在海里的人
也该上陆了，
脱下了游泳衣。
留下一两行足印
在沙滩上
让贝壳去盘据吧。
说是没有海螺壳，
顽皮的孩子还梦想
在海上回来的怀里
听海呢——
可以害羞了，
这时候只合看黄叶
在水上漂，
不再想
十年前的芦叶船
漂去了哪儿。

海外的远客
也厌看远帆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

(原载 1934 年 1 月 1 日《文学季刊》创刊号)

古镇的梦

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锣，
夜里是梆子。
敲不破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
敲沉了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
“三更了，你听哪，
毛儿的爸爸，这小了吵得人睡不成觉，
老在梦里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过桥，
敲锣的又过桥，
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一九三三年秋
(选自《汉园集》，1936 年 3 月，商务印书馆)

古城的心

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在晚上七点半的市场
(这还算是这座古城的心呢。)难怪小伙计要打瞌睡了，
看电灯也已经睡眼朦胧。
铺面里无人过问的陈货，
来自东京的，来自上海的，也哀伤自己的沦落吧？——一个异乡人走过
也许会想。得、得，得了，有大鼓！
大鼓是市场的微弱的悸动。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倦

忙碌的蚂蚁上树，
蜗牛寂寞的僵死在窗槛上看厌了，看厌了；
知了，知了只叫人睡觉。蟋蟀不知春秋，
可怜虫亦可以休矣！
至多像残余的烟蒂头
在绿苔地上冒一下蓝烟吧？被时光遗弃的华梦
该闭在倦眼的外边了。
一九三三年（选自《鱼目集》，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 窗

像一个中年人
回头看过去的足迹一步一沙漠，
从乱梦中醒来，听半天晚鸦。
看夕阳在灰墙上，想一个初期肺病者对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少年的红
晕。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入 梦

设想你自己在小病中
(在秋天的下午)
望着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与稀疏的树影，枕着一个远去了的人
留下来的旧枕，
想着枕上依稀认得清的淡淡的湖山
仿佛旧主的旧梦的遗痕，仿佛风流云散的
旧友的渺茫的行踪，
仿佛往事在褪色的素笺上正如历史的陈迹在灯下老人面前昏黄的古书
中……你不会迷失吗
在梦中的烟水？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烟蒂头

谈笑中扔掉一枚烟蒂头，
一低头便望见一缕烟
在辽远的水平线上——
不见了——天外的人怎样了？
这样想得糊涂的人
却正在谈笑的圈子外，
独守着砖地上的烟蒂头，

也懒得哼“大漠孤烟直”。

（附识）曾忆月前广田自北平来信云：“愈热闹时却又最容易想起一个阔别的人，于是在热闹中又常感到寂寞。”饭后烟余，孤坐有所思，草此寄海外人大刚与廷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保定。

（原载 1934 年 4 月 1 日《文学季刊》第 2 期）

春 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鸱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你哪
京都！——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
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还给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住，这实在没有什么；
那才是胡闹（可恨，可恨）：黄毛风搅弄大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飞，飞，飞，飞，飞，
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
扑到你的窗口，喷你一口，
扑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一枚炸弹——哈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

“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什么好笑，
歇斯底里，懂不懂，歇斯底里！悲哉，悲哉！

真悲哉，小孩子也学者头子，别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风筝，他也会“想起了当年事……”悲哉，听满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归去也，归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那才是胡闹，对不住；且看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昨儿天气才真是糟呢，
老方到春来就怨天，昨儿更骂天黄黄的压在头上像大坟，

仿佛记得厨川白村说过北京似马德里。

因想到我们当时的“善邻”而随便扯到，其实京都的天并不甚蓝，一九三五年在那里住了以后才知道。

老崔说看来势真有点不祥，你看漫天的土吧，说不定一夜睡了
就从此不见天日，要待多少年后后世人的发掘吧，可是
今儿天气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树也坐了独轮车游春，春完了又可以红纱灯下看牡丹。（他们
这时候正看樱花吧？）

天上是鸽铃声——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
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
决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

（原载 1934 年 7 月 1 日《文学季刊》第三期）

道 旁

家驮在身上像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骄傲于被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回来的哥哥的行篋。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显龙山

（选自《汉园集》，1936 年 3 月，商务印书馆）

对 照

设想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见道旁烂苹果得了安慰——地球烂了才寄生了
人类，学远塔，你独立山头对晚霞。今天却尝了新熟的葡萄，酸吧？甜吧？
让自己问自己，新秋味加三年的一点记忆，懒躺在泉水里你睡了一觉。

一九三四年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一卷五期）

水成岩

水边人想在岩上刻一点字迹：大孩子见小孩子可爱，
问母亲“我从前也是这样吗？”母亲想起了自己发黄的照片堆在尘封的
旧桌子抽屉里，想起了一架的瑰艳

藏在窗前干瘪的扁豆荚里，叹一声“悲哀的种子！”

“水哉，水哉！”沉思人忽叹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北平春天街头常见为豪门送花的独轮车。——作者注

北京旧时土语把留声机或唱机叫“话匣子”；滔滔不绝的讲话，也叫“开话匣”。——作者注

一九三四年八月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一卷五期)

归

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从热闹中出来听自己的足音。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

一九三五年一月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一卷五期)

距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

旧元夜遐思

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莫掀帏望远吧，如不想自鉴。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

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我不能陪你听我的鼾声。”是利刃，可是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报》国际新闻版伦敦二十五日路透电：“两星期前索佛克业余天文学家发现北方大力景座中出现一新星，兹据哈华德观象台纪称，近两日内该星异常光明，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云。”这里涉及时空的相对关系。

“寄来的风景，”当然是指“寄来的风景片”。这里涉及实体与表象的关系。

这行是来访友人（即未行的“友人”）将来前的内心独白，语调戏拟我国旧戏的台白。——作者注
本行和下一行是本篇说话人（用第一人称的）进入的梦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的《史地周刊》上《王同春开发河套讯》：“夜中驱驰旷野，偶然不辨在什么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灯一瞧就知道到了哪里了。”

《聊斋志异》的《白莲教》篇：“白莲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某一日，将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嘱门人坐守，戒勿启视。去后，门人启之。视盆貯清水，水上编草为舟，帆橈具焉。异而拨以指，随手倾侧，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师来，怒责‘何违我命！’门人力白其无。师曰，‘适海中舟覆，何得欺我！’”这里从幻想的形象中涉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

这里涉及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但整诗并非讲哲理，也不是表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采取近似我国一出旧戏的结构方式。——作者注

劈不开水涡：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独醒者放下屠刀来为你们祝福。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原载 1937 年 1 月 10 日《新诗》）

尺 八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一九三五车六月十九日

（原载 1935 年 11 月 22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圆宝盒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

装的是几颗珍珠：

一颗晶莹的水银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颗金黄的灯火

笼罩有一场华宴，

一颗新鲜的雨点

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古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行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虽然你们的握手

是桥——是桥！可是桥

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

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

或他们也许也就是

好挂在耳边的一颗

珍珠——宝石？——星？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曾写过一首诗，早作废，从未发表，结尾三行，可供参考：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不知两岸桃花已远。——作者注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原载 1935 年 12 月 16 日《文学季刊》二卷四期)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一九三五年十月(选自《鱼目集》，1935 年 12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音尘

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
就按在住户的心上：
是游过黄海来的鱼？
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
“翻开地图看，”远人说。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条虚线旁那个小黑点。如果那是金黄的一点，
如果我的坐椅是泰山顶，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
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选自《鱼目集》，1935 年 12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航海

轮船向东方直航了一夜，
大摇大摆的拖着一条尾巴，骄傲的请旅客对一对表——“时间落后了，
差一刻。”说话的茶房大约是好胜的，他也许还记得童心的失望——从前
院到后院和月亮赛跑。这时候睡眼朦胧的多思者

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度
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可是这一夜却有二百海里？”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选自《鱼目集》，1935 年 12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寂寞

乡下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蝓蝓；长大了在城里操劳，他买了一个夜明表。小时候他常常羡慕墓草做蝓蝓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选自《鱼目集》，1935 年 12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鱼化石

(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
(原载 1936 年 11 月 10 日《新诗》第二期)

第一盏灯

鸟吞小石子可以磨食品。兽畏火。人养火，乃有文明。与太阳同起同睡的有福了，可是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

一九三七年
(原载 1937 年 5 月 1 日《文学杂志》创刊号)

候鸟问题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你们去分吧。我要走。
让白鸽带铃在头顶上绕三圈——可是骆驼铃远了，你听。
抽陀螺挽你，放风筝牵你，叫纸鹰、纸燕、纸雄鸡三只四只飞上天——上天可是迎南来雁？而且我可是哪些孩子们的玩具？且上图书馆借一本《候鸟问题》。且说你赞成呢还是反对

飞机不得经市空的新禁令？我的思绪像小蜘蛛骑的游丝系我适足以飘我。我要走。等到了别处以后再管吧：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
空在屋顶上伸着两臂
抓不到想要的远方的音波！
一九三七年
(原载 1937 年 5 月 1 日《文学杂志》创刊号)

半 岛

半岛是大陆的纤手，遥指海上的三神山。小楼已有了三面水可看而不可饮的。一脉泉乃涌到庭心，人迹仍描到门前。昨夜里一点宝石
你望见的就是这里。用窗帘藏却大海吧，怕来客又遥望出帆。

一九三七年三月
(原载 1937 年 5 月 1 日《文学杂志》创刊号)

雪

法国保尔·艾吕亚有两行诗：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我们有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

从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纹溶溶，花纹也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浴》。

斯特凡·玛拉美《冬天的颤抖》里有“你那面威尼斯镜子……”一段。

鱼成化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近一点说，往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我们乃珍惜雪泥上的鸿爪，就是纪念。——作者注

不知道六出花如何结晶，
只见从早起一天的郁抑，
到晚来一杯过饱和溶液！
还等一声梆冷然的敲击？
任大家欣赏它的沉淀，
欣赏它随后展开的晴明，
天无言。善哉你临风感拜，虽然我瞥见你清泪盈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
(原载 1937 年 5 月 16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泪

巷中人与墙内树
彼此岂满不相干？
岂止沾衣肩掉一滴宿雨？人并非无泪，
而明白露水因缘。
你来画一笔切线，
我为你珍惜这空虚的一点，像珠像泪——
人不妨有泪。
一九三七年三月（原载 1937 年 5 月 16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车 站

抽出来，抽出来，从我的梦深处又一列夜行车。这是现实。古人在江边
叹潮来潮去；
“我却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孩子，听蜜蜂在窗内着急，活生生钉一只
蝴蝶在墙上
带点装点我这里的现实。
曾经弹响过脆弱的钢丝床，曾经叫我梦到过小地震，
我这串心跳，我这串心跳，如今莫非是火车的怔忡？
我何尝愿意做梦的车站！
一九三七年四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 年 5 月，明日出版社)

睡 车

睡车，你载了一百个睡眠；你同时还载了三十个失眠——我就是个，
我开着眼睛。撇下了身体的三个同厢客，你们飞去了什么地方？
喂，你杭州？你上海？你天津？我仿佛脱下了旅衣的老江湖此刻在这里
做了店小二。
一九三七年四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 年 5 月，明日出版社)

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两地友人雨，
我乐意负责。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明朝看天下雨今

夜落几寸。

一九三七年五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无题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一九三七年三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无题二

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一室的沉默痴念着点金指，门上一声响，你来得正对！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

一九三七年四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无题三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沾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一九三七年四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无题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昨夜付一片轻喟，
今朝收两朵微笑，
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门荐”或称“门垫”或“门毯”，国内早有此物，迄今尚无通用名称。——作者注

一九三七年四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无题五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一九三七年五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白螺壳

空灵的白螺壳，你，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掌心里波涛汹涌，
我感叹你的神工，
你的慧心啊，大海，你细到可以穿珠！
我也不禁要惊呼：
“你这个洁癖啊，唉！”请看这一湖烟雨
水一样把我浸透，
像浸透一片鸟羽。
我仿佛一所小楼，
风穿过，柳絮穿过，燕子穿过像穿梭，
楼中也许有珍本，
书页给银鱼穿织，
从爱字通到哀字——出脱空华不就成了！
玲珑吗，白螺壳，我？大海送我到海滩，万一落到人掌握，愿得原始人
喜欢：换一只山羊还差
三十分之二十八；倒是值一只蟠桃。怕叫多思者想起：空灵的白螺壳，
你卷起了我的愁潮——我梦见你的阑珊：檐溜滴穿的石阶，绳子锯缺的井
栏……时间磨透于忍耐！黄色还诸小鸡雏，青色还诸小碧梧，玫瑰色还诸玫
瑰，可是你回顾道旁，柔嫩的蔷薇刺上
还挂着你的宿泪。
一九三七年五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淘 气

淘气的孩子，有办法：
叫游鱼啮你的素足，
叫黄鹂啄你的指甲，
野蔷薇牵你的衣角……
白蝴蝶最懂色香味
寻访你午睡的口脂。
我窥候你渴饮泉水
取笑你吻了你自己。
我这八阵图好不好？
你笑笑，可有点不妙，
我知道你还有花样——
哈哈！到底算谁胜利？
你在我对面的墙上
写下了“我真是淘气”。

一九三七年

（原载 1937 年 7 月 10 日《新诗》二卷）

灯 虫

可怜以浮华为食品，小蠓虫在灯下纷坠，不甘淡如水，还要醉，而抛下露养的青身。多少艘艨艟一齐发，白帆篷拜倒于风涛，英雄们求的金羊毛终成了海伦的秀发。赞美吧，芸芸的醉仙光明下得了梦死地，也画了佛顶的圆圈！晓梦后看明窗净几，待我来把你们吹空像风扫满阶的落红。

一九三七年五月

（原载 1937 年 7 月 10 日《新诗》二卷）

足 迹

蜜蜂的细腿已经拨起了多少只果子，而你的足迹呢沙上一排，雪上一排，全如水蜘蛛织过的水纹？

一九三七年

（原载 1937 年 5 月 1 日《文学杂志》创刊号）

妆 台

（古意新拟）世界丰富了我的妆台，
宛然水果店用水果包围我，纵不费气力而俯拾即是，
可奈我睡起的胃口太弱？
游丝该系上左边的檐角。
柳絮别掉下我的盆水。
镜子，镜子，你真是可恼，让我先给你描雨笔秀眉。
可是从每一片鸳瓦的欢喜
我了解了屋顶，我也明了
一张张绿叶一大棵碧梧——看枝头一只弄喙的小鸟！
给那件新袍子一个风姿吧。“装饰的意义在失却自己，”谁写给我的话

呢？别想了——讨厌！“我完成我以完成你。”

一九三七年五月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水 份

蕴藏了最多水份的，海绵，容过我童年最大的崇拜，好奇心浴在你每个隙间，我记得我有握水的喜爱。然后我关怀出门的旅人：水瓶！让骆驼再多喝几口！愿你海绵一样的雨云

来几朵，跟在他们的尘后！云在天上，熟果子在树上！仰头想吃的，凉雨先滴他！谁教挤一滴柠檬，然后尝我这杯甜而无味的红茶？我敬你一杯。酒吧？也许是。昨夜我做了浇水的好梦：不要说水份是柔的，花枝，抬起了，抬起了，你的愁容！

一九三七年

（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路

路啊，足印的延长，
如音调成于音符，
无声有声我重弄，
像细数一串念珠。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记得在什么地方
我掏过一掬繁华，
走了十步，二十步：
原来是一朵好花！……
也罢，给埋在草里，
既厌了“空持罗带”。
天上星流为流星，
白船迹还诸蓝海。

一九三七年五月（选自《十年诗草》，1942年5月，明日出版社）

前方的神枪手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涡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前，你知道的，用不着回过头来，老人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孩子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妇女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每一颗子弹都不会白走一遭，后方的男男女女都信任你。趁一排子弹要上路的时候，请代替痴心的老老少少

多捏一下那几个滑亮的小东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修筑机场的工人

母亲给孩子铺床总要铺得平，
哪一个不爱护自家的小鸽儿、小鹰？我们的飞机也需要平滑的场子，
让它们息下来舒服，飞出去得劲。
空中来捣乱的给他空中打回去，
当心头顶上降下来毒雾与毒雨。
保卫营，我们也要设空中保卫营，
单保住山河不够的，还要保天宇。
我们的前方有后方，后方有前方，
我们的土地被割成了东一方西一方。我们正要把一块一块拼起来，
先用飞机穿织成一个联络网。

我们有儿女在华北，有兄妹在四川，有亲戚在江浙，有朋友在吉林，在云南……空中的路程是短的，捎几个字去吧：“你好吗？我好，大家好。放心吧，干！”所以你们辛苦了，不歇一口气，
为了保卫的飞机、联络的飞机。
凡是会抬起头来向上看的眼睛
都感谢你们翻动的一铲土一铲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地方武装的新战士

如今不要用草帽来遮拦
(就在你挡惯斜雨的地方)
这些子弹！这些是子弹！
卧下，就在养活你的地上！
像不采还没有成熟的水果，
别忙，保险盖且慢点拔起，
当心手榴弹满肚的愤火
按捺不住，吞没了你自己。
忧虑是多余了就是快慰：
谁作了石头变枪的奇迹？
谁用了汗来把田园养肥
又用了闯入者命定的苦血？
再报告“兵来了”自己也要笑，
不要兵你自己就做了兵。
踏倒了老庄稼要他赔新苗，
你保证了乡里来日的青青。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

有慌得用草帽来挡子弹的故事。

有太早拨开保险盖而出事的故事。

有在战斗中用石头换枪的故事。

有放哨的发现敌人而报告“兵来了”的故事。——作者注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一位政治部主任

不唤你，发明的，起来发挥
三点一直线的冲锋战术：
嘴上一块肉，筷上一块肉，
眼睛钉住了盘里另一块——
如果你睡了。睡眠更可贵：
案卷里已经跋涉了一宿。
“起身号。那我要睡了，”你说，问明了是什么角声在吹。
多睡一会儿。让他们去闹：
熏微中一朵朵紧张的面孔，
跑步，唱歌，练跳舞，喊口号……我不会说笑，送你一个梦：
从你参加了种植的树林
攀登了一千只飞鸟的翱翔。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放哨的儿童

交给了你们来放哨，
虽然是路口太冲要，
打仗的在山外打仗，
屯粮的在山里屯粮，
算贴了一对活封条。
可是松了，
不妨学学百灵叫。
把棍子在路口一叉，
“路条！”要不然，“查！”认真，你们就不儿戏，
客气，来一个“敬礼！”要不然，“村公所问话！”可是松了，
不妨在地上画画。
防止一切的病毒菌，
你们决不让偷进：
金丹、海洛英、“白面”、毒药、三寸长红线……
小汉奸是鬼子的苍蝇。
可是松了，
不妨用胳膊比比劲。
县长也不在例外，洋教士也不能乱来。马虎了记下“不负责”，
儿童团汇报里要抨击：
一点缝，瓶子就破坏！
可是松了，

主任也难得吃肉，善诙谐，常熬夜，又熬出妙语。——作者注

长子县儿童团扣留过县长。

陵川县儿童团扣留过洋教士。——作者注

不妨拉树枝摆摆。
这条路上哪儿的，我想问——
将来是来了，不用等。
尉迟恭、秦琼都变了，
就算是梦吧，我见了
新天地的两员门神。
你们松了，
不妨摘几朵迎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一位刺车的姑娘

动员了，妇女的手指，
为了战士的脚跟。
一边用针线穿鞋底，
还爬梳川流的行人。
可怜山路上多石子，
难为你把线子缝紧。
别以为软心肠没气力，
骑车的小流氓真发昏：
“要走就不停，看你办！”
看来你奈何他不成——
车轮瘫下了人恍然，
谢谢你闪电样一针！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一位夺马的勇士

抓住了你的今日，
就带来你的明天
你仿佛说明了；我祝你
幸运总跟了勇敢——
好啊，可谈何容易：
山沟里是顽抗的困兽。
夺他们的马呀，你着急。
也得算工夫结了果，
你扑下去骑转了一匹，
马后就奔来一头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故事发生在河北完县。——作者注

故事发生在山西长乐村战斗中。——作者注

一处煤窑的工人

是一条黑线引了我去的，我想起，绕一绕才到了热和力的来源——煤窑。平空十八丈下到了黑夜里，我坐了装人也装煤块的竹篮。

黑夜如果是母亲，这里是子宫，我也为早晨来体验投生的苦痛。拿好灯；这里也不是抬头的地方，伛下去：就这样走了。是什么动物对面跑来了，辘辘，拉着满拖筐；后边又赶过了，推着空拖筐，辘辘？额上一只角一点火，黑脸上一对星只一晃点明了这里并没有野性——你们就这样一天要来回三十次，滴着黑汗。洞顶也滴着黑汗，

像峨嵋一个山洞里滴着燕子矢。九老洞到底我记得有一个财神坛……尽头了，财神笑看我黑汗满头，好几位，没有骑黑虎，却拿了铁锹。

你们还要挖前去，像要开一个窗！

抽着旱烟看车窗外浓烟掠过去

是好的；隔着玻璃看浓烟贴海浪

是好的；好的，叹一声此手不虚。

可是愈挖愈深，你们作反比例；

一里半已经够远了，还拉长距离！

不！外来的拳头打动了这一切，

醒了的已经给醒了的添一桶小米粥；你们的黑夜也已经缩短了一节，

每天腾出了三小时听讲学读，

打从文字的窗子里眺望新天下；

要武装起来，你们还打造“曲把”。此刻也许重新卷来了逆流，

你们在周旋，以潮浪压退潮浪；

要不然一定在加紧挥动铁锹，

因为你们已经摸到了方向。

小雏儿从蛋里啄壳。群星忐忑

似向我电告你们忍受的苦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实行空室清野的农民

红了脸，找地方生蛋的小母鸡带来了吧，还是小孩子抱着？爱跳的那个年轻的毛驴，

唔，那个“小婊子”，也带来了吧？家禽家畜都不会埋怨

重新过穴居野处的生活。

谁说忘记了一张小板凳？

也罢，让累了的敌人坐坐吧，空着肚子，干着嘴唇皮，

对着砖块封了的门窗，

对着石头堵住了的井口，

想想人，想想家，想想樱花。叫人家没有地方安居的

活该自己也没有地方睡！

海那边有房子，海这边有房子，你请我坐坐，我请你歇歇，

串门儿玩玩大家都欢喜，

一种简单的武器，形似手枪，装一颗步枪子弹。

为什么要人家鸡飞狗跳墙！

没有什么，是骚骡子乱叫，夜深深难怪你们要心惊，山底下敌人听了更心悸。等白昼照见了身边的狼狈，你们会知道又熬过了一天，不觉得历史又翻过了一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一位用手指探电网的连长

夜摸的时机熟透了，像苹果快要离枝——可动手不得，三尺外就是意外的毛铁丝！可是后面是全营

将一涌而至的人潮，要停也无法挡住，急煞了你这个前导：早不该疏忽了铁丝网，网上通不通电流！冲散了试探的急智，齐涌上一个指头——受于同志的信赖、对党对人民的责任、红色传统的骄傲……总之，你的全生命。你就无视了铁丝毛，

直指到死亡的面额。勇气抹得煞死亡？

“没有电，我还觉得！”你又觉得了全生命——信赖、责任、胜利……此外，你还该觉得吧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西北的青年开荒者

你们与朝阳约会：十里外山顶上相见。穿出残夜的锄头队争光明一齐登先。荒瘠里要挤出膏腴，你们向黄土要粮食。翻开了暗草的冬衣，一千个山头都变色。把庄稼个别的姿容排入田畴的图案，你们将用了人工

顺自然丰美了自然。让你们苦中尝尝甜，土里有甘草根，真好！嫩手也生了硬肉茧，

一拉手，女孩子会直叫。不怕锄头太原始，
一步步开出明天。

你们面向现实，

“希望”有那么多笑脸！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一切劳苦者

一草一石都有了新意味，今天是繁夥与沉重的日子。一只手至少有一个机会

推进一个刺入的小轮齿。等前头出现了新的里程碑，世界就标出了另外一小时。啊！只偶尔想起了几只手，我就像拉起了一串长链，一只牵一只，就没有尽头，男女老少的，甚至背面

多汗毛的，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以至于无限。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大砖头小砖头同样需要，一块只是砖，拼起来才是房，虽然只几块嵌屋名与房号。

不怕进几步也许要退几步，四季旋转了岁月才运行。身体或不能受繁叶荫护，树身充实了你们的手心，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选自《慰劳信集》，1940年，明日出版社）

散 文

译阿左林小品之夜

“这是异邦呢，还是故国？”

都是的，在我。我是中国人。译这些小品，说句冒昧的话，仿佛是发泄自己的哀愁了。

一边想，我一边右手捏着一枝毛笔，左手撑着面颊，坐对摇摇的烛影。这几晚都是点的洋蜡。“家”已经搬了几天了，据说电灯公司，忘记来补要电费，因此就有理由不来装电表。没有关系，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

“Senor 阿左林，这些小品可不是只合在烛影下译吗？”

风摇烟筒。这几天倒像冬天了。一阵阵冷气袭人，哦，炉火快灭了，可是我懒得添煤，尽呆着。

“硬面饽饽！”

此何声也？不错，前几年在《骆驼草》上谈到“西班牙的城”的岂明先生前几天在报上谈北平呼声中正介绍过呢。想起四年前初来旧京，住在公寓里，深更危坐，扑的一声，敲在墙角外的亦正是此声也。当时不知道叫卖的什么东西，只料想吃起来一定有一股凄凉味，后来知道是卖的饽饽，现在又听说“味道并不坏”。

打开门来，月光扑面，风急天高，从对面亮果厂口移来了一个黑影，一盏灯。于是，四大枚换来了二大饼。今夜总算尝到了。

吃了就睡吧，可不是又太“晚了”。

一九三四年

（原载 1934 年 3 月 7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尺八夜

我第一次听到尺八是在去春三月的一个晚上，在东京。

那时候我正在早稻田附近一条街上，在若有若无的细雨中，正在和朋友 C 以及另一位朋友一块儿走路。我到日本小住，原是出于一时的兴致，由于偶然的机，事先没有学过一点日文日语，等轮船“长安丸”一进神户，一靠码头，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为我作向导的 C 紧接着发现，也就交给经常监视他的一个便衣警察。他们现在正要带我老远的去一家吃茶店。我却不感觉兴趣，故意（小半也因为累了）落在他们后面，走得很慢，心中快快的的时候，忽听得远远的，也许从对街一所神社吧，送来一种管乐声，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无限凄凉，而仿佛又不能形容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不问（因为有点像萧）就料定是所谓尺八了，一问他们，果然不错。在茫然不辨东西中，我油然想起了苏曼殊的绝句：

春雨楼头尺八萧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首诗虽然没有什么了不得，记得自己在初级中学的时候却读过了不知多少遍，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不得了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我就在无言中跟了他们转入了灯光疏一点的一条僻街。

回到京都，我们仍然住在东北郊那个日本人家两开间小楼上，三面见山，环境不坏。这一家小孩多，家具也多，地方虽比普通日本人家算脏一点，

气派却大一点。房东是帝国大学的一位物理系助手，一个近五十岁的老好人，平时偶尔弹弹钢琴，听说吹得一口好尺八，在外边有许多年轻人跟他学，虽然他在家总不大吹。

是在五月间的一个夜里吧，我听见尺八就在我们的楼下吹起来了。

约莫两点钟光景，我猛然间被什么惊醒了，听见楼下前门口有人叫嚷。因为我一到日本就无端招致了警察的猜疑，现在有点惴惴然，轻轻的敲敲薄薄的一层隔板，唤醒了 C。我心里却立刻兜上了我们在西山古刹，夜半雨中同闻二犬狂号，令人毛发悚然的一幕，回想起来是那么可笑的，而仍不失为可喜的，盖人有时候也会爱一点惊险。这差不多是四年前了，与现在的情况如此相似，又如此相异。接着我听出了楼下闹的只是两人，其中之一是我们的房东。可是他们闹些什么呢？讲些什么话？想起话来，我就悲哀，我学话的本领实在太差了，算起来我在北平已经住了五六年，有如此好机缘，竟没有学会几句京话，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口南腔北调，在北方，人家当然认我是说的南方话，回到南方，乡下人又以为我说的北方话，简直叫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了。记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朱舜水在日本常操和语，到病榻弥留的时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而在我连土话也容易忘掉呢。我到日本已有两月，勉强说得来的还只是“谢谢”、“对不住”等（后来动身回国的时候，竟还不好意思对房东们高声的说一句“沙扬娜拉”，至今犹有遗憾），听得来的也只此数语而已。于是我问 C，他回答说：“还不是喝醉了胡闹吗！”这时候，他们已不再叫嚷，像已进了屋，笑了一阵，那个陌生人哼起了我听不懂的歌调，接着尺八也在这夜深入静里应声而起了。啊，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说来也怪，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北地的风沙中打发了五六个春天，一旦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朝山敬香、迎神赛会、插秧采茶，能不觉得新鲜而又熟稔！我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或者童时以前的祖籍“金陵”石臼湖以东这一带，虽然我生长的地方是江海间一块新沙地，清朝乾隆年间才出水，说不上罗曼蒂克。固然关西这地方颇似江南，可是江南的河山或仍依旧，人事的空气当迥非昔比，甚至于不能与二十年前相比吧。那么这大概是我们梦里的风物，线装书里的风物，古昔的风物了。尺八仿佛可以充这种风物的代表。的确，我们现在还有相仿的乐器，萧。然而现在还流行的萧，常令我生“形存实亡”的怀疑，和则和矣，没有力量，不能比“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的萧，不能比从秦楼把秦娥骗走的萧，更不能与“吹散八千军”的张良萧同日而语了。自然，从前所谓萧也许就是现在所谓笛，而笛呢，深厚似不如。果然，现在偶尔听听笛，听听昆曲，也未尝不令我兴怀古之情，不过令我想起的时代者，所谓文酒风流的时代也，高墙内，华厅上，盛筵前，一方红氍毹当舞台的时代也，楚楚可怜的梨园子弟，唱到伤心处，是戏是真都不自知的时代也，金陵四公子的时代也，盘马弯弓，来自北漠，来自白山黑水的“蛮”族席卷中州的时代也，总之是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又一番衰败的、颓废的乱世和末世。而尺八的卷子上，如叫我学老学究下一个批语，当为写一句：犹有唐音。自然，我完全不懂音乐，完全出于一时的、主观的、直觉的判断。我也并不在乐器中如今特别爱好了尺八，更不致如此狂妄，以为天下乐器，以斯为极。我只是觉得单纯的尺八像一条钥匙，能为我，自然是无意的，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悠长的声音像在旧小说书里画梦者曲曲从窗外插到床上人头边的梦之根——谁把它像无线电耳机

似的引到了我的枕上了？这条根就是所谓象征吧？

现在，你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歌声早已停止，也许因为唱得不好，那个人罢手了，现在只剩了尺八的声音。我如何形容它，描摩它呢？乃想起了国内寄来的报上有周作人先生译永井荷风的一段话，这段文字我读了好几遍，记得简直字字清楚：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在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不管原文如何，这段虽然讲画，而在情调上、节奏上简直是代我在那里描摩我此刻所听的尺八。可是何其哀也！呜呼，“我知之矣。”（我想起了“欧阳子方夜读书”），惟其能哀，所以能乐，斯乃活人。悲哀这东西自从跟了人类第一次呱呱堕地而同来以后，就永远与正常的人类同在了。现在他们的世界，不管中如何干，外总是强，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一步，比较上总算是一个升平的世界，至少是一个有精神的世界。而此刻无端来了这个哀音，说是盛世的哀者，可以，说是预兆未来的乱世吧，也未尝不可。要知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哀乐是交替的，或者是同在的，如一物的两面，有哀乐即有生命力。回望故土，仿佛一般人没有乐了，而也没有哀了，是哭笑不得，也是日渐麻木。想到这里，虽然明知道自己正和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大我”的寂寞，乃说了一句极简单的话：“C，我悲哀。”

第二天我告诉C说我要写一篇散文，记昨夜。我说尺八这种乐器想来是中国传来的吧。C是学历史的，也注意东西交通史的，他答应替我查一查，可是手头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书。结果我们还是止步于《辞源》上的这一条：

吕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见唐书。

这自然不能使我满足，写文章的兴致也淡下去了。

过了一个月光景，不知道怎么回事，竟写了一首短诗，设想一个中土人在三岛夜听尺八，而想象多少年前一个三岛客在长安市夜闻尺八而动乡思，像自鉴于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写成后自己觉得很好玩，于可解不可解之间，加上了一个题辞。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写诗的日子，现在看稿后注的是六月十九夜。记得第二天我很高兴的告诉了C。可是，一盆冷水——他笑我这首诗正好配我那张花八十钱买来的廉价品乐片《荒城之月》，名为“尺八独奏”，其实是尺八与曼陀玲、吉达等的海派杂凑。这张乐片曾拿到楼下房东处请教过，结果被笑为尺八不像尺八，《荒城之月》不像《荒城之月》。我这首诗里忽而“长安丸”，忽而“孤馆”，忽而“三岛”，忽而“霓虹灯”，也是瞎凑。给C一说，仿佛真有点如此，大为扫兴。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释然了，一想这首诗不是音乐，虽然名为《尺八》，而意不在咏物，而且一缕“古香”飘在“霓虹灯的万花间”也不见得不自自然。周作人先生说得好，“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虚假，而亦与高

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健全地活在异域”，不错，也可说活在现代世界。恰好北平朋友来信催稿，我虽然已不大喜欢这首诗了，终于把它打发了回去。

再过一个月，我因事也动身回国了。C把我送到了船上。我回到北平不久，接到他的信，说是他那天下午独自回到住地，凄凉满目，情状就像当年在家里送了丧。在朋友们眼中看来比出国前反而消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我回到故国，觉得心里十分空虚。读信又非常怀念那边，想仍然回到那边去，仿佛那边又是我的归宿了。自然，以后又一切都淡了下去。

《尺八》这首诗呢，已经在印刷所排好，尚未印出，我越看越不喜欢，结果用另一首诗换了出来，然而后来因为《大公报》诗特刊需稿，没有法子又寄了去。登出后有些师友说好，我自己则不觉得如何高兴，而且以来证明从中国传去这个假设为憾。虽然早想问周作人先生，自己不大放在心上，懒懒的一直捱延到今春才写信去问，然后得到了一个使我相当高兴的答覆：

尺八据田边尚雄云起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唐时有吕才定为一尺八寸（唐尺），故有是名。惟日本所用者尺寸较长，在宋理宗时（西历一二八五）有法灯和尚由宋传去云。

虽然传往日本是在宋而不在唐，虽然法灯和尚或者不是日本人，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本来只打算给诗作一条小注，后来又打算写一篇千把字的附记，而现在写成了这样一篇似可独立的散文了，离初意越远，但反而实践了听尺八夜次朝的心愿，虽然写得如此芜杂，不免也有点暂时的高兴，我要欣然告诉C了，如果他在这里。本来他说要来此地看我的，可是现在早该是他回国的时候了，竟一春无消息，以致我此刻不知道他已到了哪里。啊，我将向何方寄我的系念，风中的一缕游丝？时候不早了。呜呼，历史的意识虽然不必是死骨的迷恋，不过能只看前方的人是有福了。时候不早了，愿大家今夜好睡，为的明朝有好精神。夜安！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

（选自《沧桑集：一九三六——一九四六》，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如归去”谈

槐花满地，时节又近初夏了。刚才读《大公报》文艺栏芦焚先生的《里门拾记》，见有一条注，解释文中的“光棍抗锄”曰：

即文人们叫做“不如归去”的那种鸟。虽只是鸟的叫声，一种人听了奋起耕作，一种人听了怀春思乡，连耳朵也竟有这样大的差异。

觉得很有意思。“光棍抗锄”当然就是“割麦插禾”。书本里说布谷与杜鹃有别，不过也说很相似，则我们的活《辞源》里或者早已把“割麦插禾”、“不如归去”两种鸟相混了，即使有考据癖的文人骤然间也不会分得清楚吧，所以我的意思与芦焚先生开头那点意思不谋而合。我想起了已经忘了的两个心愿。记得我曾经想写一篇历史小说，其中的核心，一个场面，是如此：

农人在田间。旅人在道旁。

头上一阵鸟声，如人言。

“割麦插禾”，农人想。

“不如归去”，旅人想。

我想写这篇小说是在去年此时，在日本，读了李广田先生的《桃园杂记》以后。李文中提起布谷，说在他的家乡以为是叫的“光光多锄”，令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人仿佛说是“花好稻好”，花，读如 ho，大约不是指普通的花（虽然普通的花也读如 ho），而是指棉花。稻无问题，即水稻，江乡自然有水田。这两种说法，与芦焚先生的“光棍抗锄”俱未见于典籍。典籍中有的除“布谷”、“割麦插禾”以外，还有许多，如“麦饭熟”、“脱却布裤”、“郭公”等。而在我们的活书本里更不知有多少花样了。哪一天把各地的花样搜集起来，该有如何一个大观！不过千差万别，都由于耳朵不同吗？我的意思与芦焚先生的意思在此地分道了——可不且慢，芦焚先生的话，实际上，也等于说差别在环境，生活的环境吧。

农人在田间，旅人在道旁。

头上一阵鸟声，如人言。

“割麦插禾”，农人想。

“不如归去”，旅人想。

这里有两个人，虽然在一处，究竟环境不同。不但如此，在我看来，即便“割麦插禾”与“不如归去”两种观念，也未尝不可以联在一起：

春去也。见麦浪滚滚，旅人想起了多风波的江湖。你看，那边一个农人在檐前看镰刀哪。数千里外自家屋后的蓬蒿有多高了？家乡收麦早，或许庄稼人已经赤脚下水田了。唉唉，天南地北，干什么来着？叶落归根，不如归去吧。

“不如归去”一语，不见得太“文”，尤其在古昔，更不见得不就是俗子的口头语。即使是雅士说的我也有话可说：

当此时也，道上的过客或者是一个坐在轿子里的官老爷，不禁想起人生一梦耳，四处奔波，所为何来？为五斗米折腰实在犯不着，即使位居一品，在京华尘土里五更待漏，亦何苦也！君不见那个庄稼汉倒快乐自在，坐在茅屋的门槛上，捧一碗黄粱。你闻闻看，多香！真不如回去种田好，“守拙归园田”。

然而，“割麦插禾”多少带点振作的情调，而“不如归去”却不免消极呢。不错，这还是环境差异，不过哀乐是相依为命的。我曾经说过，这可以作为补充，而且“杜宇”是只合永远啼血了，要知道：

谁说杜宇归去乐

归来处处无城廓

固无论矣，就连你“郭公”，哪怕你“郭公”，

郭公，郭公！

天雨蒙蒙，

促农耕陇。

城南战骨多，

野田变作丘与垄。

郭公，郭公！

何地播种？

弄到这个地步，哪怕你“郭公”，就连你“郭公”也无可奈何吧？“感时花溅泪”，即不“恨别”，鸟亦“惊心”。这又归于一。

不过，时至今日，害肺病的子规到底是绝种了也说不定，因为“不如归去”现在仿佛只活在书本里，而“割麦插禾”的子孙戚族还活在各地农人的

口头。各地农人的口头开出了各式各样的一朵朵小花。哪一天把它们搜集起来当标本，作一个系统的研究那才有意思呵。这一朵朵单纯的小花将是一个个小窗子开向各种境地：水田，桃园——我想从你的里门望望看，芦焚先生，你那边是什么呢？

可不是，我心中曾经拟过一篇社会论文的题目：

布谷声里听出的各地社会背景。

可是为什么不能从旁的鸟声里听出来呢？为什么从旁的鸟声我们听不出这许多花样？这种鸟声本身到底自有其特殊性，引起人心上的反应乃小异大同了。人总是人。

想起人，我真想起各别的人来了。芦焚先生与我在三座门，在沙滩，有过好几面之缘，此刻想必在河南乡下吧？李广田先生，齐人也，是我的熟人，现在正陪我在此地吃他本乡的“省”饭，住在东邻，和我天天见面。过几天想可以听到布谷声了，我想那多妙，如果芦焚先生在这里，譬如说在黄台乡间，我们三人同行，忽听得一声“布谷”，

“光棍抗锄”，芦焚先生想。

“光光多锄”，李广田先生想。

“花好稻好”，我想。

唉，江里的鱼汛该过了好几种了：竹笋该已经老了，高过人头了：青蚕豆该已经上市了吧？这里倒已经上市了。我不喜欢北方这种讲究办法，把青蚕豆去皮，疏疏几瓣的炒肉片，就不能不去皮而稍加些腌菜，细葱花，素炒一下，青青紫紫的来一碗吗？也许是性格定命吧，也许毕竟是文人吧，明知道到了那边自然会愁更愁，我又想起了“不如归去”。

杆石桥。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

（选自《沧桑集：一九三六——一九四六》，一九八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成 长

种菊人为我在春天里培养秋天。

前些日子写了这一句，一直没有接下来，因为在春天里说秋天，不免杀风景，正所谓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何必，看看帘外吧。时已五月，三数十盆菊种已在庭心了，先是在廊下，也许因地利，就在我的门前。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关在房间里干什么？出来看看你的门前吧，真是仙境哪。”不错，罗列两旁的三数十盆小绿，标明的是“白瑶台”、“丹凤”、“锦毛狮子”、“玉麒麟”、“紫雁”、“千叶莲”、“金台夕照”、“懒梳妆”、“流苏”、“绣纺球”、“玉珠环”……煞是大观。可是我倒想起了秋天。去年秋天我怎么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大千世界呢？我对于花本身向来没有多大兴趣，看起来总是走马。所以去年有一晚，在一位同事的房间里，看见了两盆菊花，乃忽然讶异于分派在自己的房间里的一盆，是黄的呢，还是白的，虽然搁到当时也快萎谢了——快了吧！又是一年？心里一凉。

可是，花刚在发芽吐叶，就想到萎谢，真太冷酷了，对自己。的确，这是没有出息的想头。记得去年年底，动身回南的一天，整顿行篋的时候，竟然大为委顿，简直理不下去了，因为想起了再过一个半个月，又得回来，又得在黄昏里，带着一身疲倦，在这个房间里卸却行装。我可怜那只提箱，跟

我来回的跑，也可怜自己，来回的带这劳什子。——不成！我随即想起，这个想头会一笔勾销了世间的一切哪。

真的，我现在想，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上车站接你的亲人，而预先想到了一两个月后送丧似的凄凉？预先想到了人去后的屋子里留下了凌乱的一堆废纸，被喝剩了半杯的、尚有微温的红茶？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赴一个约会而预先想到了隔雨的红楼之间，踽踽独行，心中回旋着“珠箔飘灯独自归”？你说这怎么成，倘若你听“霓裳羽衣”而预先想到了“夜雨闻铃”。

一切都何必当初，则世界完了。一个人似应当知道，这还是有福的，如其在“鸡鸣枕上，夜气方回”的时候，能有“繁华靡丽”的一梦可叹。怕只怕，回过头来，一片空白。

从前读到亥尼叶（Henride Regnier）的一篇小说，讲一个住在楼下的老人，听楼上人家开跳舞会，而回溯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段甜蜜的往事。凄凉吗？多少有点。可是设想跳舞会中有一个年轻人，忽然想到楼下那个孤寂的老人，一灰心，乃悄然走出客厅去，消失在夜色中。到三十年后，做了楼下的老人，听人家的跳舞会，回过头去，像普如思忒一样，作“往日之追寻”，那时候不觉得荒凉吗？

莎士比亚见目思珠（见《风暴》中短歌“海变”），灵心可喜，而卫伯斯忒从红粉底下看出骷髅（据T·S·爱略忒说），则慧眼可怕了。戴了X光眼镜，看透了一切，你就看不见一切了。把一件东西，从这一面看看，又从那一面看看，相对相对，使得人聪明，进一步也使得人糊涂。因为相对相对，天地扩大了，可是弄到后来容易茫然自失，正如理发店里两边装镜子，你进了门左右一望，该不能再笑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了。

我们的庄子不是聪明绝顶了吗？他把“绝对”打个粉碎。他说彭祖算得了什么长寿！“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他甚至想创立第四度（Fourth dimension）“以天地为春秋”。小大完了，是非也随之休矣。可是小心，“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你在说什么啊？可把我弄糊涂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看，把你自己都催眠了，你做梦了——“栩栩然蝴蝶也。”你弄不清楚了：到底是庄周梦为蝴蝶呢，还是蝴蝶梦为庄周？

“你聪明得糊涂了，”我要说，倘使我是孔子，你自己不是先就说“梦为蝴蝶”吗？这就行了。你驾大鹏号飞艇，海阔天空，太不着边际。要知道，绝对呢，自然不可能；绝对的相对把一切都搅乱了：何妨平均一下，取一个中庸之道？何妨来一个立场，定一个标准？何妨来一个相对的绝对？譬如从山前看山，以看到山顶（刚刚一半）为正常，以看到山背为过敏。“鸟兽不可与同群”，一切色相之存在系于我们人的眼底，我们不妨就人立标准，我们脚踏实地，就用脚来量吧，一脚一foot，两脚两feet。

“哼！”庄子这时候该嗤之以鼻了，“那么你开步走，一二三四，周游列国去吧。落得后世人说一句‘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你这样一来，天下多事矣。”

不，我倒要为孔子抱不平了：“你老先生既然知道相对，就不该欺负他。他比你先死，无法反驳；可是我比你后生，我也可以随便奚落你。尘土归尘，你结果还是归于一抔黄土，何苦来！你自己分不清梦与非梦，还要著书立说，

留下一本糊涂帐，你也多事啊，莫非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如果“知其不可而为之”仍不失为一种糊涂，则孔子也甘愿糊涂：他让自己“不知老之将至”。好几年前，我在一本无足道的外国书前面看到一幅画，名“隐者卖书”，白胡子与古书页相辉映，使我大为感动，觉得埋头图书馆也许是最好的消愁办法吧。可是，自甘于某一种糊涂的、若愚的、而脚踏实地的孔子，在寂寞的长途上，走走自然会到了不舍书夜而流逝的水边，于是乎未能免俗，作了一个如果旋律的发展起来就是一首诗的，单纯的，平凡的，洁圣的，永古的长叹——“水哉，水哉！”

那么你走在空谷里的时候，也不妨说：“斑鸠啊，斑鸠啊！”或者“鹿啊，鹿啊。”这样一来，鸟兽也可以同群了。你不防叫公鸡对山羊说话，叫狐狸嫌葡萄酸，叫希拉（Hera）吃醋，因为宙斯（Zeus）别有所欢，爱上了地上一个孩子……好不热闹！按人意的尺寸造起了神话世界，造起了童话世界，造起了寓言世界……这样一来，倘若你走在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里，你就有机械与你同群了：你可以赞美起重机的膂力，颂扬火车头的勇往，看“曼丽皇后”与“诺曼地”赛跑……好不热闹！这就是所谓文学世界吧？

这时候，庄子，你该含笑了。你扮起孙悟空，大闹“绝对”的天宫，虽然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依旧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可是你究竟演了一出好戏。你看，你变蝴蝶的本领也实在高明，比后世舞台上演的“金蝉脱壳”妙得多了。假如我“思华年”，怨我也来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不要哭，不要哭，你失败了，你也成功了。即使你不是演戏，是赶路，那么虽然你或尚未达目的地，一长段路倒亏你走下来了。

孔子呢，你在川上喝了一口凉水，顿觉神清气爽，恢复了疲劳，现在该拄起行杖，背起行囊，脚踏实地，一脚一 foot，两脚两 feet，重新上路了，列国还没有走遍呢，继续周游去吧，去寻你的梦吧——寻你的“唐虞之世”，也正是人家寻“华胥国”，寻“黄金城”（El Do-rado），寻苏联童话里的“远方”……

远方，远方！——各种的远方，方向间或不同，距离容有差池！“白瑶台”、“丹凤”、“锦毛狮子”的世界是就在我的门前。三数十盆菊绿依旧，而我倒像环球旅行了一次。“细雨梦回鸡塞远”，怅怅的打开贴满了旅馆、轮船的花纸的行筒，检点一路上信手采摘来的花样，仔细一想——还是落套。可是在某种观点上看来，日光之下真可以说是没有新的东西。格雷的“墓畔哀歌”自然落套，因为谁不知道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呢，虽然他有所给，也有所得——

He Gave to miserv all he had. a tear,
He gained from Heaven, 'twas all he wished' a fried.
(他给予坎坷一切他所有的，一滴眼泪，

他得自上苍一切他所求的，一个朋友。)

即便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也有人说不本旨平平。不错，譬如说，如果我们知道了“生生之谓易”，知道了“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就意义上说来，底下这三行，实在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comme le fruit se fond en jouissance,
comme en delice il change son absence
Dans une ouh ou sa forme se meurt !

（像果子融化而成了快慰，
像它把消失变成了苦美
在它的形体所死亡的嘴里……）

不过，虽然根株仍然离不了一样平常的泥土，这总是两朵奇葩，因为开得妙，开得美。而且，单是提到他们这几行，我就得了安慰了。格雷写那两行，好像一上一下，拨两粒清脆利落的算盘珠。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笔账可结，也就不虚此生了，也就是结了实了。瓦雷里的果子呢，上口真是甜着哪。既然不免于一吃，何况做一个可口的果子。洛庚·史密斯“满足于被折如花，消失如影，被吞没如雪片入海”呢。也罢。让种菊人来浇水吧，为我培养秋天吧。或者我自己培养一种秋天吧，我也应当有我的“白瑶台”、“丹凤”的世界啊。我们不妨取中庸之道，看得近一点，让秋天代表成熟的季节，在大多数草木是结果的季节。各应其时，各展其能吧。在大多数草木，花是花，果是果；在一部份草木，花即是果，例如菊花。不过，恕我的痴心问一句，假如你像我的一位朋友的老师那样，梦为菊花，你会不会说呢：“我开给你看，纪华（随便拟的名字，其实等于X，代表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选自《沧桑集：一九三六——一九四六》，一九八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垣曲风光

四条铁路——正太、同蒲、平汉、道清——圈成了一个菱形地带：晋东南，连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菱形的四个角尖上的三点是太原、石家庄和新乡，一年来算是被敌人占据了，因为那里至少有他们的队伍。四条铁路也算被他们占领了，不过倘使照有些画地图者的办法，用粗黑线表示铁路呢，这四条黑线，照我的奇想，该改用虚线，因为那四条铁路事实上随便那一段都常常中断的，一到夜里当然更接不起来了。这样一来，这四条线正好又成了这一块在成长中也在扩张中的抗战根据地的界线。也仅仅是界线而已，并不能阻止什么，里面的力量早就溢过了它们，淹没了它们，内外的中国军民尽可以扬长补短，来去无阻。加之，由于道清铁路太短，没有接上同蒲铁路，这个菱形还缺了一角，西南角，角尖是目前还在我们手里的垣曲。因为陇海铁路的西段还没有丢，垣曲在目前就成了晋东南和内地交通的最方便、虽然不是唯一的门户。

阖上地图，跨上南村渡口的渡船，一会儿，你就过了黄河，到了垣曲城外了。

初冬的垣曲城郊还只是晚秋景象，天气暖和。树叶还颇有些绿的。黑河流在城西，清极了。修长的白杨到处都是。站定了望望黄河南岸一座特别奇峻的蓝色的远山，听听近旁的水声，树声，你会想起这里有江南的秀丽而又是道地的北方。尤其是，一听到黄河湾里的特别多的雁声，看到象别处农家挂在檐前的红辣椒一样，一大串一大串挂在村树上，预备做柿饼的红柿子，那么鲜明的，你会想起这里又确是垣曲。

这里虽然离西北方横岭关敌人的大炮只有五、六十里，在城外见到的还是太平景象。农人在田里照常恬静的工作。

慢慢的从西门进城去吧。

城门口的守兵在晒太阳。城门洞的墙壁上有两张二十天以前的西安出版的《阵中日报》。石板街道。处处见树木。房子大致都高。节孝牌坊，进士牌坊。一个清静的古城。还有颇象样的邮政局。里面一边墙壁上插了三排无法投递而退回来的信件，柜上横栅前贴了由西安起飞内地的，由内地转飞安南、香港的三种航空信的邮费价目。邮路还通得很远。可是不见什么店铺。很少行人。拉住了一个过路的市民问问看。“这里的老百姓只回来了三分之一”是你会听到的回答，也确是我在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亲自听见的回答。城里没有做买卖的吗？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在南关”。

南关大街本来的确是垣曲最热闹的大街，如今是一片废墟。

在这里可以看到敌人以我们的房屋为代价而遗留给我们看的痕迹了。这是敌人给放火烧的，在垣曲第一次失陷的时候。垣曲在这一次战争里前后已失陷过三次。第一次在今年二月间；第二次在七月间；第三次在十月间，在中秋节前后。敌人三打垣曲，在山西战局上，第一次算是得到收获的，因为他们从这里直抄到晋西南我们守军的后路，把局势弄成了一个新段落。第二次是徒劳，因为虽攻陷垣曲，不能占为据点，遂不能实现在道清和同蒲两条铁路之间联接交通线，亦即缝合对于我们的封锁线的梦想。最近这一次也是如此。中央军在这里西北山头上和敌人打了四昼夜。在我们的部队居劣势的严重关头，有一个排长带了十个勇士抄袭敌人的后路，牵制了二百名敌人，苦战之下，生还者仅二人：王克成和李怀德。敌人又终于退走了，当然也来不及好好的欣赏一下他们自己二月间在这里干下来的成绩。

现在这一带废墟，有了七、八个月的历史，除了断垣破瓦外，已经不留什么，干干净净了。杂草在这里长了，又黄了，枯了。从前的窗子现在还有未曾豁开，尚存完整的方洞的，仿佛镜框，由街上的过路人，随便镶外面一块秀丽的郊景，譬如说一株白杨，一片鹊巢，半片远山。有一家屋子里，现在应该说院子里了，一只破缸，里面还有些水，大开了眼界，饱看蓝天里的白云。一家破屋，看来原先是一家颇不小的铺子，门头还留着“陶朱事业”的字迹遥对斜阳。这个门洞从前该吞吐过多少日本货，整的进，零的出。敌人来烧断了他们自己的工业品的通畅的大出路。

现在南关的确还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两边的房子烧了，做买卖的又来街头摆摊子。卖的物品无非是一些日用品和食品：火柴、鞋袜、电池、洋腊、花生、柿子……摆摊的一个老头儿告诉我，大致都是把家小留在乡下，自己出来混几个子儿给大家弄一碗饭吃而已。

摆摊的不少原先开杂货铺的。在城里一条冷清的街上，在一家祠堂门口的阶石上，我们就遇见了一个。我们买了他一毛钱花生，也就买到了又一些关于垣曲的报告，那是我们在阳光里坐下来剥花生吃的时候。那时候从邻近又来了几个市民和小孩。

“敌人第一次来的时候可伤了老百姓？”我们问。

“很不少，”摆摊的回答，“第二次可没有什么了，第三次更没有了。”

我们知道第二、三次并不是因为敌人变得有人性一点了，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用刀子斩去了老百姓心里“哪一朝天子不完粮”、“日本兵也总是人”的信念，教给了老百姓都得逃命的真理。

“第一次逃的也逃得太慌了，”摆摊的抢着接下去说，“逃了命就顾不了许多，等到敌人退了，回来看什么都不见了，连一只鸡都不见。”

心想“你们早该让他们连一只鸡都不见的，”我却说出了：“现在你们

逃的时候把什么都带走了不是？”

“现在也没有什么了，”另一市民说，“反正一挑子就挑走了。”

他们都已经从实际经验中理解了空舍清野的威力，第三次敌人进城只绕了一转，人马都无处找东西吃，立不住脚。而且他们也大胆了，学乖了：

“从前我们逃得很远；现在却只和他们转了：鬼子到这个山头，我们就转到那个山头，鬼子到那个山头，我们又转回到这个山头。”

到底不同了，我心里想，因为当时听到这里已经相当高兴了，可是再从西门走回去的时候，我马上又起了另一种想头：这样就够了吗？正好，走回住处去的时候，这一点“不够”的感觉稍稍为一个故事减轻了一点：

一个种地的从便衣队那里弄到了一枚手榴弹。爬到了一个窑洞顶上，他看见两个日本兵正预备退走，就把手榴弹掷下去，并没有把他们炸死，可是把他们吓跑了，获得了一匹马和两支枪，送给了我们这边的部队；防守垣曲有功，现在还驻在附近的中央军独立第五旅。

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十二岁、眉目清秀、念过几年书的孩子，名字叫王木坤，我们在黑河边遇见的。那个勇士就住在我们要经过的前面那个小赵村里。我们就要孩子引我们去找找他。他叫什么名字呢？“就叫老虎。”孩子说，笑了笑。走到村门口，问起“老虎”，我们听到了“呵，郭老虎。”“老虎”是住的窑洞，不大，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可惜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老虎”不在，锁了门。门对面的墙上有一只空篮子挂在那里，在微风里摇曳。我很想留一些什么东西在那里面，也想不出该留些什么。还合适吧，一封慰劳信，如果我身边有一封慰劳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故漳

（原载 1939 年 4 月《文艺战线》第三期）

煤窑探胜

一条黑线在山中迤迤的引往热和力的来源——煤窑。

热和力的来源？不错。坐在海船的大菜间里或者花车的头等饭间里，隔了明亮的玻璃向窗外隙望的时候，你也许不至于太讨厌窗外掠过去的一缕浓烟吧？住惯大城市的见到电灯当然不会再引起任何遐想，当然会忘了满室的光明与那些比漆还黑的煤有任何瓜葛。可是事实是发电厂必有烟囱，而烟囱里又必会冒黑烟。一个现代工业区是一个烟囱的树林。推动机器的是力，力来自热，热来自煤。

近一点，就说温暖吧。可是享受热气管的温暖的，当然不大会想起烧水的还得用煤。那么再说近一点，烧煤炉的当然不会再讨厌煤了。好，饮水思源，在以产煤著称的山西，在雪夜，在围炉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到乡下去看看煤窑。

壶关县境内大大小小的有百多个煤窑，而只有两个煤窑用机器。两个机器煤窑之一是在某某村，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很高兴的忘记了这是在敌人后方，一见了山坡上黑烟在冒着，机轮在转着。

我们进了热和力的来源的口子，十八丈深，坐的不是电梯，而是竹筐子。

“揪牢了绳子，”导游者告诫我们说。

穿了一件黑布大褂，戴了一顶草帽，我看见站在同筐子里的伯萧也穿了一件黑布大褂，戴了一顶瓜皮小帽，觉得样子很好笑。他们太客气，给我们

找来了这么两套衣帽，要我们换上，其实我们穿的军衣帽也已经够脏了。我们每人都提了一盏马灯。

到了洞口底，跨出筐来，我们得先爬上一个煤屑的小坡，屑深没踝，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导游者先把我们领到一个离洞口不远的小小的缺坎里，中间生着一盆火。因为洞内已经很暖和，却是一片昏黑，我不知道生这盆火是为了取暖呢，还是为了代替灯。火旁有一块突起一点的地方，大概算是炕吧。一个工人坐在炕上修筐子，看见我们进来，欠了欠身，很客气的说：“歇一歇吧。”

“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导游者对我们说。

这也就是休息的地方，我已经知道了。可是空气那么闷，黑暗的威胁又那么凶，好在这儿休息吗，还是快进去吧。

我游过的洞也记不清已经有多少了，深深浅浅。现在，在一步步深入的时候，我的模糊的记忆中浮现了北海公园里很小的土洞，济南附近的龙洞，江之岛的忘了名字的长洞，西湖旁边的那些山洞，尤其是今年夏天在峨眉山游过的黑虎洞。在黑虎洞里滴在我斗笠上的是一点点燕子和蝙蝠撒下来的粪，如今在这个只通得过两个人的洞道中，滴在我草帽上的是一点点黑水珠。在黑虎洞里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燕子和蝙蝠的声音，而在这个洞里则是辘辘的“拖筐”底下的小轮子的声音。

“拖筐”空的由工人从洞口推进来，满了才拖回去，辘辘的来了，又辘辘的去了，穿梭一样，十分紧张。地下并没有轨道。到里边洞顶差不多全部都很低，人在底下走起来得把身体弯到九十度，有时还超过九十度。每个工人头上都缠着一盏烟斗形的小磁灯，漆黑的脸上向人抬起时，两点眼睛显得特别亮，弓着身体，用急步跑去，快得像耗子或野兔，忙得像蚂蚁，辘辘的来了，辘辘的去了。

他们每人在挖煤以外，每天就得这样的走六十里路，因为他们每人每天出四大筐（从前要五大筐）煤，五拖筐才满一大筐，一拖筐得来回走三里路。

我们好容易走了一里半路，算到了尽头了。黑虎洞的尽头是一个骑黑虎的财神的灵座，而这里是几个工人正在铲煤。他们回头望望，不带恶意的笑我头上出汗了。实在是，我早已满脸大汗了，单是这样走一走。

回到洞门口，在原先那个缺坎对面的另一个不生火，堆些断木破“拖筐”一类东西的缺坎里，经导游者劝我们等汗干了再出去，我们觉得这里也真可以休息了。我们坐在横在地下的木头上，居然也觉得很愉快，像在夏天走累了以后歇在一棵树底下，听着涓涓的流水。这里也确乎听得见洞壁外有汨汨的流水呢。我们就和导游者闲谈起来了。

因为他们两个中一个是“二卜士”（二工头），一个是工人救国会会长，我们知道了这里工人在敌人来过近边一次以后生活上有了些什么变化。他们的工作时间已经由十六、七小时减至十二小时了。工资也每人都增加了一角。他们现在的工资是在三角至四角之间。他们自己带干粮就在窑里吃的，所以现在很高兴的每天在正午十二点看见洞口吊下来的两桶米汤。如此而已。可是已经够多了，要知道这还是这里七、八年来第一次的改革呢。而且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在抗战期中加紧生产，他们都明白，他们也梦想洞里装电，设轻便铁道了。

我们上来了。当然得到工人救国会的办事处去看一看。工人救国会新近才成立，还没有什么可看。我从会员簿上知道了几十个窑工和机器工人中虽

有些识字的，大部分还是不识字。令我愕然，我在会长，那位政治认识很充分、刚才和我们谈得很有条理的会长董某某的名字底下，也看见写了“不识字”。恰巧一个戴瓜皮小帽的中年男子进来了。董为我们介绍说：“他是我们新请来的先生。”他们已经开始办识字班了。他们预备每晚工作完了就上课二小时。外边那个大房间里已经挂起了一块黑板。也有了起源了，我想。

我们在黑板旁边发现一副简单的小机器。

“这是造‘曲把’的，已经造了三支了，”会长为我们解释。而“曲把”又是什么东西呢？会长领我们到机器工人的房间去看了一种小枪，样子像手枪，每次装一颗步枪子弹。

这也只是一个起源，别笑它简陋得可怜吧。我们要知道敌国内喊着“制造罐头的金属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原料；今后我们应当不再以锡罐装制食物，而以泥罐代替”的今日，无须开采铁矿，我们沿铁路线附近的有组织的工人，已经差不多经常到敌人所不断修补的铁路上去搬铁轨到山中去打造手枪和步枪了。

中村。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选自《沧桑集：一九三六——一九四六》，一九八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惊弦记：论乐

—“德之华”

中国历来谈乐，一般都着眼在用，在它的感人，在它的“移风易俗”，或者照现代人的讲法，都是抱的功利主义。这当然都有古圣先贤的言论作根据。例如他们也乐道某种“之音作，而民”什么什么。可是像这种话，“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与其解作有了郑卫之音才成乱世，有了桑间濮上之音，才会亡国，不如解作世已乱而产生了郑卫之音，国将亡而产生了桑间濮上之音，虽然果反过来也还可以成为因。古圣先贤的好处在于“通”，他们说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以后，就接上了“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他们没有严格的规定，那是因，那是果。古圣先贤的好处也在于不忘“本”。不错，“君子动其本”，《乐记》上写得明明白白。而《乐记》开宗明义就先把乐之本说清楚：“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中间也不时的重新提到，说了一大堆功用以后，终还是反过来结之以“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韩诗外传》是“小说家言”，讲孔子的事情当然不足信，可是也有看起来很荒诞不经而实际上也合乎古旨的地方，例如这一个传说：孔子鼓瑟，被“侧门而听”的曾子听出了瑟声里“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趋利之甚”。当子贡带了“谏过之色”闯进来“以曾子之言告”的时候，就感叹了曾参“知音”，而老实承认了，“乡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为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参以丘为贪狼邪僻，不亦宜乎！”因为乐是心声，“乐不可以为伪”，心不正的时候，乐也给泄露出来，也就因此，各代有各代的典乐，大章，咸池，韶，夏，大护，大武，各不相同（有如各国的国歌？）勉强不得。也正因为进步了吧，现在大家都比孔子乖多了，越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越

弄玄虚，越用霉气薰人的古装道袍来把它们裹得闪闪烁烁，耀眼夺目，而自以为独得了古人的衣钵。实则，即便是真衣钵，也只是衣钵而已，没有血肉，没有生命。于是尽管实际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各自揭出的没有一个坏名目，从古今溢法的变迁上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趋势。我们如今从“古乐”（？）里再也听不出“贪狼之志，邪僻之行”，因为它根本就顶多只剩下一个空壳。空壳有好处，可以叫人家莫测高深，让人家把自己想像的东西放进去，尤其叫本质好的把好东西扔进去给耍空壳的大受实惠。所以空壳一直大有用处，可以进一步诱陷好高的灵魂，像搜捕萤火。可是尽管有用，总不是本来的用处了。例如孔圣人也曾经把乐用在另外的目的上，托病不见孺悲，还要叫人家明白他的意思，就等“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实施，这种有所为的“取瑟而歌”，却一定是敷衍，不成其为乐。而另一方面，如各种传说里孔子围于匡的故事却又说明了另一点。孔子被围，见子路愠怒，想拔剑去拼，就阻止他，要他舞剑让自己协了唱歌，三终而围罢。那时候圣人虽横遭困厄，而自道“命也”，发而为声，当属无所为的自然流露，一定唱得很好，唱得非常动人，以致匡人不由不罢了围，或者他们之所以罢围者，是因为他们认出了被围的是孔子，因为孔子在歌唱里显出了他的本色。本无所为而功利即在乎其间，乐之为用，当于此求之吧？

二“鸿鹄将至”

“无所为而为”这一种态度，这一种精神，不仅在乐，在任何有成就的过程中都属不可少。我以为这应该解释为“埋头”的傻精神。高瞻远瞩，在选择期间，当属第一要着，可是把一个负荷担到肩上以后，就应该埋头。一位写诗的朋友，有一次上一个名胜地方玩，碰见了一个熟人，就受到了这一问：“你到了这里写了多少诗了。”“我是来玩，”朋友就有点不高兴的回答，“不是来写诗。”可不是，如果是到一个地方玩，就应该只是玩，要不然目的在看山水，心在写诗，则山水何由看得好，诗也何由写得好？反之，山水诗好的大概都孕育于把身心完全浸在山水中间而把写诗完全忘了的时候。中国画最推崇神品，逸品，一切中国的艺术实也无不如此，最高的风貌可得之于“手挥五弦，目送归鸿”。顾长康把这两境还分个高下难易，似乎认为“手挥五弦”还比“目送归鸿”受拘束，有限度，着痕迹。可是我总记得这两境好像原是联在一起的，也总以为联在一起才更好？手挥目送，该是艺术到化境时候的一种最神、最逸的风姿。然而要如此“得来全不费工夫”，必须先经过最着痕迹，最傻，最笨的“踏破芒鞋无觅处”。这当然非常不合卫生。可是宣扬中庸，最通达，最近人情的孔子有时候也就这样不讲卫生！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所以任何“迷”都不足为病，无奈中国人就看不起这种老生常谈，谁都只想做聪明人。还没有学会弹琴，就都试起这一种潇潇洒洒的风姿“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其实这是孟子所说的“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而已。

三“琴之感以末”

归根结蒂，还是做人第一，修养第一，准备工夫第一。这又不由不令我想起被人家百引不厌的里尔克关于写几行好诗必先体验一辈子各种生活的那一段话，有了那么悠长的准备工作，最后的甘霖下降，如瓦雷里的“棕榈”一诗中说的，就只消那轻轻的一击了，不管出之于“一只白鸽”，“一阵微风”，“一个凭倚的女子”，或任何“最轻微的摇撼”。化学实验室里一杯

过饱和的溶液，只消一根玻璃棍或者一只手指在杯边上轻轻的一点，就沉淀了，结晶了。就因为大家忽略了酒在水里的扩散，潜移默化，水变葡萄酒，就成了奇迹。成功往往像一个奇迹，失败也往往如此。虫蛀坏的果子和成熟的果子一样的只消空气的一抖动就落。乐之产生往往如此，而乐之收效也正如此。“落叶俟微风以陨”，陆机在《豪士赋》里说，“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李善就给他注明了出处在《桓子新论》：“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窃为足下有所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游童牧竖踟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挥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李善说。更进一步不要说乐，一点声音就够了。《战国策》里说：“更羸与魏王处于帘下，有雁孤飞东方，更羸虚发而雁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飞徐，其鸣悲。徐，甚疮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痛未息，惊心未去，乃闻弦音而下。”是以，“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终于说，尽管他谈了多少乐理，乐道。他又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一九四三年

（选自《沧桑集：一九三六——一九四六》，一九八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巧笑记：说礼

这应算是一篇论说文。在玩笑里，在胡诌的故事里，作者响应如此江山的今日忽然兴起的尊孔献鼎，制礼作乐的宏论与盛举，无非也为了匡正世风，转移人心，略献刍荛，尝试说说礼，最令人感觉无趣，最叫人望而却步的礼，礼的起源和礼的作用。万一刻划人性，创造人物上，偶有所成就，亦终非本意所在。可是作者也全是综合和发挥古圣先贤，时人名士，以及一些朋友的意见，见诸经典报章或闻诸口头，不敢掠美，也一并声明在先。

“神经病”正在街上踟蹰，说不定要不要去看电影的时候，忽然意外的遇见了多年不见的他的一位温柔的朋友。

向来骄傲，“神经病”曾扬言过决不做任何人的奴隶，决不会叫一个女子搅失了主意，现在对方既是一位有身分的小姐，他更乐得矜持，十足保持了绅士的气派。可是一见对方的右手探出手套，正要向前跃起来，他的一只大手就直扑下去，象老鹰飞攫一只乳黄的小鸡。

是她先伸出手来啊，完全合礼。“礼者为异”，男女授受上必须清楚，现在不是先后分明吗？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洋规矩，“神经病”一定要等女子先伸出手来，才和她握手。现在如果他看见这一位女朋友跟别的男朋友一起走，如果她不先招呼，他一定不管她看见了自己没有，只顾垂着头，照规矩连对她点头都不点了，哪怕他明知道这一差池就等于千里之失——又是五、六年的不得一面。

如今得意之下，他连忙摸一摸领带：很好，一点也没有偏开。下颌则用不着摸，他早上刚刮过胡子。他高兴。一切就都是为了礼貌。

温柔的朋友要坐公路局的汽车回乡下的朋友家里去，时间还早，就邀“神经病”到一家咖啡店里去谈一会儿。

他们谈了许久的契阔，一直是彬彬有礼。

“你现在礼贯中西了，”温柔的朋友终于说，嫣然的一笑，“可不是刚受训回来吗？”

他最近却没有离开过当地。可是“礼也者报也”，他就报之以一笑。他自己的微笑令他觉得像一朵纸花贴在脸上，对座上的则是一朵天然的开在那里。他自己的微笑只是令他感觉到肌肉的一些伸缩而已，对座上的却吸住了他的一切，以那张小嘴的向两边微退，把撇点似的酒涡注成了整圆的句点，以那对大眼梢的向后微引，把双眼皮的弧线刻得更深，更清晰。可是欢喜像水一样的透入了，遍布了那朵纸花，叫它活了，也当真开在那里，十分自然，因为令他觉得像鼻头长在脸上似的不再感到什么了。他也说不出为什么那么高兴。

“现在大家都在谈礼，”对面温柔的脸尖部红中又露白，红唇弯起处半展出一排钢琴的白键子，底下流出了温柔的声音，“却往往只叫人头疼；我有一点不同的见解，想最好也拿到报上去发表一下。”

“神经病”即景生情，灵机一动，忽然放了火花：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最宜于说礼，说出来也可爱，你会在文章里引到不？”

“也不忘记底下的那句‘素以为绚兮’。”

“可不是，可不是，”“神经病”很得意的回答，“这样就点明了：笑巧才能倩，目美才合盼。”

“你的推理颠倒了，”温柔的朋友说，眼珠向上角一翻，多露了一些白，可是太飘忽了，象鱼肚皮在水里的一翻侧，简直说不上嗔，“就像他们把‘绘事后素’解释成了‘素后绘事’。我的意思还是跟朱注一样，正符合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最后这一句话可叫“神经病”吃了一惊：他不是挨骂了吗？

幸好温柔的朋友毕竟温柔，接下去就说了第一得先讲人的本质。

她的本质实在好，他当然知道“神经病”的也不算坏：“神经病”稍稍心安了一点。他们相对，还适于谈礼。

而且温柔的朋友毕竟温柔，她接下去说了：

“‘礼近于义’，可是出发点也应是‘仁’。心里先存了‘人’对‘人’的态度，大家才可以讲礼，礼决不如他们所说的由征服者制定了约束被征服者，约束奴隶。”

“神经病”从不知不觉已经半伏在桌子上倾听的驯服姿势中，倏的挺直了起来：他可不做被征服者，被征服于原是被征服的妇道，他原先那种姿势真是奴才相，本来不成体统，可是守礼若是被征服者的义务，那么他还是随便一点，不，他也可以站在征服者方面而守礼——他重新又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了。

“为了那样才制定的，”温柔的朋友却若无其事的接下去，“该是法，决不是礼。礼乐实在同源，都‘管乎人情’。譬如父慈子孝，都本之于爱，人情所当然，也就是礼所当然。礼该是公式化了，规律化了的爱的表现。”

一听说，“神经病”马上又摸一摸领带，一只看不见的手又在嘴边扫一遍：好极了，好极了。非常合礼！

“譬如梁鸿太太，”温柔的朋友再举例说明，“给梁鸿先生进食所用的礼式，也就是一种公式化了、规律化了的爱的表现——‘举案齐眉’。”她

一边就轻盈的向前低了一些头，轻盈的用手把咖啡杯当作盘子，当真就举到齐眉的高度，就像台上旧戏里的举空杯掩袖饮酒，以及饮了酒，把空杯底侧给对方看的那种有训练的姿式，一样的老到，一样的不着痕迹，一样的妩媚。

“神经病”这一下可不知身在何境了，几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几乎弓着身子去双手接了杯，直以为面前举杯的美人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太太了。

不错，有这样一位又美、又贤淑、又知礼的终身伴侣，该多么幸福！倘若什么都不足以表示爱，他尽可以在家里给她梳头洗脚！人家不知道他也会多么温柔！别以为死板板的一块，碰到嘴上，一受暖气，就化了，放到嘴里就服服贴贴，随你的嘴唇，随你的舌尖，随你的牙齿而具形，而变形，而且是甜甜的，因为根本是糖做的！是啊，要讲吃，一定也叫她吃得舒服！他刚从一个帮法国人当过厨子的当今阔人家家里学会了做沙拉的一种特殊方法，加上自己的一种特殊调味法，正愁没有一位知味的雅人来欣赏一下，如今不是正好给这一位天生丽质的太太品尝品尝吗！这也该是一种优美的礼节吧？甚至于这也该是一种礼节：亲手用银匙给她挑到盘里，甚至于亲手用银叉给她叉一些放到她的嘴里。爱的表现，爱的表现，藉此也可以让她知道她接受的是多深的恩爱！

可是不，不！“神经病”重新正襟而危坐了。“礼者天地之序也。”天上地下，不可颠倒。做菜当然得由太太来，即使是娇贵的小姐，做了新娘，也就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而且你看温柔的朋友这一双纤手多灵巧，什么菜到了它们底下，沐了手泽，就会变出最好的形来，调出了最完美的谐和！是啊，是啊，他是非吃她亲手做的菜不可了，而且要敬起来真是“敬”——举案齐眉！于是“神经病”一变而成了无上尊严而无上舒服的老爷。

对了，对了，礼者序也，尊卑有序，内外有序，尽管在外边，照洋规矩给太太拿大衣，让太太一个人出风头，叫每一位先生部向她脱帽，在家里尽不妨照某种边疆部落的办法，由老爷住楼上，让太太住楼下，跟牲口在一起；不但吃太太的，穿太太的，而且甚至叫一双可怜的嫩手洗老爷换下来的衣服，亦无不可——唔，非如此实不足以表现爱。“神经病”忽然像起了一种激烈的报复心，为了一个入骨的仇恨——恨自己的长久被虐待，尤其被多少女子冷落的虐待吗？或者他不发作了一种毫无理由的虐待狂，他简直想甚至于骂她打她也可以，因为“骂是疼，打是爱”，还不是爱的表现？

“要这样解说礼，”温柔的朋友接上来一句，“才可以由礼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可以服人。”

“是的，是的，才可以服人。”“神经病”漫应着，他在刚才得意忘形的幻想中失去了对方谈话的线索了，庆幸这一下听到的一句正好和他的意思合拍。

那么顺当啊，连他的跑野马也都合得上轨道！他又得意了，他又忘其所为了：对，驯服了这个小东西，自己却是一身轻——完全自由。内外有序，太太管不着先生在外边的行径。倘使自己不讨人家的喜欢，在外面走投无路，先生还可以得意洋洋的回家来，说他目中没有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太太，心里也更只有自己的太太，人家骂他也就因为妒忌他有了这样一位好太太，因为他只对自己的太太好——于是，笑了，笑了，比没有笑以前更快乐的笑了，可不是，在家里红肿了眼睛的太太，就是这个坐在对面的温柔的小动物？

可是尽管温柔，朋友还是朋友，而进一步消受这一切，可不是心须先正一下名，标明人家是他的太太，他的所有物？加了封条，才可以防微杜渐，

免得别的男朋友来这里纠啊缠的，就像他自己在此刻。

“神经病”就把正名这一点是否礼所必需的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温柔的朋友就正颜回答说，正名也就是仪式的用意所在，仪式是做给社会看当事人已经取得了一种新身分，也提醒自己以这种新身分，从此不得乱来，不可含糊。她也承认这不是自己的发现或发明。只是她很赞同这一种意见。她尤其喜欢人家说社会上的身分就应该跟戏台上的身分一样，各演员应该记住各自的角色，她自己就深深的体验到了这一点，当她从前在学生时代，在大学里演《罗米欧与玖丽叶》的时候。只是她更进一步的体验到演员应该不只记得角色的身分，还应该感觉到角色的感情。她在露台上向底下的罗米欧轻柔的誓言“我的爱像海一样深，海一样无边”，当然要完全记得自己是玖丽叶的身分，感觉到玖丽叶的感情，而不是哈姆雷特的母后的身分，哈姆雷特的母后的感情，那只合哄慰哈姆雷特说：“好哈姆雷特，把你夜沉沉的气色撇开吧，让你的眼睛像朋友一样的看丹麦国王。”

温柔的朋友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两只裸露的白手臂半交叉的倚在桌子边上，稍稍耸起一点肩头，俨然凭倚着露台的栏杆，下临罗米欧也就像月亮下临大海，台白飘过去像轻风，十足符合了浪漫派诗歌爱用的意象：高悬的月亮，控制着起伏的大海，等她再装出内疚心的母亲劝喻别扭的儿子那一种姿态与声调的时候，就显得不大合适，全然像反串，就不由不叫“神经病”连忙打断说：

“当然还是玖丽叶，当然还是玖丽叶！”

“一样的表现爱，可是不一样的爱。”

温柔的朋友还是着重在礼的原理，她接着说了，而且说她虽然不反对仪式，并不是她要发表的意见的中心，最后还是结之以：“礼起源于感情，于爱，还得靠感情，靠爱来赋予生命，要不然一切形式都无非具文而已。”

“也对，也对。”

“神经病”也不赞成仅是具文的仪式，比诸它们，他宁取目前流行的“一切从简”。可是他心里一种狡狴的想头又一涌而至。征服一位好高的女子，最高明的办法莫如处处都显得倒是自己才是被征服者的样子，莫如设法得到她了也还不讲形式。这样于男子还是好，十分方便，他可以说拘泥形式的是守旧派，事实却总是谁都承认。承认了，先生总还是自由，男子总不会做奴隶，总无往而不占便宜，随便怎么办。即便做了丈夫也应该有丈夫的义务、责任，丈夫把太太的好处享受够了，还可以向外发展，在当今这个开通时代，大家都知道女子的青春比男子的易逝，大家会原谅一个丈夫到一个时候会感到寂寞的苦衷，如果他是一匹种马式的天之骄子。于是他可以虽然偷偷摸摸，也实在堂堂正正的另外找一个年轻的女子。万一太太就是目前这位有钱的小姐，一辈子靠嫁奩，就吃着不尽，无须自己谋生，大有时间专用在打扮，哪怕是驼了背，也可以作贾宝玉一样的打扮，因为天生是情种啊：也就因为天生是情种，在社会上的责任就是讲恋爱，一切工作，一切功业，除了巴结一两权要，都不值一顾，不用操心，整个心机就都可以化在诱引女子。而且太太总该讲礼，爱的表现，认为应该使丈夫快乐，就可以代为勾引。自己是长者，当然得受年轻女子的尊敬，信托，理所当然亦礼所当然，于是方便就多了：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告诉最善感的生物说，他过去实在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人家就更不由不同情。不错，既如此，再加以随年龄俱进的老练手腕，准可打倒一切哪怕是漂亮小伙子的敌手。等到人家抓到手里，又可以

把礼解释为爱的表现来驯服她，叫她完全自愿的受约束，岂不妙哉，你看！

然而，天，他自己也会有小妹妹的，他自己也会有小女儿的！他忽然像受了雷殛，可是人还没有死，显然只是给了心里的魔鬼一击。他自然还是悚然，想到这个可爱的礼说实在可怕，有如飞机的发明也可以把意中人从天外送来，也可以把意外的炸弹从天外扔来！一切全在人。“神经病”究竟本质好，有天良，现在全然忘记了对目前这一个对象做征服工作，反而起了一种全然不由自己的说不出的感情，叫他感觉到心里热烘烘。这像人吗！是的，这就是“人而不仁”的今译。他马上觉得自己像喝了酒的狐狸精忽然在裤子后边露出了尾巴，不觉脸上也顿时发烧起来了。

“你喝两杯咖啡也会醉吗，”对座上又裂开了红皮白子的小石榴，小酒涡又圆圆的洼下去像预备装酒似的，“你这样不中用？”

“真是银样蜡枪头！”“神经病”满面通红的解嘲说。

这样倒真忘记了原先的坏主意：骗她说前几年已经结了婚，娶了一位非常美的贵小姐。因为他现在明白了：有太太可以解除对方避嫌的武装，美可以激起对方的醋意，而且现代世界，结过婚决不会妨碍新发展，正惟年龄大了还没有结过婚的才会叫大家认为谁都不要，也就当真谁都不要了。虽然如此，他还终于想起了今天的电影，就跟她谈了。一听说影片叫《结婚进行曲》，温柔的朋友马上得体而有礼的把脸稍稍一红，把眼睛向下一垂，于是趁势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而说了：“哎呀，时间不早了！”

温柔的朋友回了东。这又成何体统！可是小姐说她提议进来，她是主，礼所当然。也好，也好，“神经病”想，省了他二百元，十分之一的月薪，而且被请了，正好多一个还报的机会。他就洒脱的跟着立起来走了，手给她有礼的挽着她还不想穿上的春大衣，另一手很大胆的伸给她，可惜她显然出于假装的专心一意的翻手袋里的东西，忽略了他的姿式，不曾去挽他的手臂。这样，“神经病”当然不去挽她的，这是礼貌。他记得一位朋友结婚，穿了大礼服，却在照片里，代替了让新娘挽他的手臂，自己挽了新娘的，他现在就走一边告诉了温柔的朋友，笑了人家的失礼。

外边街上泥泞了，显然下过雨。看着她穿的饼干色的高跟鞋踩泥浆，他忽然想提议陪她去买一双套鞋送她穿，可是一想再不被接受未免太失体面了，而且想到最高明的办法，决不靠送礼去博得欢心，可不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忘记了陪她去买东西也是一个多接近的机会。

“对了，”温柔的朋友忽然请求说。“时间不早了，怕只好劳你驾，给我买一买票了。”

“买票！”“神经病”喜出望外了，推拒着钞票说：“今天下过雨，人不会挤，五点的一场还买得到票，当然，我请你看电影。”

“不，对不住，我说是往那边。”她说，用手向前面指一指。

原来前面路那边是长途汽车站。

票窗口虽然旅客排了一单行长列夹在栅栏中间，队尾却像树根一样蓬开来，大家挤做一堆，路警也维持不了秩序，解不了那一个结。

“神经病”虽然大失所望，惘然中接过了那张百元的票，一想到受了人家的嘱托，尤其是一位小姐的嘱托，就一股脑儿挤上那一堆去，自认这也是礼貌，全忘了对别的买票人的礼貌。远远的站在一边的小姐看得见他那顶呢帽被挤得摇摇欲坠。“礼失求之于野”，幸好有些乡下人对笔挺的洋服总还知道礼让，不好堵得太狠，他楔入了人丛。

“神经病”刚买到票，售完牌是挂出来了。他得胜回来，温柔的朋友就连连称谢了他一番，说要没有他，她自己来晚了，准买不着车票，今天车没有了，她就不能回家，而她明天一早就得从乡下的朋友家里坐小汽车离开当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失去，改坐飞机，怎么快也得等上一个月。

“离开这里！从此我们又不大有机会再见了吧？”

不错，温柔的朋友也表示惋惜。“神经病”嗒然若丧的时候，空汽车已经开来了，小姐依呼号上了车。

“神经病”还有礼的站在车窗外，自然有点不愉快。也为了礼貌，她不得不替她去买票，为了合乎礼貌里该放进感情，不应该只是具文的道理，他不能敷衍，得出于一番诚意的去抢买票，买了票，他当然就得送她走了，虽然明知道一分别他们又得几年不见面。她自己本来已经来晚了，一定买不着，自己不那样不顾一切的卖力，一定也买不着，买不着车票，她一定得留下来，于是由自己陪着看电影，吃晚饭，全局不也就改观了吗？她也许根本就不离开这里了！唔，“礼胜则离”！

可是又不，恨只恨礼还不周吧。他买了两张车票不就好了吗？他该送她下乡啊。也罢，这里规矩算严，一个人到票窗口只许买一张。而且，即便买到了两张，送到她乡下的朋友家门口，万一她说了“再见”呢，他当然只好回答以一个“再见”，要讲礼貌，他们还不是分手了？礼确乎是爱的表现，“神经病”又想，要不然他会如此有礼吗？可是礼就分开了他们。拒之千里之外，控之掌握之内，礼作为爱的表现来解释，也实在有这一点可爱而又可怕的魔力。

可不是，你看温柔的朋友越客气，越有礼的叮嘱他不要等开车了，他越有礼的等候下去？

于是“神经病”似从梦中被唤醒似的听见车窗里急切的喊出了声音，还是那个温柔的声音：“当心车子，当心车子！”

他靠近了车窗再回头一看，一辆先开的汽车从背后开过，还离得相当远，总难为温柔的朋友真是温柔的警告了他。他忽然伤心得流出眼泪来了，因为他多年来好像从没有受到过这样温柔的关注。

心地完全纯净了，他也决不再想留住她，希望汽车还没有出站就发生了障碍，开不出去，没有另一辆车来顶替，当场退票。

这一辆汽车也跟着动了，走了。温柔的朋友用一块花手绢在窗口有礼的摇晃——这也是爱的表现，不错，这位温柔的朋友真是解人。可是当“神经病”马上像由于那方花手绢上的一条线拉起来似的，应之以举起帽子来摇晃，送她远去的时候，他悲叹了自己的命运：让一条看不见的带子绕上了颈脖，随了汽车引出去，引出去，死心塌地的做了俘虏。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 1944 年 1 月 1 日《新文学》一卷二期）

小 说

夜正深

凯儿又哭了。

大概那张纸条贴出后，还没有人念过罢，他现在又哭了几回。

夜正深。天气还冷。一年四季，无聊地转着圈子，这回轮到春天他老人家似乎更来的没精打采，可是本人还没有入主中原，一片懒洋洋的慵气却早已传遍了人间了。在这时分，睡好觉自然不难，可是总还是无上的幸福。这间小屋呢，真也会受用：酣睡着，任黑暗淹没了一切景象，寂静消灭了一切声息，还有什么愁？还有什么苦？怕连梦的影子也无觅处罢。倒也干脆。然而它到底还未能完全忘怀，不曾更干脆一点地死了去：听，大概是它低微的鼾声了，这一阵哇哇的哭，这一阵呜呜的哼。一个哼，一个哭，它里面显然有两条生命了。

这个哼是被这个哭所唤起来的。

凯儿的哭搅破了他母亲的梦。

不过，她一向以为有时候有些人的梦境和实境之间的边界简直有点模糊的——梦里所遭逢的和日间的常没有多大差异；尤其是那些劳苦而孤寂的人，眼前老是单独的生活，脑里老是空茫的思虑的人。这个推想正确与否，且不用管罢，我们只要知道她自己是这种人，她自己是这样的。她每夜里，听了一二次梆声后，躺到床上，眼一闭，灯一吹，又像酸又像甜的疲惫浸透了四肢，便好像毫无心事地睡着了。可是睡着了不见得就算有了安息，她仿佛总逃不了（其实惯了，也不想逃了）待纺的纱啊，待洗的别人家的衣件啊，待盼望的在他乡谋生的丈夫来信啊，待设法节省了钱来做的孩子的衣服啊……

这几天可又不很相同：她神情有点恍惚，她夜里的梦境和实境之间的边界更显得渺茫了。凯儿不知为什么变得老在夜里哭。小孩子的哭本来算不了一回事，但是现在这一种情形却似乎有些反常的样子。她醒的时候，不时地听到他的哭，听到她自己的哼；她的梦也不时地由哼与哭这两条断续线，把胡思乱想错综地缝成。她一刻儿醒来，一刻儿睡去，老在如梦非梦中过了这几夜。

现在又是一阵哭。仿佛她的心在哭，哭声直从胸脯上来，——呵，她觉得凯儿翻动了一下。她还不敢断定不是在梦里，弯起了臂，把乳头边的孩子拢紧了一点儿，一只手轻轻地抚摩他的小身体，爱的想把他一口吞在肚子里，免被什么魔鬼见了，一把抓了去，于是她又愁了，于是她又悲了，可是没有忘了哭声，便不觉哼起来了：

妈在这儿呢，心肝儿睡罢，

别闹啦，别闹哭了妈妈。……

她真也要哭了。可是又觉得好笑：怎么她这样孩子气的，不，简直变成孩子了——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自己的母亲了！不，有什么可笑呢！她反过来一想，这倒也有道理，她仿佛从不曾有过一个母亲，至少不记得有过。小时候从小邻居们的母亲身上看出来，母亲好比一个鸟巢：不论逢到落雨，下雪，或是刮风，小鸟有这个地方好躲。你觉得闷损得很罢？来！做个好梦去罢，向这含笑的巢门里一钻！不错，她小时候，什么叫做挨饿，什么叫做受寒，她是很懂得的。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等天黑，也是常有的事。她也想找个巢儿，可是在哪儿呢？坏脾气的父亲给她的常是打，托寄养的伯

父给她的常是骂，伯母给她的常常是白眼。要是巢儿，她自然得不到这些东西的。后来人大了，她却还常有觅巢的痴念。她的丈夫待她还不算坏，可是他终年难得有几次在家，就是回来的时候，对于酒似乎比对于她要关心的多。然而他却给了她一个小巢了。现在她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那再不要独自坐在门槛上，瞪着眼看天了，只要看凯儿的小口一笑——

“哇——哇——”

“啊！……心肝儿睡罢……”

她委实有点不服气了。他不比小时候的她，她早已有温暖的巢儿，他有母亲百般抚慰，还想要什么呢，尽哭？唉！年纪还这样小——他还只有两岁——还没有尝过什么苦，还完全不懂事，如果他知道了她十多年来闷在肚里的委屈，他不知要哭到何等地步了？奇怪，怎么她总不记得当时曾经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呢？好罢，现在来补偿，跟他一起哭罢——可是他的哭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凯儿这时候大概也在做梦了。她很想知道他做些什么梦，可是他还只会叫几声“妈妈”，并没有告诉她。也拿以己度人的方法来推测罢，那她连童年的印象好像早已被生活的风雨吹打得褪色了，再也辨不清楚了，孩提之年的光景不用说更模糊了，那么，那时候的依稀梦痕要到那儿去寻呵？不过这一点想必是不会错的：凯儿的梦总不是快乐的，这从他的哭上看得出，他有些时候简直就在睡里哭——这倒有些奇怪，有些神秘了。可不是他在梦里早已看到了将来的不幸吗？她怕想下去了。

她把枕头移动了一下，头儿摇了一下，似乎把这种胡思乱想摇脱了。然而别的一批却又不绝地来，那也许是梦了。她想起那张纸条总是没有人念过一遍罢，要不然，他总不再在夜里哭闹了。她想起张家的奶娘说用这个方法来治是再灵验不过的了，要是她的话靠不住，上了年纪的顾妈可又这样说，从前伯母对她的女儿也曾讲过，何况“天皇皇，地皇皇……”连她自己在小时候也就学得会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忘掉呢。

她耳里仿佛又哇哇地响，口里便仿佛又呜呜地动了。

呜呜声里，她眼前映出了这个情景：是一个下午，她的纺车呜呜地唱着一个调子，照例把奶娘引来了这小主人笑，她抱着福儿走到了这间小屋。奶娘和凯儿的母亲照例闲谈了，谈起了孩子，于是牵连到凯儿这几天每夜闹上好多事。

“呵，这有什么要紧！一点不吹牛，这种事我见过多次了，你不用担心；就去，去请黄先生写几句，那是你也懂得的吧，暗地里贴出去，只消有人念一遍，那就保你没有事了。”

她被奶娘的话提醒了，自怨脑子太糊涂，连这个老方法也忘掉，早想到，可不早就没事了吗。快乐得什么似的，她随即停了手，到床上拿出了几个铜子，抱着凯儿，出去买了一张黄纸，一包旱烟；她把两件东西同时呈上那边酒店里的管账。他是近邻惟一的有学问人，一肚皮杨家将，岳家兵，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曹孟德八十三万人马……只要街上的年轻人，多灌他一点子酒，他面孔一红，口里便倾不完了。她曾暗地里想过，等凯儿长大了一点，有空的时候，不妨领他听听这位黄先生讲的故事，这样把他教养得自小怀了大志向，将来做个英雄，为她出一口闷气。不过这次去是只请他写个字。

远处的梆声响了，数数看——一，二，三。

听到更夫的梆声，她不觉想到算命先生的锣声了。这两种——一在死寂

的午夜，一在清冷的下午——清越的声音，她常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两种人也是怪有趣的，他们老是同样地，好像做着梦，一边走一边敲。——哦，算命先生没有对她说过凯儿的命很好吗？可不为什么从他现在的样子看来，他好像真的梦见了将来的不幸呢？唉，凯儿岂但是她惟一的安慰——淡而无味甚且不可口的生活所须加的一把糖，而且还是她惟一的希望哩。是的，她希望他做一番大事业，把这灰暗的乡镇涂上一些油彩的念头，果然也有过，可是，她觉得这未免太荒唐了，第一次想到的时候，大概正在快乐得发痴罢，以后偶尔提起，那无非算对她自己说说笑罢了；她常常映给自己看的到底还是这一张将来的怪画（到过大地方的人当然要说它是活动影片）：她枕头底下的铜子，一个一个的加多了——眼前一闪，暗红的小圆块变做几个白亮的了，又渐渐加多起来……又一闪，一间黑暗的屋子变成明亮的了，里面有几个含笑的脸儿：她一下子便在其中认出了已经成人的凯儿和她自己——停！她心满意足了。是的，她现在的生活也太难了，开门七件事，全靠她一人对付，老有点对付不过来。她的丈夫是没出息的，一半淹死在酒杯里了。除了算命人说不命好的凯儿，还有谁是她的希望呢！如今这个希望偏好像病了，也病的奇怪。还好，三天前她幸而采用了那个冶方，那不恳切不过的祷告，大概等天地人都无形中受了感动，无形中可怜他们子母俩的时候，凯儿自然会不觉到什么苦（如果有的话），自然会不多哭了。而且这又不很费钱。尽仗她自己哼哼来暂时止住他的夜哭也总不是道理。那天手续办完了，她料以后可以跟她的小希望一同安睡了，心里便一宽，就是她现在想到这儿也不由的觉得这样哩。

可是，一夜，两夜……现在是第四夜了，他还一样，不时地哭。

为什么呢？她想。她昏沉沉地想着：越想，越糊涂……

“好了，好了！”是奶娘的声音，从破门缝里穿进来，“你怕没有人念，现在我亲眼见到一伙人在那边念着呢。”

“那好了！”她赶快跳起来，走出去。一看，果然不错，有几个醉醺醺的汉子拥在那张小纸条下，其中有一个，带着笑，放大喉咙，正读到“过路君子念一遍……”

好了，的确有人念这张纸条了，——的确又有几声啼哭送到她的耳朵里。

“唉！”她知道又受了一次梦的骗。

又是一番：哼声轻抚啼声。

她现在真弄不清楚了。那张纸条贴出去，论时间，三天已过，论地点，所贴的那座墙壁是斜对着很热闹的赵家茶馆的，难道没有人念过吗？

呵，对了！她猛然警悟，那边传单，广告不是一向很多的吗？大概被它们掩住了。

这似乎是失望，实在倒是另生希望，因为假如真的被别人的东西掩住了，那可证明那张纸条没有人念过，（张贴广告的人只想贴得多贴得快，手忙脚乱的，不会注意到别人的东西，而且不一定识字）这样，可见不是这个方法的不灵验，那么只消再化几个铜子就行了。

凯儿又睡着了。但她现在越想，越疑虑，越睡不着。

她最后下了决心。好容易把身体撑了起来，她摸出一匣火柴，擦的一声，开一朵红花，点上了油灯。擦开厚重的倦眼，她瞥见一片零乱的颓败的印象：昏沉沉的灰黄光里，跳动着桌子，凳子，竹篮，纺车，盆，桶等等的影子。原来这间小屋里的倒是一堆乱梦呵！她没有注意，只留心轻轻地掩好凯儿

身上的被。她决定了，等不得天明，决定就出去看一看那张纸条到底有没有被什么东西掩住了。她踉跄地出了门。

街上异常昏暗，沉寂。向着那不远的一星黄光，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嚎。”她一眼看过去，一家门前有一只黑狗，死一般地睡着，只有肚皮上动了一动，并不像对她示威，却像压在梦魇底下挣扎出了一声。困人的春宵！走到街灯底下，一转弯，她立刻就在被大幅的广告我一块你一块割据之下的墙上一隅，看见一小张在灯光下看来全然是苍白的纸条了。它板着一副哭丧脸，挂着四行大黑泪；它仿佛有一肚子的悲哀，只是说不出，好像凯儿一样，也就好像她自己一样。她眼前一黑，她认得这张是她那晚亲手贴的；她虽然不识字，但相信那四行就是那几句烂熟的话。

她真不知怎么办，梦里似地，叹了一口气，滴两点泪。这个治方，她想，显然是灵验的了。她有点恍然。算命先生说的看来也是梦话。凯儿生来便命苦，是的，命苦！唉，凯儿的哭可不是就为了这个吗？那可没有法子了。儿呵，你怪谁呢？她为凯儿非常悲痛了，也是为她自己呵。她眼看这个可以得到安慰的小巢是动摇了，他尽这样哭下去，不会哭出什么不堪设想的事来吗？望望将来看，呵，正如从这灯下望到小街的尽头去——从昏黄到暗黑——渐远渐深，再没有闪电般活动的好看的画了。……

她几乎站不住了，可是想起了孩子，酸软的腿里又有点气力了，她赶紧拖着它们回家去。她的凯儿到底还在家里呵。她仿佛又觉得有哭的微音，仿佛在她耳里，仿佛在她怀里，又仿佛在她喉里。她一边蹒跚地踏着不平坦的道路，一边颤抖地几乎无声地哼着挂在那张小纸条上的四行：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她现在并不在求谁求什么，她知道天地也绝不会给这渺小的笨话感动的，人家也许还觉得可笑。不过，既然唱不出别的什么，就这现成的一哼，她觉得好像把凯儿的和她自己的无告也无从告起的苦恼，纵然不甚相干，稍为吐出了一点。

一九二九年三月

（原载 1931 年 9 月 9 日《华北日报副刊》）

石门阵

“诸葛孔明在蜀国的大门口，在两面高山把长江夹成一道水沟的地方，摆下了八阵图，叫陆逊那小子，烧了八百里连营，得意洋洋，跨马而来的，走进了只见左一块石头，右一块石头，左转弯，右转弯，石头，石头，石头，直弄得头都昏了，不知道怎么个走法。多亏他小子，人还机灵，一看来势不妙，就勒转了马头，对准了水流的方向，不管三七二十一，横冲直撞，弄得焦头烂额，逃回了原路，带回去一身冷汗。可不是，他小子险些儿做了小孩子在雪地上玩的转笼里的饿斑鸠啦。——这是《三国》里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

说到了这里，干咳了一声，木匠王生枝抬起了眼睛，打量了一番参差不齐、列在他面前的许多面孔。

男人的面孔，女人的面孔，小孩子的面孔。带胡子的有，麻的有，长雀

斑的有，带酒涡的有，一共十来张，在中秋前两天的月光里，有明有暗，可是全一眼不眨的对着王木匠上嘴唇正中的一颗大红痣，像是他们的北极星。

大红痣动了，全村人的心都跳了。大红痣是王木匠的记号，王木匠装了一肚子的《三国》、《水浒》。此外，他还是一个消息家，大家也爱听他讲时事。王木匠今天在宋长发家里，做完了凳子，吃了晚饭，想走的时候，给大家拉住了。隔壁过来的小梅子，拉得最紧，一手揪住了王木匠已经挽在臂上的锯木的木框。小梅子现在翘起了小嘴，显得特别得意，心里仿佛对周围十来个人说：“你们得多多感谢我。”

可是大家只对着大红痣，也没有谁说记得不记得《三国》里的八阵图，只是点点头，意思要王木匠尽管讲下去得了。李矮子最沉不住气，半认真半开玩笑说出了一句：“怕过些日子鬼子兵要来，我们不如请老王趁早在村子口也摆他一个八阵图。”

王木匠不但口巧，而且手巧，附近几村人一致公认。也许是从木牛流马学来的这一套好手艺。譬如，现在邻近各村子里常见有人用的由煤油箱改造的水桶子，也确是王木匠的发明。他的手艺不止见长于他的本行。

“对，我正要给你们摆一个和八阵图差不多的石门阵。我们叫‘聊天’，四川人叫‘摆龙门阵’，今晚我得早点回家去，只给你们小摆一下。不过几句话，一点新闻，石门阵摆退鬼子兵。”

老王停了一下，捡去才落到颈脖子上的一片枯枣树叶子，随即干咳了一声。

“来了，”大家一齐想。

果然——

“来了！来了，一群鬼子兵！”

一边说，王木匠转过头来望望山坡下转进村子里来的白路，仿佛日本兵当真从那边来了，起初把听众给吓了一跳。

“他们有多少呢？”王木匠接下去，好像问自己。“一团？一营？说不上，而且他们也另有称呼，就说五百个吧。不，前头走的只有五十个。吃过亏的大意鬼子，现在也学乖了，把大部队留在后边。

“他们先在远处山头上向镇上望望，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条小街上有人吗？没有。

“那个院子里有人吗？没有。

“那堆小树丛背后有人吗？没有。

“八路军走光了。老百姓坐在屋子里等‘皇军’去‘宣抚’呢。好，把望远镜放下了，那个什么长，那个头儿，吩咐先下去五十个胆子最大的‘皇军’到镇上去找一百个老百姓排队出来欢迎。

“‘开步走！’他们下来了，那五十个鬼子，骑了马。”

“这条镇不是就完了吗？”宋长发很担心的插上了一句。

王木匠并没有理他，干咳了一声，接下去：

“骑了马，得意洋洋，连八路军都打跑了，还怕什么呢！瞧，第一个麻子，腰板挺得多直啊。瞧，第二个是八字胡子，第三个是小耳朵。小耳朵回过头来，看后面跟来的都很威风，就把头昂得高些。

“真高兴啊。这么大的一条镇，那么多顺民等他们去‘宣抚’。

“小耳朵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闺阁房里。

“八字胡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铁柜里。

“麻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猪圈里。

“真不是好东西！”谁的声音？是李矮子的声音？因为西隔壁李矮子院子里的驴子忽然叫起来了，仿佛怕给日本兵抓去呢。说话间，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了村子，走过了几家了，麻子，八字胡子，小耳朵。

“麻子忽然在一家门口勒住了马。八字胡子、小耳朵和后边四十七个人都勒住了马。马蹄一停，满街上就鸦雀无声。“他们开始敲人家的门了吧？

“不。

“麻子一眼盯住了一家的屋门，不做声。

“小耳朵也放马上去几步，随后也一眼盯住了那家的屋门，不做声。

“他们看见了什么呀？奇怪。”小梅子插上来一句，仿佛代表了全场听众。

“他们看见了什么呀？奇怪——后边那四十七个皇军也这样问哪，可是没有出声。他们也一个个的挨上去看，麻子、八字胡子，已经走到前一家去了，小耳朵还停在斜对面一家的门口，他们也不做一声的在那边发愣，那五十个皇军。

“他们看见了什么呢？奇怪。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门里堵满了石头——石头门。

“他们索性向前跑，沿街向左向右转了两个弯。

“——路上——

“向左看：石头门。

“向右看：石头门。

“石头门。石头门。石头门。”

“干脆说吧，别那么别扭的，”宋长发老婆着急了，插上了一句，也仿佛代表了全场听众，“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也都在心里说了，他们的头都昏了。

“还不止头昏呢，他们的脸色都发白了。听，四面山头上一片喊杀的声音！打枪的声音！大八路吧？看山头上那么多人呢，糟了！糟了！”

“好了！好了！”谁的声音？仿佛听众大家的声音。

“后边山上大部队的鬼子兵呢？”有人想得细密一点，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顾虑的问题。

“胆子最大的已经吓成了这个样子，胆子小的还不趁早溜之大吉吗？”

当然，不用说了，王木匠接下去：

“多亏他们这一批鬼子，还没有糊涂到底，他们勒转了马头，死命的踢着肚皮，向左，向右，转了两个弯。他们就横冲直撞，向原路连奔带窜的逃命了。”

“这次他们想不到放火了？”

“怎么想不到！麻烦就在这里：左边是石头门，右边是石头门，

石头门，石头门，石头门，你叫火从那儿放起！窗子也堵住了，墙又都是石头墙，土墙，引不起火的。所以只有镇头上三所草房子遭了殃，可是里边也是空的，也没有烧到什么东西。

“逃出了镇口，在路上，心里跳得像马蹄一样急呢。

“麻子还在想：我这么一身肥肉不至于喂他们的麦田吧。

“八字胡子还在想：我抢来的装在皮夹里的七张五元钞票不至于被他们

捡回去吧。

“小耳朵还在想：我怀里的老婆的像片不至于被他们拿去上报吧。”

“老王，你活像钻进了他们的心里了。”李矮子说，意思是两重的，一方面是表示不相信，一方面表示惊叹他叫人不能不相信。

“你不相信，你把三个鬼子拉来问问看，到底我的话对不对。”

老王说得全场人都笑了，都觉得李矮子说得实在是多事。

“胡老三，”王生枝说，把眼睛特别对准了一个衔着旱烟管的男子，“昨天你在城里，也在南教场听过那个政治指导员的报告的，你说我可曾撒谎。连地名我都可以说出来，那条镇叫洪子店，那是在山那边，太行山那边。”

“大致还不错，”胡老三虽然听过政治指导员的报告，可是在这里还是很耐烦，不，很高兴的，不做一声，一直听到了此刻。现在仿佛想不让王生枝一个人出风头，让大家说同样听了人家的报告，只有王生枝并没有白听，抓到机会，他也想说几句，补充一下，他说了：“部队在镇东十五里地方，和敌人打了一昼夜。因为对方火力凶，眼看抵不住了，营长在黄昏时分送到镇上两个命令：一个是‘乘夜作有计划的撤退’，另一个是‘第二次收回洪子店’。农民救国会就集了五百个会员，在三个钟头内把全镇上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把女人小孩子送到后山，连猪羊都赶去藏了。五百个农民救国会会员一放下了桌子、椅子、箱笼，就拿起了枪，躲在围山上等了。不过，老王，这一点你可记错了，门是用砖头堵的。”

“那有什么关系，砖头门就砖头门。石头门说起来好听一点。只要不是木头门就行了。木头门烧得开。上次苏家峪不是给门板都烧光了。难为他门鬼子兵想得到，劈门板做饭。听说洪子店前一次也烧去了许多。可是凭我老王一年来的体验，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守住了大门，不用关二门。你看，鬼子兵来把洪子店的门板烧了，洪子店听那位政治指导员说现在情形倒很好，大家只当心大强盗，镇上全然是夜不闭户。对，把我们的门板烧掉呢，我们就夜不闭户。”

“那你就少了一笔生意了，人家以后还要你做门板吗？”李矮子逞能，想嘲笑王生枝几句。

“如果你老婆靠不住，做了门板也关不住。”

大家笑了，同情王生枝。

王生枝重背起锯子，在月光里走回家去的时候，倒认真的想起当真到了处处都夜不闭户的时代，他可以多做些桌子、凳子，甚至于椅子。他常常想做一张极精致的衣橱，已经设计了多年，现在想不久总可以有做成的一天了。不过他知道大家还得先摆多少次真正的石门阵，自己这个村子迟早也免不了摆几次，不是用口，而是用真正的手。“也得用手。”想到这里，王木匠看看自己结实的突起了整齐的老茧的掌心，说不出由于哪一种情感，不由的感叹了一下：“我这双手呵！”

（选自《沧桑集》，一九八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红裤子

安居村一下子黯然失色了：娘儿们一齐换去了红裤子。

安居村离同蒲铁路线只有十里路，以前曾经到过日本兵。老百姓回到曾经逃空过的村子里，才住了两个月，还没有把一部分被烧毁的桌子、板凳补充起来，今天下午忽然听说日本兵沿铁路挨村“宣抚”，到了北边八里外的

吕村，吕村的一个八岁小姑娘遭遇了论年龄该不至于遭遇到的不幸事件，而村公所又正好接到了一个小汉奸偷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明天安居村老百姓得静候“皇军”来“宣抚”，如果预先逃走一人，“皇军”到了就不给安居村留一所房子。于是全村震动了。娘儿们无意中一下子就学了“摩登”，把头发都剪短了。部分女子恨起了以前不曾放脚。不过最惹眼的到底还是红裤子。

怎样换去红裤子的问题，可难倒了过门才两个半月的关小双的老婆。她的红裤子在村里算最新了，虽然也曾经在山沟里蘸过黄土，仍不失其鲜明。愿不愿意换，是已经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问题是拿什么来换。上次连夜逃往山里去的时候，在慌乱中，她把一包衣服——其中还有关小双的衣服——给丢了。两个月内她还只补充了一些替换用的贴身衣服和鞋袜。如今把红裤子换下，她得穿什么呢？已经到娘家去找过了，她也没有法子。此刻她只好坐在炕上，在黯淡的油灯下，一个人兀自发愣。

可是也愁眉不展过一个下午的关小双回来了。竟然一下子很干脆的把问题解决了。

年轻的关小双，黄昏里在村所和村副拌了几句嘴，心里老大不高兴，回来看见老婆还穿着曾经叫他看了高兴过的红裤子，只呆了一下，就把自己穿的黑布裤子脱下，向她的膝前一扔，说：“你换上！”

老婆向他看了看。

他向老婆看了看，加重声气说：“你换上！”

老婆熟悉关小双的脾气，不敢问什么，只有服从他这个荒唐的命令。

他们把上身的夹袄也交换穿了，黑绿两色，交代清楚。

年轻的老婆满肚子惊疑，可是不敢作一声，眼泪汪汪的看了丈夫又走出门去，一边说：“睡你的，我明天回来。”

第二天早上太阳才升到树梢头，“皇军”果然到安居村来“宣抚”了。他们一共来了十一个，可是只来了十匹马，因为其中有一个汉奸，没有骑马。

在当众“宣抚”以前，因为累了，汉奸先把他们领到了村公所，吩咐村副备茶。

“‘皇军’决不吃你们什么，”汉奸说，“煎几张葱花饼来就得了。”

“是。”

“‘皇军’决不要你们什么，”汉奸说，“只是你们在静候‘宣抚’的时候，就去找一担白菜。”

“行。”

“找一担萝卜。”

“行。”

“再找一百个鸡蛋。”

村副皱了皱眉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行。”

十匹马在村公所前面的广场上吃黄豆，七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在村公所的纸窗内吃葱花饼。还有三个日本兵呢？他们早就到外边去了，说是去看看菜田。

吃够了东西，胖头儿向汉奸说了几句话，汉奸马上转头来对村副说：“要‘宣抚’了，去打锣召集全村人到前面场子上来听话。”

全村八十户只到了八十人，不多不少。其中一半是孩子，被村副拉来凑

数的。一担白菜，一担萝卜，一担鸡蛋，都摆到了村公所门口。

胖头儿站在阶石上，开始讲话，日本话，汉奸翻译。大意是“皇军”战无不胜，他们是来保护中国人民的，八路军、决死队是土匪中最野蛮的土匪。以后要时时刻刻报告“皇军”以土匪的消息。

然后开始了问答：

“皇军杀人放火吗？”

“不。”

“你们怕皇军吗？”

“不怕。”

“那么为什么土匪来了不走，我们来了你们就跑呢？”

全场沉默了。

结果也只好来几句安慰话：

“下次我们来了不要跑，像这一次一样不很好吗？我们不惹老百姓。”

现在他们要走了。他们看见蔬菜也到齐了，鸡蛋也到齐了，就是自己的人还没有到齐，缺了三个。胖头儿叫汉奸问老百姓看见那三个“皇军”到哪里去了。

谁也不知道。

村副打发几个老百姓去找。

他们去找了半天，回来说：“没有见。”

村副自己也去找。

关小双家里的那个小妖精在村里打扮得最花枝招展，一定迷住了那三个色鬼了。一边想，他一边推进了关小双的屋门。一看见关小双战战兢兢的缩在炕角落里。他觉得又气又好笑，一口气说了：

“哈，你关小双今天也学娘儿们不敢出头了。快说你老婆把那三个鬼子勾引到那里去了！”

他说完了才认出面前的就是关小双的老婆。

气得无从笑起，他又挨户搜寻去了。

半天，他受气的回来，说不出什么话。

可是雷霆已经在他头顶上响了。糊涂中他已经发现了自己被绑在一棵白杨树上。

全村人都慌了。

好了，有人拉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边说：“他知道，他知道。”

“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汉奸驼了背，气焰可也不小。

“我看见他们在村东口追一个红裤子，愈追愈远，追到山里去了，再没有看见回来。”

汉奸把话译给胖头儿听了，胖头儿向汉奸头顶上爆出去一个霹雳，从汉奸口里传出来就变了：“给我把红裤子找来！”

全场人都呆了。

可是人头中一个向白杨树外一转动，急遽的说了一句，数十个一齐向南边转动了，像遇了一阵轻风的麦穗，随即骚骚然重复了那一句：“红裤子来了！”

大家从南边看见的是：一个穿红裤子的大踏步跑来，全然不是走的女人

步伐，后面跟来了一群兵，穿灰色军衣的，不是那三个“皇军”，他们一齐抄小路向村公所直奔过来。

“红裤子来了！红裤子来了！”

可是那七个“皇军”一齐跳上了马，再没有说一句话，往村北就跑，撒下白菜、萝卜、鸡蛋，撒下了三支三八式步枪和三匹马。汉奸想骑马，因为日本马高，试了两下，没有骑得上，也放步向北就溜。

红裤子来了，可是要把红裤子找来的却只顾逃命了。

可是驼背汉奸并没有逃脱，被年轻的关北水赶上去抓住了。

穿红裤子的就是关小双。他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这三担东西正好慰劳游击队。”被游击队解开了的村副感激得直流泪。

“可是鬼子马上会再来的，”关小双抢上来说了，“我们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那么怎么办？很简单，全体进山去加入游击队。就这么办吧。大家同意了。这时候在场的已经是五百人。

一小时内，一长道人流缓缓的流向山里去了，杂在人流里的还有牲口，牲口驮一些搬得走的家具，驮一些女人和小孩。女人和小孩抱着包裹，抱着鸡。

关小双和他的老婆走在一块儿，远看起来还是一对男女，可是很容易招致恰好相反的误会，因为他们还没有想起换衣服。

当夜，在游击队司令部，经司令特别招去夸奖说，活捉了三个日本兵，一个汉奸，夺获了三支步枪三匹马，招来了一村的男女老少加入游击队，都算得是关小双的功劳，听到说要好好的犒赏他一番，关小双就提出了“我只要一套军服”。

司令笑了，因为到这时候才又想起关小双还是穿的红裤子呢。

于是一套灰色军衣找来了。关小双立即换上了。然后他把那一套绿袄红裤子弹去了一些尘土，折叠在一起。

关小双挟了那一叠衣服，得意的走到住那些预备第二天到缝纫厂去的妇女的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老婆，把那一叠衣服轻轻的向她的膝头上一搁，用左臂拢了一下她的肩头，含笑说：“等将来太平了再穿。”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站

（原载 1939 年 4 月 23 日《今日评论》1 卷 17 期）

一元银币

瑟瑟作响，七、八张角票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来了，棉布贩子还没有抖完他的手。他的额上和颊上，眼角和嘴角，从平铺的尘土里绽出来几道皱纹，长长短短，都作向心的新月形的曲折——这是微笑，也就表明了他并不是害怕，却是带了爱惜与得意。他挑出了两张，放到砖台上几点残余的烧饼屑中间。坐在对面正在喝小米粥的客人望过来，正走到砖台前的烧饼铺主人也望过来，目光交集了，一看：这不两张崭新的上党银号的二角票，虽然是石印的，上面花纹还明细清晰，房舍田亩的景色未受丝毫糟蹋，尤应感谢保持者特别的爱护。

店主人把角票收下，右手拿着朝左手指尖上一弹，随即转身向后一扬，像一个变戏法人展示他刚造成的奇迹给全场的观众看似的，说着“不坏”。

可是他忘记了背后没有座客了，只是另一张与这边一张遥对的长砖台与砖台平行的两张砖凳。若不是由于天然环境的关系，定算得山西人生性厚实与爱好坚实的自然结果：村镇小店子前头屋顶下，往往代替了木桌子或竹架木板面桌子和木凳或竹椅，安几座土垒或砖砌的长台和长凳，一如他们普遍的用土炕或砖炕代替了床。可不砖台土凳更有一种实际的好处，无需搬进搬出，夜里关在门外，正因为没有腿子，不会失踪，如是以忠实补偿了死板。以不变表情的冷眼看尽了人来客往，包裹搁下，担子挑起，如今它们大似不屑看店主人手里这两张脆弱的纸片。还是就在烧饼炉子旁边的店主妇救免了她丈夫的落空，应了她一声，顺便凑趣的开了那位客人的一点玩笑：“他真舍不得呢。”

“刚才看你哆嗦的样子，”店主人转向布贩子说，“我以为你想拿‘准备’票来使了。”

全场四人，有声无声，不免陪他一笑。

大家知道北平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顶在“皇军”、“皇协军”的枪刺上，戳向华北每一个角落，像刺在饕餮者叉子上的一角面包片，满想蘸光全盘的油汁。日本势力所及的地方或时候，大家忍痛收用，但说或不说，彼此心照：这是冥票！冥票充斥，世界也就是鬼世界了，老百姓和平成性的于无可奈何中以此自嘲，不觉得已经上了事实教他们的一课经济学原理。使用“准备”票等于汉奸行为，即在此地也都默认，虽然这里神火村居东阳关与长治之间的大道上，如今经常有日本兵经过，大队行军，小队巡逻。打仗以来，这里先进来了他们，乱过三个月，又退出了他们，太平过一整年，到今年夏天才又如投入了波浪：一切复归于不固定。一切都在那里翻筋斗。村东口庙门前的百年老柏树，如今让一把无名火销毁了七、八株。顺村子两头延伸的黄土岗，好像是从来如此，稳如泰山，年来却由于日本兵要横里走，顺脊梁挖出了一条马路，由于中国军队和地方游击队要竖里走，像砍排骨似的切过了一道道深沟。沟上日本兵白天来抓人给修桥，修桥的夜里又自动来拆桥。因为坚壁清野不是完全无条件可以履行的，除了破屋所在，地无寸土，靠做小生意过活的，不能永远在外头穴居野处，烧饼铺主人常得回来，穿过连窑洞都塌的塌、倒的倒的废墟，到了铺门前，以一种无意义或包含了无穷意义的微笑，端详了依然如故的木讷的砖台。砖台上，在做买卖的时候，也时或不得不接受一些硬闯上来的帮凶的流氓——一些“准备”票。可是，不管怎样，“上党”票登台总被接待以上宾礼。

“武安城里才好笑呢，”受了揶揄的满不在乎，一边站起来俯就布担子，开始感慨起来了，“你说只准用‘准备’票吧，他们自己却不要，专收刮‘中央’票；你说不准用‘上党’票吧，哈——”他未说先笑

了。“我上次从武安回来，在西门外碰见一个‘皇协军’，给他搜出了十块带零的‘上党’票。怎么办？把钞票往地上一摔：‘这种票子能用的！该枪毙！滚！’他喝走了我。等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一看，好，你说怎么着？那小子东张西望的，把钞票一起捡了起来，手忙脚乱的塞进了口袋！”

这一点，体会起来，的确值得叫大家眉开眼笑。上党银号是晋东南区——上党古郡的地方银行，成立才一年半，以法币——“中、中、交、农”的钞票为准备金，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几种小票，原冀只应游击区的实际需要，抵抗侵略，即在当局也不曾料到如今竟获得这样大的信用，居然

能够攻入邻近的沦陷区。

比别人更兴奋，手舞足蹈之余，店主人忽然从屋里捧出一个抽屉来，放到座客未散的那张砖台上。大家聚拢来一看，立刻接触到一种洋洋大观：乱混在一起，“上党”票，四省银行票，山西省银行的旧票与新票，“准备”票，朝鲜银行的老头票……

更出人意料的，店主人用手在抽屉里搅了起来，于是一抽屉钞票你追我逐的旋转着，宛如秋天墙角落的一堆落叶，被疾风一吹，团团滚转，悉索作声，不由得搅动者罢手感叹了起来，用了一句旧戏里的道白：“金鼓喧天，好一场厮杀也！”

店主人越来越不像山西人了，他身上的河南血液仿佛把他的脚跟涌离了地面，飘飘荡荡。“你们听不见吗？”他接着说，“惨得很，惨得很，不差如大炮、机关枪、炸弹、手枪、盒子炮、迫击炮一齐发作。也别小看了这一场混战，我们的老命一半都还牵缠在这里呵。”

当另外三个人刚要自觉到相对无言的时候，他从票堆里捡起了一张一元的“准备”票，像挑选小猫的提着一只的耳朵，很在行的顾左右而评论说：“看这小子打扮得倒还漂漂亮亮，谁知道是草包！可是，”他压低了声音，简直像在耳语中接下去，“我们这边也有些来头不正的送来了鬼混。看这个二花脸。”他另捡了一张，这是“满洲国”银行新发行的一张五元票。“这个小花脸。”——同上的一张一元票。“这个大花脸。”——同上的一张十元票。“也不是我给它们取的这些浑名，大家都这么叫了，是不是？票子吃得了人，可是别先吃了自己人呀！”

“可是你好像很看得起这张老头票，”看得忘记了上路的布贩子讥刺了一下。

“难道我把它烧了吗，既到了我手里？”被嘲者反问。“我们现在不该闹那种笑话了。你听说过吗？去年初打仗的时候，有一支部队，抢到了日本兵好儿千块老头票，太聪明了，都拿去烧了，说是叫他们‘经济破产’。哈哈，我也学得来这个新名词了，可是我能这么做吗？”

“‘中央’票近来太少见了，”店主妇插进来说，“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凶是吉？”

“这我明白，大家舍不得用，也不让随使用是好的，”布贩子正挑起扁担，便抢先回答，“免得鬼子用‘冥票’来把‘中央’票换去，拿到天津捣乱，或者换美国钱买飞机炸我们。现在只有万不得已要过去办东西的时候，银号才换‘中央’票给我们，还要看买什么东西。像我这些布就行。这样我们用‘上党’票就可以把‘冥票’堵住了，别看它印得差。年头儿变了，大家心眼儿要活一点才行；用得着，哪怕真正的冥票也可以拿去使，事在人为！”

对面一边喝小米粥，一边吃烧饼的那位“老先生”，原先一声不响，只是出神的听，听到这里忽然一怔，手扶下的粥碗里起了一阵涟漪。

大家目送了挑布担的走了以后，转身沉思起来的店主人不觉又感叹了一句：“可是说来说去，这些都是纸啊；我可还忘不了从前看一块银币的真假，总要在桌子上敲出的一声‘——’。”

“噢！”“老先生”不觉叫出了一声，仿佛这一声“——”就是一元银币恰好打在了他的心上。

“老先生”是从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城里来，在回屯留乡下的路上，偶尔在此打尖。拎了个小包裹，一个徒步的旅客，不知道还是由于卷起了下幅的黑长袍呢，还是由于稳重的举止，却被店主人招呼成了“先生”，而且因为他嘴上已经留了一撮下垂的小胡子，加上了一个“老”。其实他并不老，才四十二岁。也还是遵照了他自己的出门哲学和他的天生特性，他穿了最朴素的衣装，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不愿泄漏他的真身份——邯郸城里晋泰钱庄的管账。他用尽了心血，才终于攀登了这个尊贵的台阶，却不料建筑本身——这种山西人特长的传统钱庄业——会在战争里坍塌，在他更无异山崩。虽然他及时的另外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不曾完全落空，他总觉得失了依傍，没有着落。还有老家呀。好，老家又连续供给了他翻了船的感觉。而他是山西人，本来就已经不惯坐船了。这次也是家里来的一点坏消息使得他心里空虚，脚里沉重，在兵荒马乱中，走上不保险的归程。

经过武安，初发觉已然接近太行山脉的刹那，“老先生”看见山也在那里动荡，原来他自己像捧稳了一面盆水的，忽然跟墙壁一碰，制不住满抱的波澜。他还从没有见过海，可是也想象得到河北大平原已经是一个海：人流、水潮，“扫荡”、“反扫荡”，汹涌壮阔。公路网、壕沟网，此纠彼缠，难解难分。靠打游击、靠打埋伏的唤出了“要改变地形”，地形果然变了，高低不平了；咬紧牙关，说是不要汽车路也得向田野里把汽车开出去横冲直撞的，弄到还是走投无路了，索性决开了沙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放他个一片汪洋——真的水来了！平汉铁路像是堤岸，可是也常被冲断，于是站在堤岸上的“老先生”居然晕起了船。“回去吧，我是‘山国’人啊！”有一天，他在账桌上打算盘的时候，忽然慨叹了起来，带着苦笑。他想起开战不久他回家的时候，老母亲问他说：“现在年轻人天天嚷着什么‘国’，什么‘国’。我们是什么‘国’人，是‘山国’人吗？”想到这里，露出黑牙齿，莞尔一笑，他不觉平下了不习惯的感伤，于是再望前去，虽然远的山峰还有点隐现无定，近的山坡果然屹立不动，展示其黑石红土，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十分确凿，非常可靠了。

“靠山”这个名词，他常想确有条理，水可怎么能“靠”呢？他很得意。他和一般山西人一样，不喜欢吃鱼，可是比一般山西人更多一个离奇的解释：“鱼性浮，吃了鱼不会过安定日子。”他对于吃，根本就不主张讲究，认为东西一到嘴里就看不见了。因为衣服不如房屋坚固，他还认为衣服轻于房屋。他有余钱总先用以盖房子。谁一进他“山国”里的老家，就可以看见窗格方方正正的，院子的石板也方方整整，因此房主人脸上嵌着的微笑也似乎方方整整。可是他却并不如乡里人一样的满足于抱这一种主义：“一所房子，一缸酸菜，一个老婆。”认为这是懒惰哲学。人固然不应该想飞升，人却总应该着着向上，有如山。

山、山、山，屋前屋后，山环山抱，他常认为是理想境界；可是他难得想到这里的优点在一定时候也就成了弱点——脱不出。这种时候确乎也难得来，感谢山西的得天独厚。民国以来，到处岁无宁日，山西独免于杀伐，“老先生”常以此自庆自豪。可是现在连山西也在动荡中了。战争如水，无孔不入。不但如此，平原如滩，被淹没固然容易；山地如礁石，爱冲击却最剧烈。正因为地险，山西为双方所必争，争了也难以解决；正因为深藏，他本乡的村子被游击队用作了根据地，侵略者总要来碰它一下，哪怕结果还是弄得焦头烂额了回去；正因为房子大，房子多，他的家屋游击队来借住过，那倒没

有什么，日本兵也两番光顾了，那可——啊，就是这个挖空了他精神的基础！

事先他倒不是毫无先见。土地最安全，他知道。“哪一朝天子不完粮！”只要完粮，地还是属于地主的，任他们在地图上把它划来划去，圈进这里，圈进那里，任他们把它涂上这一种颜色，涂上那一种颜色。地是活的，地里可以长出东西来；地却是搬不动的，放在那里无法盗窃。屯留是出名的地好，他在十年前就在和长治交界的较平坦的处所购置了六十亩。新地主每隔一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总也绕道经过那里看一看，总是很高兴的看了苍黄的大地上那里的千行万行的青青麦色。打仗了！好，让马蹄在那上面乱踩吧，让车轮在那上面乱辗吧，让炮弹在那上面挖几个坑吧，不要紧，也总还在，且不怕时间，不会老。可是才庆幸没有被新汽车路切过，他忽然听说地被新从后方开到，不明游击区情况的一支部队占了一部分，修了大操场，接着又听说被重新打来的日本兵差不多占了全部，连带邻近的田地，把大操场扩大成了飞机场——“那些‘轻骨头’的坟地！”他咒骂着。

还不要紧，落水的抓住了一块木片——“我还有钱！”钱是垫脚石，依照他平素的意见，人是一样高矮的，而人有高矮，高矮就见于脚底下钱垫得厚薄。可不他究竟保守性重，认为只有种在地里，钱才有稳定的生长。甚至于要它生长，他都不着急，他只在乎抓住根。钱本身确是一个根，包含了一切可能性。钱里有土地，有房屋，有布匹，有酸菜，有醋，有老婆，有子孙……可是钱却还有一样好处：可以是千行的鱼鳞瓦、万行的青麦苗，而不必就是瓦，就是麦。它是活的，而它又是摸得着的东西——根！然而世界终于看得见的变了。仗打起来了。如在梦中，他看见酸菜缸、醋坛都大起来了，更大起来了，而钱的容量却步步减缩，愈来愈包不住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把他从梦里拉了回来，使他神思恢复了稳定，看见桌子还是一样大小的桌子，凳子还是一样大小的凳子——一点白亮的东西。

他还保存着三百元银币。

这是他过去财产的很小一部分。他一度悔恨当初没有多存些，还是怪人还年轻，向上心切。可是终不虚在钱庄过了大半辈子，他总算学得了一点聪明：远在币制改革前好多年，他就窖藏了一批银元。他慢慢精选了清一色民国三年造的“袁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怎样在昏黄的灯前，搬过平滑的肥肥胖胖的袁世凯的侧面，放正了，用钢戳在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打了一个十字，像给贴了两条橡皮膏。当他把它们一排排整齐的放进一间只许他自己用，平时总上锁的房间里炕角上方一块活动砖背后的墙腹内的时候，他兴奋得手都发抖了。上一年，就是开仗那一年冬天，他回家的时候，他检阅过一次，一切无恙。可是他始终连老婆、儿子都不让知道，因为不得不如此，为了安全。

现在一封信来把他召回来了，而且使他一路走来都觉得一脚高一脚低。打仗以来，他们家屋驻过军，也两度到过日本兵，却没有被烧掉。他特别嘱咐在家的二儿子在信上详细报告他房子的情形，不放过一瓦一砖。可是现在致命的信来了。最近，打扫房屋的时候，儿子报告说，他在那间特别室里，因为打蝎子打动了一块砖头，拿起来一看，外面似乎有打栓子或钉子而没有打得进的一点痕迹，再往墙里看去，那里是空的，不见什么东西，除了另一只蝎子和两张团在一起的昭和十三年（先一年）三月份的旧日本报纸。

如今店主人口里一元银币的一声“——”，在他老先生听来无异于深山里午夜的钟声，可是并不能使他从梦里醒来顿悟到“四大皆空”，只是，相反的，使他回到了现实里，明切的感到了心痛，有如一杯过饱和溶液，经过碗边轻轻的一句敲击，起了沉淀作用，混沌中重见了结晶的颗粒——他太厚重了。他觉得需要讲话和听话——人家替他讲话。于是他信口发动了一句：“你这里倒没有毁了什么，全村都好像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他不自觉的摸一下厚实的砖台。

“可不是，”店主人首先漫应了一声。他正怕冷清，正愁没有人听他说话，现在经这一推动，舌头马上滑了下去。“不要说房子，”他接着说，“连那么多窑洞，结结实实的窑洞，都给鬼子弄得瘪了额角，豁了嘴巴，比骷髅还难看，有的长年打着哈欠，盼不到主子回来了。可是‘二月十五打鬼子’也确乎打得痛快，你老先生听说过吗？”

关于那一次战斗，店主人讲起来总非常得意，也不知道对多少过路人讲过了，无意中尽了最大的宣传力量。事实如此，半年前八路军在这里神火村打了一次十分如意的埋伏，歼灭日军千余，夺获了军用品不少。“老先生”虽然也早就听说过梗概了，如今也不厌听店主人唾沫四溅的详述了一番，好像替他的话打圈点似的不时插上几声“唔”或“噢”。可是他终于开始感觉特别的兴趣了，一听到讲故事的补叙到村子的地形。

“这里神火村是在这样子的鲤鱼背上，”店主人一边说一边比样子，把两个手边合在一起，“四面望得开，大队人马怎么好来埋伏？”他说得很在行，宛如一个部队的参谋，实在也是根据了事后过路的部队里人的谈话。“可是地靠人用，地是呆的，人是活的，水银见缝就可以钻，他们就掩蔽在村北边路旁略高一点儿的坡上原先四川军挖来没有用的壕沟里，你说妙不妙？心眼当真不能太死啊。”

“唔！”“老先生”点头。

“也不能太小了，”店主人马上接下去。“魏海水，我们从前那个村副就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就活该了。他等鬼子兵一进东阳关就出来当‘维持会长’，还不是贪点小便宜。那倒还罢了，如果活一点。他可死结巴力的要‘维持’，不怕向鬼子叩头，越叩越弄得昏头昏脑。就是他拚命找大家来给鬼子修了门前这条汽车路——给他自己修的一条死路！那天鬼子的二百多辆牛拉车、马拉车，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也就是他招待了他们在这里休息，挨户找了人来给他们挑水饮牲口。他真心诚意，鬼子可实在上了大当，措手不及，挨了狠揍。所以他们说我们通‘匪’，还说我们把‘匪徒’化了夹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村子里只有一个人清早到坡上去的时候才看见部队在那里埋伏，他不能回来，不好走漏消息啊。好，村副还以为自己出了这么大气力，总对得住‘皇军’，到仗打完了，我们跟部队撤出去，他偏躲在家里——等‘皇军’犒赏吗？第二天鬼子兵开来报复了，找不到人，就正好找到了他，把他干掉了，还连同他的一家老小！”

“‘维持’得好！”“老先生”苦笑了。

店主人却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在砖台对面原先布贩子坐的砖凳上坐下，用黯淡的语调，加上了一句：“房子不能放在口袋里，牲口不能放在口袋里，能放在口袋里的钞票又经不起淋，经不起磨，经不起一根洋火，而且越多就越不值钱。”

“对了，”“老先生”经不住插上一句，“现在一元银币已经值十五元

了。”

“银元可也喂不了狗”，店主人又活跃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光棍叫韩居德，他倒有一块。那是日本鬼给他的。还在打那一仗以前，这条路上日本鬼的电线总是一架就连电杆木都给一起拆去了。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可是有一天鬼子来查问的时候，大家都不说，明知道说了，他们也没有法子，一个人活着，总得有一口气嘛。只有韩居德却出来说了‘是八路给背走的’，把两只胳膊反抱在背上，弯着腰，走了几步。”他自己也就这样比着，然后接下去：“一个鬼子兵头头就扔给了他一块‘袁头’。魏海水当天不在场，后来听说了，就很羡慕他，说他还得了一块奖章呢。他也‘中奖’了。”

“他也给宰了？”

“他最初是下落不明。我们躲到深山里就没有看见他，满以为叫逃脱的一些鬼子兵带走了：他不是得过他们的银牌，认识‘八路’，不是可以当‘眼线’吗？一个来月以后我们回来住。偏僻角落里的马骨头、人骨头也总得清理清理。我可交了好运了，叫我恶心了几天：我在一处树岔窝里撞见了一具没有烂干净的尸首，叫野狗吃得稀里糊涂！我正捉摸是谁呀，旁边一块白光一晃，原来是野狗不要吃的一元银币。一点也不错，就是那一块‘袁头’！”

四

“又是那一元银币！”“老先生”心里想，不由得一怔。好在自己不沾边，他还可以说点风凉话，开个玩笑：“这次轮到你得奖牌了？”

“晦气星！我把它埋了。”

“你还那么孝顺，拿它给这个光棍陪葬吗？”当然是不相信的口吻。

“我会？哼！”店主人显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然后逞能说，“你说我敢不敢把它拿回家来？”

“你当然敢。”“老先生”相信这才会是真相。

“谁都说这是不吉利的东西呀！谁都看都不敢看它一眼。我不迷信，可是把它带回家，果然先把家里闹翻了。我老婆，”手指指现在已经在屋内缝什么的店主妇，“可不答应，闹得我一刻也不得安宁，非得扔掉不可，最好还得赔上烧纸钱——送瘟神！”

“‘瘟神’？——唔，我也算送走了一批。”像是自言自语。

“你也送过？我不相信。送往哪儿了？”

“也是由不得自己呀。管它上哪儿！”

“我可只是在外边另找个地方把它埋了？”

“还是埋了？”“老先生”又不得不相信了。“可是埋得住吗？”

“它会活起来，长腿走吗？”

“人会走，东西也就会走。谁也管不住。”

“我敢保它还在那里。你不信，我们去看看。”

眼前发生了那么多变故，屯留老家墙洞里的秘密小风波，现在对“老先生”说来，也无所谓了，倒像心上搬开了一块石头。他不再像走在云端里，丧魂落魄。他现在倒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仆仆风尘，跑回老家去，去看什么呢？反正银币已经飞了，飞到了“皇军”手里，和他再不相干了。可是家里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却被日本军队的什么人揭破了，竟也是一声不响。厚实的墙洞竟和战争的海洋一线相通。他白白给鬼子献了三百元银币，鬼子却在这个

村子里扔下了一块银币——瘟神的奖章。开头店主人说起钞票战争，现在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自己仿佛也参与了，由不得自己，竟以他秘藏的银币给鬼子出了不小力。说不定鬼子撒在这里的“瘟神”也就来自他那样的窝藏。世界上的事情就会这样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算是缘份吧，偏偏在这里又可能见一眼银币。经店主人再三追问“要不要去看看？”就漫应了一声“好吧”。

店主人到里边去找锄头。“老先生”想起了那个棉布贩子。棉布倒是山里和后方迫切需要的东西，他想。他在邯郸的那个杂货铺，虽然不卖金丹、白面，却卖着许多日本奢侈品，还是损己利人。得，他想，写信给代他管铺子的大儿子趁早把营业路线改了吧。真做个“山国人”吗？笑话，先得做个“中国人”！跟着店主人出去，他看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想：“他倒也是个中国人！”

他们绕过小房子，曲曲拐拐，走到一个偏僻处，大概以遥对一棵榆树为记吧。店主人挖开土面，三铲两铲，就翻出了那块银币，拿给“老先生”看——正是块“袁头”。

“那一面太阳穴上有没有一个‘十’字让号？”“老先生”指点说。

“有！你看，”店主人愕然，把银币递到“老先生”眼前，让他认。

“啊呀！果然！”

“是你丢的？你送走的‘瘟神’？”

“一批里的一个。真是缘份！狭路相逢，世界那么大，又那么小。”

于是，“老先生”源源本本，把藏银币和丢银币的经过，向店主人公开了，也倾吐了刚才开始触动了的感想。

店主人最后灵机一动说：“银币也埋不住；出动了，别再叫这块走错了方向，当了‘瘟神’，叫它还跟我们站在一边来抗日救国吧。”

他请“老先生”把这块银币带去长治，送上党银号。

（原载 1941 年 5 月 10 日至 21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版）

海与泡沫

就像鸟叫，就像破晓时分第一只醒来的小鸟的弄舌，这一串声音，颤动在睡眠以外，颤动在黑夜里，给夜的玻璃杯划起了一条裂缝。不像第一声鸟啼以后紧接上来有百鸟的和鸣——夜的粉碎。黄土高原上的黎明原是寂寞的，也难怪。可是这一串声音近来了，近来了，伴随着另一种声音，不是鼓翼的轻响，是沉闷的重击，布底鞋踏过泥土的声音。是吹了哨子！窑洞口的门窗上两块灰白；哨子和沉重的脚步从这一排窑洞的那一头回来了，又经过了前面那两块灰白。响应它们的就有一扇两扇门的开动，三个四个人的哈欠，说话。梅纶年从铺位上滑了下来，穿衣服。灰白里表面上标明了五点差十分。正是昨夜临睡的时候，这些窑洞里的居住者各自负担在心上的时间！五点差十分起床，五点正出发开荒到十点钟为止。大家同意，因为十点以后山头上将是不可忍受的炎热。

现在又那么冷。天色还朦胧呢。是眼睛朦胧吧？纶年拿了面盆和漱洗的东西走到厨房前边去。他跟一些人影朦胧的点头招呼，朦胧的看人影向人影招呼以及说些像影子似的话语。手脚是乱纷纷的。好冷啊，纶年的脸已经浸到冰冷的盆水里。用手巾擦干了，眼睛就一亮。该就是刚才吹的哨子吧，他看见管总务的那个矮胖子同志，像早就洗好了脸，站在一边和大家说笑，手里晃着那个白亮的金属物。对面那个女孩子的满月似的白圆脸低到盆里去，

一会儿盆里就升起了一轮朝日，红红的，以微笑回答纶年忽然禁不住就让浮到脸上去的微笑，该也是红了脸的，既然迎来了这轮初升的朝阳。哨子再到矮胖子嘴上的时候，靠在土壁上的那一堆短柄的锄头当中就有好几把立刻到了几个人的手里，甚至于肩上。纶年赶回住处去放掉东西再来的时候，就拿了最后的那一把。再后来的只好空手。空手的，拿锄头的一样出发了。窑洞尽头的转角处就迎来了一股刺人的山风，像一把刷子。

从高处望去，四边是一片灰蒙蒙的阴海。无数的山头从阴影里站起来，像群岛。山头是热闹的，这群人却像一支孤军，佝偻着上坡，踩着像终古长存的一层灰暗的荒草。这些草菜似乎从没有吻过人的脚底。可是这些山头当不是从古就如此光秃秃的，而是由人，惟有人这种怪物，给它们一律剃短了头发。别看人的手小，他却摸过了所有的这些山头，就像此刻早晨冷峭的寒风，从这一个摸到那一个。于是河对面，西边，一个山头戴上了金顶。太阳光已经射到了那里。可是人也已经爬到了那里，看那些黑点子不是人吗？他们在蠕蠕的移动着，争着从阴处，从看不见处，投身到一圈金黄里做黑点子。

“看他们比我们更早，”有人说，“已经爬到了那里，马列学院的开荒队。”

于是，虽然看不见锄头，那些黑点子就像这边这些人的远影了，遥遥相对。

“他们还看不见我们，”又有人说。

而从看不见处，突然像回应他的话似的，响起了一阵女孩子的歌声：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这一只从当年春天流行起来的歌曲随风送来了一个开头，随即像一点葡萄酒一样的扩散了，于是好像到处都迷漫了这种歌声。

“女子大学的，”有人说，“一定是女子大学的！”

“看不见，”又有人说，“大概在我们旁边那一个山沟里。”

“我们也来一个，”第三个人说。

于是四五个人一齐唱起了：

二月里来好春花——

哨子响了！

“大家得种田忙呀，”管总务的矮胖子喊起来了。

锄头有九把，人有十六个，怎样安排呢。人分两班，每班八个人，二十分钟轮流劳动与休息，锄头留一把，以备不时的补充。十六个里边唯一的女孩子，那个圆脸的俱乐部主任，早已首先拿起了一把锄头，跑到指定的那个地带的底线上站住了招呼大家。纶年也就用自己一直没有放过手的那一把参加了上去。组成八个人的一个横列，像准备赛跑。不等哨子响，谁的一把锄头就起了步，扎的一声落到枯草地上，就捣翻了过来一大块黄土。

灰色的草皮上随即错落着翻过了七块土，棕黄得显明，就像衣服前面的一排大小不一的扣子。

八颗扣子早就连起来成了一条直带子。

锄头继续向前，向左右起落。

草和荆棘的根交织得全然是一张网，罩住了黄土，像是一种秘密的勾结，被翻过来的黄土揭发了。而每一块黄土的翻身，就像鱼的突网而去似的欢欣。

正如鱼跳出了网就不见了，隐入了水中，每一块黄土一翻身也就混入了黄土的波浪里。这一片松土正是波浪起伏的海啊！而海又向陆地卷去，一块一块的吞噬着海岸。不，这是一片潮，用一道皱边向灰色的沙滩上卷上去，卷上去……

这一道潮头的皱边是弯弯曲曲的。尽管有些锄头尽量向左右发展，中间的一片大陆终于形成了非洲的南部，伸在海里。向好望角正面进攻的正是那个圆脸的女同志。

“大家先解决这个非洲啊！”一位男同志吆喝了。

七把锄头就一齐包抄过来，向非洲的东西岸夹攻。有两把锄头更向非洲的后路断去，不一会完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好望角也早已坍塌，非洲成了澳大利亚。

“你们上前去，”女孩子喘着气说，十分娇媚的用左手向前一挥，趁势歇到圆脸的前额上擦汗，“让我一个人解决这个孤岛。”

七把锄头就上前去分担了一线。

一会儿这条线就大致齐平了，像海里掉下了一块大石头。尽管石头还是整块的横在水里，还没有消磨掉，水平面重新可以用一条直线表出了。

可是一会儿忽然有人从外边笑着喊出来：

“不行，老任，你这个个人主义者，你一个人开了一条河了！”

“河？”纶年想，有点愕然，“我们要的是海啊。”

抬起头来看，他看见果然不错，那个管记者分会的高个儿同志在边上孤军深入，向前挖成了一条注入大海的河，看起来非常别扭。

解决了孤岛的女孩子刚走过来动手在老任的河口开杭州湾，各人就接过了锄头，一边说：

“时间到了。”

纶年再举起一下锄头，觉得有人在后边碰了他一下，随即伸过手来接了他刚落到地上还没有掀起土来的锄头。

哨子也就响了。

斜坡上已经有一部份照了太阳。太阳光正从后尾赶上了那块两丈宽，五六丈长的松土，仿佛正检看一下成绩似的。而有人也就像替它作了评语：

“还不坏。”

说话的就是老任，他走到纶年的旁边坐下了。

想不到话是对自己说的，纶年仓猝间不知道怎样回答，只是漫应了一个“唔”。

底下却叫起了一个洪亮的大声音：

“看我跟小周两分钟里消灭老任这条个人主义的尾巴！”

向声音的来处望去，纶年认出讲话的是新文字研究会的负责人高雷。他正沿着老任的那条河的源头，迎着正面的海岸线捣土，像正在决堤叫河水泛滥。小周当然就是据在河口旁边海岸线上，斜向高雷迎上去的世界语研究会的负责同志了。

“看他们两个争地盘，”老任大声的开了头，却低声的说了，最后三个字变得专对纶年说了。

“唔，”纶年还是漫应着，虽然心里却想着：“好一个比喻！真像蓝净

的海里忽然翻滚出来一些没有淘尽的废铜烂铁！”

“你看见他们两个昨晚上怎么样，”老任又逼进了一步。

昨晚生活检讨会上的一幕就不由不立刻重现在纶年的眼前了：

在那个用作俱乐部，与图画室毗连的大窑洞里，在那张平常用以打乒乓球的长桌口，在十四、五个住会人中间，在检讨过两、三件生活上的问题以后，高雷忽然挺起他那个马脸而提出一点来要求大家“批评”：

“今天轮到我和周西同志下山驮水。结果我一个人驮足了两驮。并不是我自告奋勇，要独力担当，只是屡次找他，他连影子都不见。现在一天的事情都完了，他就坐到这里——这里。”

纶年愕然照他指点的方向看过去，认出了那个大家叫“小周”的同志。他在众目的集射中，并不窘红了脸，只是把脸色一沉。

的确对面那个马脸上也并没有一丝笑意啊！完全不是开玩笑。可是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为了这一点琐屑而居然吵起来也实在令人不易了然；那不是笑话吗？

“吓，老高装得多严肃，”当主席的俱乐部主任，就是住在纶年隔壁的那个女孩子，显然开着玩笑说。“难怪那么会演戏。”

“我知道两驮水以外，”小周站起来说，“另有原因，不那么简单！”

“确是不那么简单，”高雷立即还嘴，“我不在乎两驮水的琐屑，我却不能放松原则。我着想在大家生活的纪律。要不然我们干什么开这个生活检讨会！”

“得了，我们还是讨论重要的问题，”小主席乖觉的居然像母亲排解小孩子一样的微笑着说了。“我们就给周西同志的帐上记下两驮水。下次轮到的时候就由他一个人担当。如果不轮到星期天也就不去苛求了，虽然星期天是重要的日子。”

说到最后这一句话，她向小周，又向大家笑了，似乎含了什么深意。问题就算解决了。

“他们昨晚上吵架的原因，”现在老任告诉了纶年，真不愧为新闻记者，像一个新闻记者对人报告不上报的一种政治内幕，“哪会是两驮水呀？当真是争地盘。高雷先跟《抗战日报》接洽出一个新文字的开荒专刊，小周去建议出一个世界语的开荒专刊。给这一顶，连新文字的专利都叫日报的负责人觉得太不切实际了。”

“哈，”纶年插进来说了，轻微的笑了一声，“新文字，世界语，价值就全在实用啊！”

“所以叫我们的木刻研究会出了一个木刻的开荒专刊，昨天已经出来，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

“在报上辟这么一栏也值得那么争吧？”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老任好像笑他太不懂似的解释了，挤着眼睛，“在这边也是一块跳板，从之出发……”

“一匹马，后边跟着一个勤务员？”

“噢，”老任摇摇头，似乎觉得纶年又说得具体了，也就太露了，不像话了。

“新文字，世界语，”纶年想，“目的就在把复杂，艰深的改为简单，容易。现在他们这种钩心斗角，岂是这种文字写得明白的，岂是这种语言说

得清楚的，这才怪！”可是他只说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两个都天真得可爱，既然这样的明争。讨厌的是面上都笑嘻嘻的暗斗。”

“暗斗也不是没有，”老任说，摆起知道得很多而说不出的样子，随即补充了一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心眼太多。”

“大家都来多用些体力就好了，我想，”纶年说，厌听了这一套，转移了话题。“你看他们两个不是在那边通力合作的出了一个很好的开荒版吗？”

那两位同志早已把老任开的那条河与另外全体人开的那片海之间的那个“地盘”完全开发了，现在并肩着一团高兴的席卷一大角草地。

“谁的《私有财产的起源》？我把它捣了！”底下响起一个威胁的声音，是矮总务的声音。

“我的，我的，”老任说，站起来向声音的来处奔过去。

那本《家族、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原是像一只羊在那一片草原的中心，现在竟然在那一片海的边缘上，而且到了像从海里涉水而来的渔人的手里。它向老任的方向迎飞了过来，像一只白鹭。

庆幸老任的走开，纶年正向地上舒服的伸躺下来。忽然从一边的几个人的笑语声里跑来了小圆脸，拖着草鞋，一只手里提着一只袜子，一边笑着说：

“他们说这是我圣诞老人的袜子，梅同志，我也分你一点礼物。”

他就把袜子扔在了纶年的身边，一边靠近他坐下了系鞋子，那是棉线编织的草鞋式鞋子，由赤脚穿了的，一边解释着：

“刚才捣土到一半，忽然一只鞋子掉了，我就光穿着这只袜子。”

纶年顺手提起了那只袜子的尖头，把它倒提起来，倒空了里边的东西：一小堆土末和土块。

“噢，”纶年简直像失望了似的感叹说，“我以为从海里捞起来总该是些珊瑚啊，光润的贝壳啊，甚至于珍珠……可是不，那些东西长不起壳子，土才是宝贝，不错，不错。”

他就用手指轻轻的研着那些小土块。

“那我这次就赤脚踩在土里去，”女同志撒娇的对他说，一边就要动手脱鞋子。

“不，不，”纶年却阻止她，反而促她系紧点鞋子，仿佛怕它们摔到粗糙的海里去翻腾，随即自己觉得有点好笑的想了：“你这是什么心理！”

可是也是人情啊，他立即在心里反驳。他觉得自己今天很健康。而昨晚生活检讨会上另一个小波浪又接踵而浮现了一下：“可是星期六更重要啊！”

谁喃喃的来了一句，当他听了这个女孩子，昨晚的主席，排解那一场争吵而说的“星期日很重要”。

大家知道，连纶年也知道，这句话是针对谁，可是女孩子却得体的微微红一下脸，以一笑了之。

“还有乒乓球是否应该让大家打，尤其是会里人？”

这次纶年看清楚发言的就是老任。

“你总是私有观念那么重，”木刻研究会的果丁从旁批评说，“总是会里会外。”

可是俱乐部主任感觉得灵敏，马上理直气壮，同时也用抚慰小孩子的语气说了：

“你们自己不来打呀。刚才梅同志还不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打了吗？”

“他们”是她和马列学院的那个小伙子。纶年这才悟到晚饭过后，天黑以前，他们连他自己三个打乒乓而大家不来参加的道理。他想起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男与一女》。

一切都遗忘在集体操作的大海里了。刚才大家围起来帮女孩子化非洲为澳大利亚的时候，热烈的情形且甚于作任何游戏，而老任也就是最起劲的一个。

纶年赶快站起来，那一股潮水不知不觉间已经涌到脚跟前来，同时听到了哨子的长鸣，从身边那个女同志的嘴边，她手里已经拿起了一只表。

大家像下海游泳似的一拥而下去接替锄头。

这一次纶年前面刚翻开的黄土上滴了汗水。

这才是开荒的正文了，也就是至文无文。还有什么呢，除了锄头的起落，土块的翻动。惟一的事：谁的锄头从柄上脱下了，从外边换来了一把。一条弯曲的分线移前去，移前去。太阳底下，一片细长的交错的阴影让位给一片栉比的阴影，这是锄头在这一片单调与平板上所作的惟一的描写。不，锄头的目的也不在于描写，也不在于像一个网球拍展示接球、发球的优美动作，不，目的就在于翻土，翻过来一块又一块，翻过来一块又一块……是的，这不是游戏，更不是逢场作戏。这一片单调与平板要持久下去的，今天，明天，后天……

不，另外还有一点事故：纶年这一次碰到跟老任比肩，相形之下，不得不落后，只好赞叹着后者的体力强与工夫熟练——看他一马当先的赶前去了！可是这条分线又开始不整齐了。仿佛出于好整齐的洁癖，纶年加紧捣开自己这一面与老任那边毗连处的棱角，可是徒然。而他也随即发现老任只闭了那么窄的一面，三、四锄头宽！他简直生气了，要不是他忽然想起了去年初到而还没有去前方以前，在一个场合对一些搞文艺的学生随便讲话中曾经说过的一点：完整的作品是普遍性与永久性兼及的，因而用线条画起来，假设永久性是一条竖线而普遍性是一条横线，就是一个方正的十字，可以作一个整圆；畸形的作品不是一个扁圆就是一个长圆，不是胖了，就是瘦了。这个不管自己是外行而信口开河的比喻，他没有再考虑比得是否恰切，又移来比喻眼前的事情，就在好玩的感觉里消失了不愉快。

对啊，海统一着一切。

直到哨子又响了，让锄头给别人接过去了，自己在草上舒服的躺下了，纶年才捉摸到了海是什么，像海岸会捉摸到海，像面见于两条线，线见于四边的空白，像书法里有所谓“烘云托月”。可见比喻，不错，也只有靠比喻才形容得出那一片没有字的劳动，那片海。对了，是海的本体，而不是上面的浪花。浪花是字，是的，他忽然了悟了圣经里的“泰初有字”。这是建筑的本身，不是门楣上标的名称，甚至于号数。最艰巨是它，最基本是它，也是它最平凡，最没有颜色。至文无文，他想，他这些思想，这些意像，可不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吗？不，他不要这些，不要这些……

“老任这家伙真可恶！”底下有人嚷了，“他总是想一个人做劳动英雄！”

“这里又不是木板，”老任的声音，看来是回答木刻家果丁了，“开荒也用得着刻版画一样要好看吗？”

这些话，不管有无意义，也就是浪花，也就是泡沫。可是海不就是以浪花，以泡沫表现吗？或者以几点帆影，像在未匀画的山水里——不，不，他抑住了心的一个快乐的跳跃，收去了那几点帆影的一现，而代之以眼前的东

西：表现蓝天的白云。或者还是回到泡沫，回到浪花。浪花还是消失于海。言还是消失于行。可不是底下没有声音了吗？除了锄头和土，和草根的撞击的声音，土块的翻动的声音，除了谁的一声咳嗽，谁的一句哼唱，没有意义的哼唱，或者咒骂，不存恶意的咒骂。好的，这正是文化人拿锄头开荒的意义：从行里出来的言又淹没在行里，从不自觉里起来的自觉淹没在不自觉里，而哨子又起来给时间画下了一条界线。

“又该我们了，”纶年想，他的“我”也就消失于他们的“我们”。

到他这一班第二次休息下来的时候，大家决定先去招呼送稀饭，等第二班休息下来的时候正好一齐吃稀饭。

俱乐部主任，纶年想就叫她“小圆”，跳跃着跑去，可是她是向崖边跑去，并且一跑到崖边就向前喊了：

“稀饭！稀饭！”

“稀饭！稀饭！”山谷里好像有人模仿她的清脆的声音。

“呵，你的声音尽管高也喊不到那里吧，”纶年想，一边好奇的跟了过去。

可是再经过两声的叫喊，伏在崖头的“小圆”回过头来，看见纶年就对他说了：

“他们已经听见了。”

“他们已经听见了？”纶年问，愕然的，“这才是奇迹了。”

“小圆”茫然，不明白有什么“奇迹”。

纶年到崖头向下一望也就立即明白了实在没有什么奇迹：他们绕了许久才到的地方，原来就是在他们的窑洞上边。那边的一个棚子不就给那头毛驴住的？斜过来一点的厨房前的缺口也看见了。

“他们刚才出来过，”“小圆”解释着，“又回到窑洞里去了。你有什么东西要先送回去，让它从这里落下去，一定就落在你那个窑洞门口。”

“原来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头顶上开荒，”纶年感叹其有趣，没有想是什么意思。

送稀饭和碗筷来的是炊事员，小通讯员和管图书的那位女同志。大家就在一块儿吃，就像一个人手众多的农家。没有菜，稀饭是加了盐煮的小米稀饭。大家狼吞虎咽，似乎都吃得很有味，虽然还是老任开玩笑说了：

“从大米饭和面食吃到小米饭，又从小米饭吃到自己种的小米饭，进步了，进步了！”

纶年听了，立即恍然，倒并非恍然于眼前的情况向坏处的“进步”（也许倒就是进步），而是恍然于在这个山头上开荒是为了种小米。并不对数目字感兴趣，听他们一边吃一边谈论到今年开荒的数目字，文化协会已经开和还要开的数目字，他随便问了种小米的程序。

“现在先把土都捣翻开，”矮总务简单的给他说明了，“然后一边让一个人播种子，一边大家从后边把土块打碎，掩住壳子，然后等下雨了就来拔草，到秋天就是收割。”

“你看这么多原始，”老任插进来说。

“可是你要离开现实吗？”矮总务反问。

“我们是来做一个象征，”纶年想说，可是他现在连象征都不要，只是等着哨子再吹起来，好和大家一起再投身于劳动，没有字的劳动。

十点多钟，大家提着或者抗着锄头绕下山坡来的时候，斜对面山脚边突然呈现了一片新鲜的棕黄，向那边的山沟里隐去。

“这就是女子大学开的，”有人嚷着，“她们大概开到山沟里边去了。”

“难怪这一片就像旗袍开叉里微露出来的一角鲜明的衬袍。”

这一闪奇想掠过纶年的心上，没有出口，他为此庆幸，因为太没来由了，太不伦，而这边的女子又都是穿的军服！

“那些像山药蛋剥去了皮，”他随即说了，对走在旁边的俱乐部主任，用手指指远近山头上的一小块棕黄。

“他们说山头都变了颜色，”“小圆”回答，十分骄傲，“下次日本飞机来叫它们完全不认识地方，像你这样打扮了，外边老朋友也一定不认识你。”她看看纶年的模样，一笑。

纶年也看看“小圆”掩到耳际的乌发，笑着说，“可不要弄得更秃了，还是多长点头发，多长点树木好看为长远计。”

“河边现在那一片荒地，”果丁在旁边插进来指点着告诉纶年说，“是划给我们的菜地，还没有开，过些时你再到这里望去，也会不认识。你认不出吧，我昨天给你看的那块木刻就是刻的这一角地方，只是先给刻上了菜畦的图案。”

这一切都很好，都太令纶年兴奋了，只是自己，特别到后来，也许是因为累了，不时冒出来的一点想入非非，不伦不类，令自己生厌。像要有所摆脱，他在午饭前也下到河里去洗掉一身的泥土。他在阴凉的窑洞里，歇去一身的疲劳，待不住，到下午四点钟光景，过河一口气跑到文艺学院去找了亘青。

他在那一排教员住的窑洞底下的坡路上碰见了正要下来的亘青，他在那里停步，显得无可奈何的忍耐着听两位女同志（纶年认识是两位教员的家属）对他唠叨着什么。

“她们吵什么？”纶年跟他单独在一起了就问他。

“还不是那些鸡长鸡短，”亘青回答，显得十分厌烦，“谁把鸡吓飞了，谁把蛋拿走了，诸如此类。”

纶年这才注意到那一排窑洞底下差不多正好另是一排宿舍，鸡的位置。

“你跟我去看他们开荒好吗？”亘青撇开了那种无聊的闲话，征求了纶年的同意。

“你们这里下午也开荒？”纶年问了。

“因为要完成预定计划，突击一下。下午是三点钟开始。我右臂还没有好，暂免开荒，派定监督一部份女同学送水，现在该是送水的时候了。”

纶年很乐意去看看这里的开荒，他们就一同下到了那一排厨房前面。

一个女学生，一只手里拿着一碗小米饭，一只手里拿了一条小树枝，打着一头大黑猪，轻轻的打一下，那一团皮肉就发出一声“唔”，像打着玩。

“干什么？”亘青和那个女孩子招呼了就问她。

“这个蠢东西真该死，”女学生回答，“给它饭吃还不吃。”

恰好厨房里走出来了一个伙夫，挑了木桶，像要去打水，就笑她说：

“你拿热饭给它吃，它怎么吃！”

“噢，”大家明白了，可是女孩子还打了猪一下，发了她最后的一点小姐脾气。

“得，我们去送水吧，”亘青说。

“她们正在厨房里打开水，”女孩子一边说一边回转厨房，那里正传来一片女孩子的笑声。

纶年觉得很好玩的帮着亘青合抬一煤油桶开水，和另外十几个女孩子合抬的四桶水一块儿出发。五桶水治山坡上去，荡漾着天上的云影。

山坡上高高低低的尽是人，不像人，像放草的羊群。他们纷纷跑过来，一听到女孩子有几个高声嚷了：“开水来了！”

一个男青年跑过来给一个正在挣扎着上最后一级的女孩子拉一把。这就像捏一个橡皮的玩具一样的引起了一声尖叫：

“噢，那么狠！我这个胳膊不是锄头把呀！”

大家都笑了。

有几个男同学反而“慰劳”了送水人一些他们翻土得来的甘草根。

亘青和纶年也分到了一些。

“好得很，苦里带甜，”亘青一边嚼一边说。

“富有象征的意味，”纶年就回答，爱惜的玩弄着手里的一大块。

“你才真是象征派，”亘青笑了他。

纶年立即感触到了什么。唔，他想起了去年在成都跟未匀谈起了在她到成都以前他所看到的那一套汉口春耕运动的新闻片。她说她亲眼看了那一次预备照电影的表现。她说参加那次“春耕”的一些女子就像“黛玉葬花”，就取笑了她们一句“象征派”。她后来告诉了亘青，因此有了他今天的这句话。这又提醒了他今天早已经想说过一次象征了。

“同样的象征，”纶年说，“我们在这里做它却用了那么大的气力。你看我的手掌。”

他的两只手掌里指根处都起了泡，有一处已经破了，出了血。

“你今天也参加过开荒了？”亘青说。“这是泡，他们说，再过几天就变成了老茧。”

纶年很得意的觉得自己今天很强壮。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十四日

（选自《山山水水（小说片断）》）

评论

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

——译者序

福尔 (paul Fort) 的《亨利第三》与里尔克 (R.M.Rilke) 的《旗手》如有什么因缘，也许是全系于我这个译者的随便拉拢，而我还要哓哓于把它们相提并论，又简直像纯为了要把这两篇诗的译文印一个合刊本。可是它们——这两篇诗——在我这里或在我心上的遇合也不自今日始。远在十年前我从美国女诗人爱梅·罗威尔 (Amy Lowell) 的一本书 (忘记了书名了，只记得是介绍几位法国作家的)，从书中讲福尔的一篇里读到了《亨利第三》，后来从中法大学找出了收这篇诗的福尔的诗集《法兰西谣曲集》，把它译出了。过了一二年，又从法国舒姗·克拉 (Sussane Kra) 法译单行本的《旗手》读到了里尔克的这篇名作，由朋友帮忙参照了德文原本又把它译出了，当时我就想那一天把这两篇诗，照《旗手》法国译文和德国原本一样的分别而以一致形式来印两本小书，结果却只于 1934 年编入了印出后我自己很不满意，而现在早经作废的一本译品集，饱受委曲，在那里并肩局促在一隅。是啊，在那里它们就已经并肩过了，倒也不是全出于偶然：我当时就觉得有让它们并肩的理由。现在事隔七八年，也跟这两篇诗疏远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还是有话可说，也许反而更有话可说了。

当然不用说，谁把这两篇诗一眼看过去就都会看出相同的地方：格式先就一样了，诗而不分行，却又不是通常的散文诗，那大多是短短的，如波德莱的，甚至于玛拉美的散文诗。照形式上勉强分类，当然也可以说：它们是两篇叙事散文诗。

可是细看起来，它们在体裁上到底还有些奇特的地方。对了，这一段话正好像道着了：它们是“照各式的规律，或一般所熟悉的亚力山大体的规律所写成的，可是它们依从散文的普通形式，只有偶尔的用韵，用半谐音 (assonance)，才使这种体裁有别于抒情散文。……一种介乎散文与法国韵文之间的体裁，一种完备的体裁，它似乎协合了它的那两位前辈的相反的特性……。”这是比野·路易士 (Pierre Louys) 在《法兰西谣曲第一集》(1897) 序里说的话，也就是一般人讲到福尔的诗体所常引的话。自然它只是说明福尔的诗体。而福尔自己也在《法兰西谣曲第三集》自序里说了：“我寻找了一种，顺了感情，可以从散文渡到韵文，从韵文渡到散文的体裁：节奏散文就供给了这个过渡。……散文，节奏散文，韵文，渐成了同一个工具。……一切都系于节 (Strophe) 的音乐。”可是这些话至少部分的也就说明了里尔克的《旗手》的体裁。

不但如此，《亨利第三》技巧上还有和《旗手》相似的地方。就讲节奏吧，《亨利第三》第一、二段里重复着“窗帘都掩着，家具都沉睡着。”“再没有什么，黑暗追赶着四壁”；《旗手》里一开头也重复着说了“骑着，骑着，骑着，一整天，一整夜，一整天。”《亨利第三》里有这种句法：“是木头悲叹，是老橡树的灵魂，”与之相应，也就有《旗手》里的“是屋梁闪耀，是窗子叫喊”（自然，这也许只因为在同一个译笔下的缘故，可是我译东西的时候总是死板板的尽可能设法忠于原来的形式，原来的次序，原来的节奏的）。《亨利第三》和《旗手》里虽然用得多少不同的同样有闪烁的问句：在前者，“谁在法兰西国王的房间里？这个苍白是谁的？这些烂布头是我的，我出去了吗，瞧，还是这就是我，在那边？这是什么东西？”在后者，

“一个窗子开了吗？是风暴在屋里吗？谁碰门呢？谁通过厅堂呢？”这两段话里也同样糅和了幻景与实景，虚虚实实，迷离恍惚。这又是处理空气的手法上的相似了。这种手法尤其显著的见于这个巧妙的安排：《亨利第三》开头写我们中国俗语所谓“换朝代”时节的一切朕兆，亨利宫中鬼气森森的黄昏里御床上的呻吟，睡醒的呻吟，令人几疑是橡木的非人性的悲鸣，亨利第三见神见鬼的，实在是在幻想中，看着瓦洛亚朝十二王走马灯里似的展览，在炉火忽明忽灭的光里（这就像中国旧戏台上一些鬼在一团火烟的一点起以后，掩面而溜过去的情景）；一方面在《旗手》的后部分里，也堆叠了古堡的夜里如梦非梦的两三个场景。不错，连闪烁的火光两篇里也同样的善用了：在《旗手》里，“红光是沉重的。它躺在尘封的鞋上。它爬到膝上，它窥到合拢的手里。它没有翅膀。”在《亨利第三》里，“突然间，炉火一亮，拉回了它们（墙壁）。”“三个小小的蓝焰伸出回光去收割百合花墙壁的收成。”甚至于两篇诗里都插进了一封短信，嘉德林写给她的女儿，旗手写给他的母亲。还有，《亨利第三》简直是十足的电影（尤其像那些宫闱片），一景一景的穿插起来，也不时加入“特写”。《旗手》虽不像电影，可也是一景一景的展下去，节去了中间的连锁——这也是现代写小说，尤其写叙事诗的既成也是该有的一般趋势，因为尤其到现在大家受过看电影的训练以后，讲故事再这样供给许多可省的桥梁也许反成了障碍，叫人不耐烦。……

那么这两篇里该有一篇影响了另一篇吧？要是这样，又该是哪一篇受了哪一篇的影响呢？两位作者年龄相仿，里尔克只比福尔小了三岁，而里尔克年轻时代作罗丹的秘书也常在巴黎，也交了些像纪德一类的朋友。我不知道，目前也无从查考，他跟福尔是否相识，但至少也会片面的知道他，甚至认识他，因为福尔当时正独力创设艺术戏院，与当时称霸戏院的自然主义派戏剧抗衡，声誉极盛。可是不，里尔克是本世纪初才去的巴黎，而他在一个狂风的夜里一口气写出《旗手》的时候是在1899年。自然，在德国他也很容易读到福尔的著作，尤其因为当时福尔的诗名也已大著，且于先二年（1897）集了过去的诗作出版了《法兰西谣曲第一集》。比野·路易士在序上又给他阐扬了这种特殊的体裁，以后差不多就每年都出版一集《法兰西谣曲》，其中的诗都是用的这一种体裁。可是又不，根据我旧译文后所注的，《亨利第三》见于《法兰西谣曲第八集》，该集出版于1906年，这篇诗的写作及发表时间当远在《旗手》以后了。然而这两种考虑却并不能推翻这一个假设：里尔克写《旗手》的时候可能受了福尔的诗体的暗示，因为这一种诗体确是福尔的独创，至少是福尔所特别注重的体裁。其实这种体裁也只可以说别备一格而已，也决不是最理想的体裁，并不足以动摇严格的规律的诗体，正如自由诗体一样。里尔克生平也只用了一次这一种体裁。体裁如此，其他技巧上的相似处呢？到底又是谁影响了谁？虽然《亨利第三》写在后边，福尔写它的时候也许而且多分还没有读过那位当时并无籍籍名的奥国青年的《旗手》。可是也说不定，里尔克在体裁上受了福尔的影响，而又在旁的方面影响了福尔。这很自然。也许两方面都不相于，而只在几点上不谋而合，这也很自然。因为处在同一个时代里，同一个环境里，同一种修养里，处处都会有同感，而如有影响，也不知不觉的互相影响，如文化的交流与倒流，有时候来踪去迹是不可分而分也是多此一举。譬如，里尔克也就是纪德的《浪子回家》的德文译者，也译了许多瓦雷里的诗作，他们都是朋友。里尔克比诸福尔，甚至于比诸纪德，当然远不如他与瓦雷里相似，尤其在创作生涯上，瓦雷里从上

世纪末尾起沉默了二十年，到 1917 年发表了《年轻的芭尔该》和以后几年里发表了另一些诗而一举成为当代世界诗坛的一个大台柱，里尔克从 1913 年起也沉默了十年，到后来发表了《杜依诺哀歌》，写出了《给奥尔菲思的十四行集》而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诗史里的地位。——这又能说谁学了谁呢？可是里尔克在 1910 年左右写的《布里格札记》里说的写一首好诗要经过多么久的准备，要经验、体会一切生活，然后才自然而然的迸发几行，这与瓦雷里在 1920 年光景发表的《棕榈》中以“忍耐”开始的那节著名的诗句，又能断然说风马牛不相及吗？可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深深的互相连系着的”，歌德说（梁宗岱译文），我们多读些书也许会更发现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血统上有一个共通的祖先，更多的共通的祖先，而他们都是亲戚，因此我们更不会大惊小怪。同时代人，同辈人，尤其同趣味的友人中所谓“影响”，大率如此。

可是反过来，相提并论，也可以恰正是为了对照，而里尔克和福尔在这两篇诗上相反处比相似处更多了，而且恰好相反得非常有意义。

从一方面讲起来，《亨利第三》是取了诗中的抒情的方式，而《旗手》则取了讲故事的法则。前者低徊反复的时候多，像一个漩涡；后者一条线串下去，伸出去，像一道河流，虽然这道河流只见于似不相续的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前者可以说是织，后者可以说是纺。前者起于橡木御床，起于见神见鬼，终于御床上躺了小丑喜谷，叫大家疑神疑鬼。后者虽然除了内在的统一性，还靠那朵玫瑰花做了线索，终还是走了许多路：随了远征，也过去了许多天，许多夜；小法兰西人走了；史卜克将军见了又不见了；被捆绑在树上的赤裸的女子，被残杀的农夫的眼睛，显现了一下；敌人近了；随军女人由宴会中的贵妇人代替了；古堡，伯爵夫人与如梦的欢夜来了；旗手爱了；他投身在敌人的包围里了，死了。所以在戏剧与小说相对的意义上来讲起来，《旗手》近于小说，而《亨利第三》则近于戏剧。

不错，福尔不但在早年自己办戏院，到晚期也写过三两出戏剧，在巴黎的大戏院作过成功的演出，在戏剧里把他的诗的丰富的想象结合了如安德雷·安东（Andre Antoine）所说的“性格的深刻的研究，分析的锐敏的才禀，戏剧的力量”。《亨利第三》不是戏剧，但也具备了未加以发展的剧情，像是一个戏剧的胚芽。这里时间是一天的黄昏到午夜，地点是亨利第三的宫廷，人物也相当集中，情节也十分紧凑，在显得松松的尽是一片空气下。在这种不稳的“江山”跟鬼影一起幢幢而摇曳的氛围中，大家以为有野心的吉司公爵远在西班牙，却竟自天而降，从楼上下来了，神出鬼没，借了亨利第三的母后嘉德林的内应，勾结巴多雷米大血祭，箭在弦上，到公爵出去也就等于开弓了。因此，这里的剧情也到了顶点，当他在楼梯顶上与亨利第三迎面又岔过的一刹那，而当亨利第三气愤愤的跑到楼上嘉德林那里去，看了她写的信，两只手叉到她的颈边的时候，也可以算一个顶点。

而这种戏剧的空气又无非烘托人物。像莎士比亚的最好一些人物剧（《亨利第三》里说国王的影子幌来幌去，也令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第一场——福尔的艺术戏院也曾上演过英国伊利莎白时代的戏剧）。《亨利第三》里开头那一些小小的象征的方法（如常发疯的查理第六打碎百合花，查理第七重检百合花。又如吉司公爵的追踪夏理曼而失路），其经济处也就见于用一两个小动作刻划人物的方法。吉司公爵的机灵、厉害，不但表现于突然出现在深宫里，也就完全表现于他在楼梯口闪过迎上前来的亨利第三一边致敬一边

用帽子掩盖清亮的胸甲。嘉德林的能干而残忍，果然在她给女儿写的信上的几句话里表现出来了，而她的暧昧不明、变幻莫测的性格，更生动的表现于她写了“这儿一切都在阴影里，甚至国王的影子”，也就用笔“轻轻的抚弄”亨利第三伸到她胸前来的小手。主要人物当然还是亨利第三。他的最大的特色是无能，双重意义上的无能（impotent），而这一点就多么有力的表现于：“半伏在楼梯顶的栏杆上”，看清了卫士们都跟着吉司公爵走了，他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鸽子的哀咽”。这一点也多么有力的表现于：他接着爬上楼去却只跟写信的嘉德林一起发呆。看了嘉德林摊在灯下的信，看了非难他的话，明白了她们不利于他的阴谋，想不到有什么从大处下手的办法，他也就带了女人气的、猫式的狠毒，就用刚才被母亲抚弄过的手来预备掐死她，而听了她一声叫，他就马上抱头鼠窜了。不错，他只是片苍白，只是一片影子。而外边，从窗帘扬起处所展示的是一片悲剧的景色：“日没了，玫瑰天雪地。”他也未尝没有感觉，不，他非常不安定，他受尽了预感的折磨，也未尝没有意识到一个大动作就要在外边发生，而他只是回到卫士们都走了的空堂，回到鬼气森森的房间，在仅剩了一把而且还在摇曳中的像在瞌睡似的锁面前，又受惊于喜谷，又遭了他的轻侮。喜谷也就在三笔两笔里给描出了由宠幸而跋扈的中国太监式的性格，他提灯告诉大家说去“寻找一位国王”，而一会儿一听人家问起了国王，就很快的指鹿为马的指了吉司公爵。最后他自己睡在御床上，到亨利第三受了惊而慢慢下床的时候，就那么无赖的在地板上“拖着一条被”。可是喜谷的一切到底还是烘托的亨利第三。

从另一方面讲起来，表面上里尔克在《旗手》里较近于普通的讲故事，可是他不是在这里塑造几个人物，而本质上却更是抒情——更点触到一种内在的中国所谓的“境界”，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对于爱与死的态度，一些特殊感觉的总和。在《旗手》的铁马奔腾的基调中，处处闪亮着女性的温柔；肉体的透澈的享受与折磨上、强烈的结合上，高悬着清风霁月的朗静；在一起呵成的气势下，一贯的流溢着逐渐扩大出去的同感、同情，从不同的言语里听懂共通的事物，因此大家“变成了兄弟”，“仿佛只有一个母亲”，从异国人的未婚妻的玫瑰花分取一瓣，因而也分取了享受也分取了负担——这一种胸襟也就是伏的根或者芽，对于里尔克后期与宇宙契合，与宇宙息息相关的境界，也就与瓦雷里的名句“全宇宙在我的枝头，颤动，飘摇！”（梁宗岱译文）相似的境界，一如里尔克的同属早年作而表现得较为明白的这首《严肃的时辰》：

谁此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哭，
在世界上无端的哭，
在哭我。
谁此刻在夜里任何地方笑，
在夜里无端的笑，
在笑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走，
在世界上无端的走，
走向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死，
在世界上无端的死，
看着我。

这也是一个胚芽，尚待发展的似以自我为中心而实以天下为怀。

得。那是说得太远了，比这种更高一层的境界也常令人觉得太神秘、太玄虚，我们还是回到年轻的旗手，而这位旗手倒十足的有血有肉。这又是一点《旗手》与《亨利第三》相反的地方。亨利第三才总是一片苍白，一片晃来晃去的影子。《旗手》又在充满了行动这一点上一反《亨利第三》，那是一贯的无行动，充满了本该成行动的无行动。可是，《亨利第三》虽然不是静止的，静止里却涵满了可能的行动，一如梅特灵克的戏剧。像梅特灵克的戏剧一样，空白里比非空白里包含得更多，例如亨利第三半伏在楼梯顶上的一点，他和嘉德林一起发呆的一点，尤其是最后作为一全段而且还分成两节的这几个字：“午夜、……午夜的钟声来自圣谢尔曼·洛克绥乐亚教堂。”这里简直不再用文字了，而文字以外，在亨利第三的王宫以外，在亨利第三的心神不定以外，随了午夜的钟声，亨利第三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而无可如何，正开始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屠杀。直到临了这一句为止，读者的心旌倒也一直恰正像里尔克早年作《预感》里的旗子了：

我像是一面旗子被四方的辽远包围着。
我感到在来的风飙，我必须经历它们，
虽然底下的东西都还不曾动：
门还轻轻的关闭，烟囱里还沉静，
窗子还没有颤抖，尘土还很重。
我就早知道风暴而像海似的翻腾，
展开我自己，又缩进我自己
又抛出我自己，孑然一身
在大风暴里。

然而把《亨利第三》与《旗手》并列在一起也不是为了给它们比较高下，把它们的相同中相反、相反中相同找出了，我们就益发不能给它们分个优劣。可是事实上这两篇诗的际遇也大有差别。单独拿出来讲，声誉上《亨利第三》似不及《旗手》。价值上也许不同，如果你在这二者之间有所偏袒：一、从事人性的发掘；二、从事感觉的开发而渐进于一种哲学的缔造。不过，实在的原因恐怕还不是这两篇诗本身上的，而是在作者，或在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福尔从 1897 年起出版了三四十大卷的《法兰西谣曲》，这些所谓《谣曲》全不用《亨利第三》那样的体裁，也大多写得不比《亨利第三》差，而又每篇在法国都流行，真是家喻户晓，到处披诸管弦，因此我这个外国人如不听到一个第三国人的举例，决不会到那一堆浩如烟海的诗篇中去单独发现它（普通诗选里因为篇幅关系也难于收它）。里尔克呢，他生平产量就小，而用这种体又只写过这一篇《旗手》，而且又是独立行世，自成单位，虽然它的广泛流行还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

这里，从作者身上，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显然的对照。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夜，福尔的声誉盛极一时，在 1912 年，正如早先的魏尔伦与玛拉美一样的被法国文人公选为诗坛盟主或诗王（Prince des Poetes）。战后呢，虽然他在戏剧方面又开了成功的大门，可是诗誉好像在重新崭露头角的瓦雷里的光芒四射下变成了黯淡的朝月或晨星。而接着，在莱茵河那一边也像瓦雷里一样的吐露了里尔克的成功。自然，这个“成功”，并不是社会上的成功，如果说瓦雷里的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才是成功，里尔克简直就没有什么成功可言。这里的所谓“成功”宁可以还是指艺术上的成就，甚至于影响上的力量。当

然也由于民族性的关系，他的一些诗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在读众里或高级的读众里据说简直是一个轰动（sensa-tion），而英国当代的最优秀的，思想上最所谓“前进”的青年诗人也有些受了他的影响（这不再是里尔克与瓦雷里、福尔辈之间可能的或实在的互相影响，不确定的也许仅只类似的所谓“影响”，而是确实的福尔受之于英国伊利莎白时代的戏剧的那种影响，受之于前辈梅特灵克的那种影响，也是艾略忒受之于法国象征派的那种影响，也就是下一辈年轻人受之于艾略忒的那种影响）。斯梯分·斯本特（Spender）在他的近作诗集《静止的中心》里就显出他素所喜欢的里尔克给他的影响，例如约翰·雷曼（Lehmann）所指出的这一点，正是里尔克体验一切的主张的一点回声：

哦，可是骑上
整个颤动的人机器！……
哦，让它带去，而把
我的耳朵贴到它的永远女性的心头，
而接受它的跳蚤和它的一切罪过，
开发它的一切礼物
而什么，什么也不拒绝。……

而也早显出过里尔克的影响的奥顿（W.H.Auden），更明白的写了一首怀念里尔克的十四行诗：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病，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像一个庞然大物。

奥顿在这里就是想起里尔克沉默了十年以后终于在瑞士缪佐的一个古堡里写完了杰作《杜依诺哀歌》，写出了《给奥尔菲思的十四行集》。不错，奥顿在1938年在中国写的这些十四行诗更显然的受了里尔克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受之于里尔克的那些十四行诗的，而不是受之于他早期的那些诗，例如《旗手》以及上引的两首诗，可是里尔克的后期诗也跟一般诗人的一样，也无非是那些萌芽的成长与成熟而已。奥顿在上引的这首十四行诗里，也就是在中国，在如他所说“中国被弃”，“上海大火”，“奥地利死亡”，西班牙“特路埃尔重新被占领”的时候，怀念的是里尔克的沉默、忍耐，而终于有所成的生命史。而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大后方，即便在目前，更因为在目前的情势下，读了奥顿的这些诗也会不自禁而深受感动，尤其是深深的获

得安慰与确信。

可是话又说回来，德国士兵间所以在第一次大战里流行起《旗手》来，也许正因为玛恩河战役以后的后期战争中两军相持下感到难解的苦闷，绝望的苦闷吧。他们要的是作为《旗手》的基调的狂风骤雨，虽然里尔克，不但不像福尔一样的从1914年到1916年陆续出版鼓吹战争的小册子，叫做《法兰西诗篇——抒情战报》，又得“荣誉军团”大勋章，而且像罗曼·罗兰一样的远离着战争。《旗手》里的东征也正令人想起希特勒带了许多附庸国、傀儡国的虾兵蟹将的远征苏联。里尔克在这里却只是推荐充实的生活，与任何主义都不相干，并没有像法西斯蒂们一样盲目的歌颂战争。他展示得美的是有血有肉的充实、行动、强烈的爱与死。照这个情形来推测，纳粹军队里如果还有读书的机会，也可能又会流行起《旗手》吧。可是我们反纳粹的，反侵略的，不会也同感到强烈的行动、充实的作为之需要吗？海明威写西班牙战争的长篇小说《为了谁敲的丧钟》里当然表现了他比里尔克已较有所偏执，已上前一步而认定了一种特定的战争的意义，可是这部小说也不是很可以恰切的叫作《炸药手罗伯·乔登的爱与死之歌》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文学作品的普遍性与永久性。而讲起永久性与普遍性来，首先以我自己为例，我在七八年至十年前读译《亨利第三》与《旗手》的时候，对于它们所感觉的兴趣，现在还是感觉到，甚至更感觉到了，由于特定的时代，而中国的有心人，虽然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由于特定的环境，我想反而会比他们更感觉到《亨利第三》里的无可如何，继之以感觉到需要《旗手》里的痛快的生活，而最后，随了这两篇诗而抒发了感情（广义的讲来，任何诗甚至于别的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照中国译下来的字眼说），我们也会随了奥顿而想起里尔克以身作则所表扬的德行——借用纪德的话来说，“第一个德行：忍耐。”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昆明

（选自《沧桑集》，1982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安德雷·纪德的《新的粮食》

——译者序

— 一个结晶——一部分的乐园

安德雷·纪德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演变大可以拿来说明他的任一本重要作品的组成，反过来他这种演变也可以用他的任一本重要作品来说明，至少到某一阶段为止的演变，可以在某一阶段的作品里找到它的映影或缩影。道理寻常：一沙一世界，一即一切，沧海勺水，勺水见沧海，或用纪德自己的话来说，“艺术品是一个结晶——一部分的乐园。”自然这应用到任何作家，差不多全属可通，而再放大来看，艺术也无非“以特殊表现一般而已”。不过，纪德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他，正如以一篇《纪德研究》而成为此方面的权威，启发了所有纪德研究者的耶克·里维埃（Jacques Riviere）所说，“每一个感情都牵连全颗心”；在他，“爱一件东西就是，而且尤其是，爱

除了他的自传《倘若麦子并不死》和《日记1889—1939》那不在话下，因为这两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把他生命史上的全部演变阐明无遗，这里说的作品只限于他的创作。——作者注

见《纳蕤思解说》，《浪子回家集》的第一篇。——作者注

纪德在《货币制造者》里也借爱德华而强调了这一点。——作者注

其他一切”。而里维埃更恰当的在他的《研究集》中纪德篇的头上，用了纪德在《地上的粮食》里说的一句话作为题语，“我把我的全财产都带在身上，就像颜色苍白的东方女人，在她们的身上带了她们的全部家私”。里维埃的《研究集》里的纪德篇写在1911年，而纪德自己在1925年出版的《赝币制造者》里也就借主人公爱德华而说了“我想把一切都放进这部小说”。所以在他往往一本书里就包含了他的精神生活的全部的来踪去迹，哪怕表面上看来纪德的著作往往前一本和后一本完全不相同。当然各

书能解释纪德到若何程度亦有不同，而《新的粮食》正就是最足于解释纪德的若干部之一，而且因为出版较晚，又是把纪德的演变解释得最全的最小的一本书。那么，不是更方便吗，如果这本小书里还有些片断足以用来解释这本书的发展，也就解释了纪德的演变？里维埃说过纪德的“一个句子就包含了全部书的安排”。同时还说过他的声调(ton de la voix)就泄漏了他的灵魂，里维埃自己研究纪德就从文体上下手，结果十分成功。我们现在就索性推到极端(pousser jusqu'au bout——为了解释的方便，有些地方原都不妨推到极端)，就在《新的粮食》的开头部分找出这一段作为我们的公式：

在枝头雀跃的斑鸠，——在风中摇曳的枝条，——吹侧小白帆的海风，——在掩映于枝叶间的海上，——顶上泛白的波浪，——以及这一切的欢笑、蔚蓝、光明，——我的妹妹，是我的心在对自己讲述，——在对你的心讲它的幸福。

虽然意义上也有可说的，这一段引来作为公式的价值，主要是在于这里——尤其是前五句——所包含的节奏和运动，或如里维埃所说的风格和章法(composition ou maniere de composer)。

通常讲纪德的文体的都把他的发展过程分作早晚两期，早期终于《地上的粮食》，而即以该书为代表；晚期始于《不道德人》，而以该书与《窄门》为代表。晚期也可以直推到《赝币制造者》，而以该书为顶点，但该书似又可算是开了另一个时期，不是纯粹的第二期产物了。第一期书，如里维埃所说，“不管是诗的或思想的(ide-ologique)都是照内在的运动(mouvements interieurs)而具形”。把纪德的精神活动的姿态表现得最明显的也就是这一期的风格。而这一种“风格的美处”，里维埃说得好，“不在某一点，也不在某一个字，也不在某一个意象，而只在句法(Syntaxe)”。他的用字，他的意象，往往是平淡无奇，可是经过流动，就像小石子在溪水里非常生色，非常生动。也就从里维埃把纪德这一期中的“字句的运动”比作水流“充满了方向”以来，大家提到这一种风格总同意用“运动”来说，同意说它们“流动”(fluides)。而最能道出这一种姿态的还是里维埃自己的这一段话：

像早晨的空气，被太阳的影响一步一步的接触到了，渐渐的充满了一千种看不见的细流，一忽儿放纵，一忽儿缓缓的回转，这个灵魂在事物面前就如此注满了不固定。它感觉到它们的温煦，它一举一动都招来一番心乱。沉默的来去，歧异的趋势，抓住了它；它一任愉快的索回所摆布；每一道从外来的光线都在它身上唤醒种种轻微的回荡、冲动、抛弃、欲念，象征风在空中骤来骤去的踪迹；献身与引退；突进的爱情，随又被悔恨侵占；等待的踌躇；精微而随即放弃的倾向。这一切动弹，就是它们操纵了风格。……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也就是这一种境界，只是这里更充满着受感动的一颗心的悸动，或者甚至于流贯着颤抖、氤氲着不安定、期待、放任、矜持、生怯、低徊、逡巡、反复、摇曳、一步一回头……

风格如此，章法也相仿。题为“恋爱试验”的那篇所谓“解说”，每一段都重新开始，纪德在《贖币制造者》里也说要把小说写得每章都不借上一章的余势，而这部小说也就差不多写得有点像这样，而极端的例子还是非小说的《地上的粮食》，那本书里甚至“每一句都与另一句平行”，如里维埃所说，“每分钟书都在重新开始”。“一堆观念和感情”，也对的，可是就“无始无终”吗？我们也有理由和里维埃稍持异议，而认为其中还是有进行（Progres），只是一种波浪式差池的进行，或者螺旋式的进行而已。

当然用这一种描写全部风格与章法的话，来描写我们作为公式的这一小段文字有点称不起，可是对于这些地方，这个公式也具体而微了。分析起来看，这一段里前五句在安排上可不是一呼一吸，放出去，马上收回来，随又放出去，不断的重新开始吗？这些平淡的意象也就靠字句的流动而放光。它们的步伐也就是摇曳生姿。它们的进行说是断吧，实在还是续的，并不是乱堆在一起的，上一句里潜伏了下一句里的东西，像浮在水流里的木片，被一浪打下去，过了一程又出现了，也就像编织的缠花边（arabesque），意象相依相连，终又相成，得出统一的效果。有些字眼与意象显得是重复的，可是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跟先一次并不一样，另带了新的关系，新的意义。

这样的写法，虽然纪德并不存心跟象征派一样，照音乐的办法写文章，徒然的想用文字模仿声音的语言，因他自己在早年就说过：字句的波动而前进，“照有旋律的思想的曲线，藉一种微妙的相互关系”，但结果还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正如《贖币制造者》全部小说也就是如哈蒙·斐南台士（Ramon Fernandez）所说的，“一套小说批评的管弦乐妙构”（une magistrale orchestration critique du roman）。而《地上的粮食》就安排上说，也正如里维埃所说的有点像该书第四卷里翡乌索里（Fiosole）小山脚下，月光里那些情人的语声所作成的，松散而飘忽的，这种微妙的交响乐：

月亮从橡树枝间出现了，单调的，可是跟平时一样美。一组组，现在他们谈话了，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字句，我觉得每人都对其余一切人讲爱情，而不在乎是否旁的什么人有没有听。

《新的粮食》也多少有点像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安排（虽然纪德并不是写诗），也就是诗的，抒情诗的，因为抒情诗的进行决不是沿一条直线，而一个意象一个意象的，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的，像云一样一卷一卷的舒展。

而说来奇怪，这样的安排也可以说是科学的，自然科学的。斐南台士在他的《纪德论》里把纪德的这一个特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说得非常透彻，纪德读了以后也甚以其说为是，特别以此说为喜。的确，依照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判断是不该遽下，而应先通过观察、怀疑、不偏执、不肯定自

见《浪子回家集》。——作者注

见《安德雷·瓦尔特笔记》。——作者注

见斐南台士：《纪德论》。以后引到的斐南台士的话都见于此书，此书出版在1931年，与早二十年写的里维埃的那篇《纪德》同样是纪德研究的名著。——作者注

见《日记》页1046。——作者注

己没有证实的道理，让同情由一种批评精神来校正，于是乎踌躇，于是乎不断的重新开始。所以，例如《地上的粮食》，照斐南台士说来，那“就是一种真正的种种感觉的分类，纪德在那里从事于给这些感觉剥去它们的偶然的牵涉，为了尝试它们的纯粹的反响。甚至于这部作品的组成，在它的诗装之下也令人想起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精密的观察”。而《贖币制造者》里爱德华写小说的方法，也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除此以外，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办法，不断的全部的披露过程，不光是揭出结论，而还不遗弃命题。纪德最擅长写日记，爱用日记体作小说、游记，其原因，除了爱真挚，也还是这种科学态度。

正如诗的精神与批评的精神贯穿了纪德的作品，他的风格“是一种批评的风格”，斐南台士说，“批评自己的风格，批评创作者内在的步调（demarches），批评我们对于事物的觉识，因为字句就分析自己。而有时这又是诗的风格，总回复到最初的印象，字句的运动，不是向感觉转就是避开感觉的暗示。”

这样不断的重新开始，自然也就不免时常重复，可是第二度的出现跟第一度的出现不但总有些不同，且大多由无足轻重的地位，进到主要的地位，即使由主要的地位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也还是新陈代谢式的方便了，或者帮助了新东西的向前突进，因此层层叠叠的推涌前去，愈涌愈远，正如纪德自述他最初被他的表妹（就是他后来的夫人）拒绝了他的求婚，并没有挫折他，反而把希望带得更远。许多观念，许多感情，都一度潜伏，再度以更严重的意义而重见。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即以手法而论，在纪德的第一本书《安德雷·瓦尔特笔记》（Les Cahiers d'Andre Walter）里就写了瓦尔特准备写一部小说而写日记，记下过程，在稍晚一些的讽刺小说《沼泽》（Paludes）里就书中有书，而且书名也就叫《沼泽》。这只是一个芽了，若再提取几十年后写的《贖币制造者》里爱德华的为了写小说而作日记，也就把小说名叫作《贖币制造者》——那成了《贖币制造者》全书的中心，而《贖币制造者》又是二十万字以上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又如“超越前去”（Passer outre）的说法，远在1893年写的《恋爱试验》里就出现了，可是那时候仅露端倪，到几年以后写的《地上的粮食》里就成了重要的观念，到更后就成了纪德的中心观念之一，最后简直成了《新的粮食》的一个骨干。而在《新的粮食》里，纪德自己也就把“进步”，喜悦的“进步”，这一个观念溯源到《窄门》。自然到《新的粮食》里这个观念也就成了全书的骨干，因为“超越前去”也正就是“进步”。这也就是纪德的进步，螺旋式的进步。

老超越前去，这样的进步，表面上又自然会常常显得前后互相抵触。不断修正，不断扬弃（例如《地上的粮食》里不放过任何欲念的主张到《新的粮食》里遭了废弃，而他在那里另外提出了“选择的德性”），本就是新陈代谢的条件，可是尽管纪德不看重一贯，他在一切演变里比任何人都一贯。忽略了这一点，就易生误会。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弥尔敦·史丹斯布里（Milton H.S. Stans-bury）的英国（或美国？）先生在他的《今日

斐南台士说“可是”（mais）是一篇纪德研究文中最自然的句读（Ponctuation）。就是纪德的书名上也见出他对近于重复的喜爱：《藉口集》，《新藉口集》；《乍得湖回来》，《苏联回来》；《日记抄》，《日记新抄》；《地上的粮食》，《新的粮食》……——作者注

法国小说家》(French Novelists of To-day)一书的纪德篇里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可是在他委诸本能中，在这种灵魂与肉体不断的再生中，在他不解的渴中，这位《地上的粮食》之热心的巡礼者回过来悲叹一切的空幻，而扔掉了他的书。

如果我们没有了解错，这句话不是等于说纪德以为《地上的粮食》尽是废话，说了半天，结果是一笔勾销吗？而原书上怎样说呢？在前言里：

当你读了我以后，抛掉这本书——而出去吧。我愿意给了你出去的欲望……别把我的书带在身边……

在尾声里：

扔掉我的书；摆脱它，扔掉我的书，对你自己说这里无非是生活面前千种可能的姿态的一种而已。找你自己的姿式：……

因为他愿意

我的书教你关心你甚于它自己，——然后关心其他一切甚于你自己。

原来纪德在书里讲的道理也就是摆脱一切的道理，而“得鱼”就应该“忘筌”，本没有什么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地方。

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简直也可以说就由于这样的误会，纪德在他五十岁以后的小小十年里，引起了社会上的两次不小的风波，思想上，尤其是政治思想上两度的所谓“转向”。

首先，1925年的七月八日写完了他的大作《贖币制造者》，仿佛也就一下子摆脱了它似的，连等它在巴黎出版都不等，纪德就在八月十八日出发往刚果去旅行，去采集奇异的蝴蝶去了。在《地上的粮食》的时代，他还只旅行到了北非洲，现在是往赤道非洲去，更远了一步。这一次他带回来的收获却是一本《刚果纪行》(Voyage au Congo)和其后的一本《乍得湖回来》(Le Retour du Tchad)。他在这两本旅行记里揭发了殖民地人民被压迫的黑幕，帝国主义者当局的罪状。要讲点世故，纪德最好不发表它们，可是他好像觉得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发表了以来，他就颇受了一部分人的攻击，而获得了大多数有心人的热烈拥护。随了他在以后几年里大读社会问题书，马克思、恩格斯等等，而发表了《日记抄》，《日记新抄》，随了他参加当时的左倾青年的集会，大家就众口一辞说他“转向”了。

他自己则不承认《转向》，在一个集会上公开的说了：

请不要在这里说什么“转向”吧。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方向，我一直向前走着；极大的差异是：在长时期内，我只瞧见我的面前有着空间和自己的热心的照射。现在我却向着什么东西走去，我知道我的不确定的希望在某处组织起来，我的梦想正在变成事实……

于是他于1936年夏天到他的“梦想正在变成事实”的地方——苏联——去作了一次巡礼。虽然在完全与充满了原始森林的大自然的舞台非洲中部居反对方向的那块地方的人丛里，也有许多事情叫他感动得流泪，纪德在那里也得到了不小的失望，也许是因为事先的期待太殷了。他回来了，带来了一

史丹斯布里的《今日法国小说家》出版于美国本瑟尔凡尼亚大学出版部(1935)。——作者注

用黎烈文译文(见于他的《邂逅草》)，原被引于爱伦堡的《纪德的路》(该文见《一个俄国人眼中的几位法国作家》)。——作者注

本《苏联回来》——又是一本《回来》！世故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发表，可是他也同样抱了基督教忏悔式的什么都无隐的精神，还是发表了。这一次引起的骚动更大，因为被激起惊讶的不再是顽固分子，而都是敏感的有头脑的热心人。而针对了同阵营里骚然的抨击、挞伐，他索性发表了《苏联回来补》（Retouches a mon Retour de L'U.R.S.S.）。好，这又不是“转向”了吗？

纪德当然更不会承认了。实在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这也许只是诡辩或文字游戏，可是这正是纪德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他自己原是在《地上的粮食》里说过有福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地面上一点也不执着，而携带一种永久的热诚穿过多种经常的变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合乎辩证法——问题是，讲起辩证法来，这里好像是读用了它，也许正因为不“唯”什么，成了不断的翻筋斗。自然我们的地球上本来也无所谓上下，我们全是在某一点或面上相对的下立了标准，而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有可为。纪德在《新的粮食》里讲得果然很好。

断了奶的孩子却不是忘恩的，如果他推开他的母亲的乳房。

可是孩子也不能太早的断了奶啊。“超越前去”固然势所必需，可是也不能尽是用接吻式或蜻蜓点水式；“超越前去”必先自己先站住了脚跟。这里就牵连了某一特定阶段里的历史任务（mission historique），这里也牵涉了某一特定阶段里的现实问题。纪德在后期中口口声声要现实，他实际上却还是理想家。他太驯良了。尽管他在一生中对别的影响上起了不小摧陷廓清的作用，他醉心的还是建设，如他在《新的粮食》里所说的“我的精神，归根结蒂，还是为了组织而工作，为了建设。”他被苏联吸引去的时候也就在苏联开始建设以后的阶段，也就在他认为他的梦想被部分实现了的阶段。一个理想家总不容易放过任何看不过去的事物。如果我们局外人平心静气的来读，纪德在《苏联回来》和《苏联回来补》里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不过还是取了宗教的忏悔精神、科学的“一切公开”（tout ouvert）的态度。可是原认纪德为“转向，原庆幸他“转向”的许多人——自然也都是好心人——大惊小怪了，苏联当局也严厉谴责了，于是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原也跟纪德一样的充满了不容忍的感情。实在也不能怪他们，敌对的阵营里不是正利用了纪德的话来加强了反击吗？这也非纪德的初衷，他并没有因此就一笔抹杀了寻求光明的这一方面而反身投入另一方面而肆其破坏原阵营的工作。这可又怎么解释呢，除了说他是一个理想家，一个艺术家？不错，我们要说一个艺术家。艺术当然需要植根在现实里，可是艺术品究竟不是现实（这也是纪德爱说的），艺术世界里的尺度不能应用于现实世界，正如现实世界里的尺寸不能应用于艺术世界。参加行动对于艺术创作是有益的，可是在行动里就必须顾到行动的实际，参加行动就得沉下头来专心一意的追随或领导政治、政策、战术、战略。还是根据了一颗天真的童心或者相反的一种超然的艺术态度，在现实里若不是全然无用就是出乱子。譬如，艺术作品里，甚至于哲学思想上，尽可以如纪德早先那样的推崇“真挚的行动”的绝对价值，可是在实际应用上，就要看它的相对作用如何了。更如，在艺术作品里一个

斐南台士在《纪德论》中也说到，虽然他的书出版于1931年，远在《新的粮食》出版以前，更远在这里所讲的纪德所引起的风波以前了。——作者注

人尽可以发抒他把解放当作自由本身的精神，尽可以发挥“开始的哲学”（这两点都是斐南台士从纪德身上指出的），因为在那里端倪就可以独立，在做一件事情上就不同了，因为欲有所成，开始了必须守成，因为起事不等于成事，一步未了又跨出一步，等于废事。这里也牵涉了宣传与艺术的分歧。为眼前的实用起见，作家尽可以写标语、传单，可是，千万别以为这样就是在创造艺术（顶多可以说是正在从事将无意中丰富艺术的实际生活），要不然，明天忽然逼于现实的需要而必须抹去今天的标语、传单，必须写起完全相反的标语、传单来，心上就难免尴尬了。惟有表现时代的艺术品才有永久性，不错，可是也就在它表现到时代的深处，不在表现了瞬息万变、朝三暮四的浮面，而在表现现象，以意识到本质的精神。艺术如有什么实用，也许有很大的实用，多分看不见的，极少马上可以见效的，我个人在别处说过：“一管笔是一支枪（从事宣传工作者的口头禅），对的，可是究竟是比喻的说法，事实上不是一支枪，面对面当然抵不过一支枪。”参加过政治工作的艺术家当然会更深刻的感到这一点。所以说来奇怪，见解上忽略了历史任务的纪德，在生活上又无意中获得了一种历史意义（Significance historique）。这在纪德的情形下又不足为奇。“他是歌德一类的作家”，斐南台士说得好，“每一部作品在内部的价值以外，还代表一种文化的演变中的一个阶段，造成一种文化的那种发现与证实的过程中的一个经验。”纪德的《地上的粮食》，一本讲摆脱一切因袭的束缚，放纵官能的趋向，歌颂与自然的直接的来往的小书，虽然在出版以后的最初十年里一共只销了五百本，却正是一种时代的呼声，从巴黎的沙龙与俱乐部的窒息的空气中喊出来的呼声，或者向那里喊进去的呼声，也许是粗野的呼声，叫闻者都悚然而又雀跃，叫罗杰·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小说里的年轻人听了就相约而逃出巴黎，奔赴马赛码头，叫后一辈的小说家把生活或眼光放到纸醉金迷的巴黎以外去，甚至法国以外去，去 decivilise（摆脱文明），去吸吮生命的源泉，去接触原行，总之去生活而创作，例如马尔洛（Malraux），例如圣·狄瑞披里（Saint-Exupéry），例如桑宋（Chamson），也许不是我主观的杜撰，如果说他们也都是得了这一种呼声的启发。是的，纪德，若不是单独也当是与少数一些人同时的，不仅是代表了而且是启发了一个时代。而现在，他如果不是启发也就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当他第一度所谓“转向”以后，也正是许多年轻作家采取同一方向的高潮的开始，而当他第二度所谓“转向”的时候，大家还对他大张挞伐，可是到西班牙人民政府失败了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大家又怎样呢？也许最明显的例子倒见于英国，三十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主宰了一时代的左倾作家，都好像“回来”了，而总是“他们发现了”，约翰·雷曼（John Lehmann）说，“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对他们究竟不会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个共同的灰色笼罩了一切。”这又岂止在一个英

纪德自己在《倘若麦子并不死》中也讲到这一点。——作者注

见马丁·杜·伽尔（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蒂波尔一家人》（les Thibault）第一卷《灰面笔记本》（Le Cahiers gris）。——作者注

里维埃也说，他离开了象征主义，回复到人性，“给我们指了路”。圣·狄瑞披里的中篇小说《夜航》及桑宋的短篇小说集《山·水·阳光》（或照原名直译为《地·水·火·风》）已有陈占元中译本。——作者注

见雪曼的《欧洲的新文学》（New Writing in Europe），《塘鹅丛书》本（1940）。——作者注

国而已。这自然更不是纪德的影响，而是在这个时代里许多人所共同走上的道路，只是纪德恰好又走在许多人的前头。关于这些人，雷曼也就说，“他们的行动可以说并不是圆圈式而是螺旋式，他们有了一个很确切的进展”，他们增加了社会意识等等。这也正好是说了纪德，他自己在后来的《日记》里还是说几年的研读马克思不是白费，他进去了又出来了。然而，“转向”也罢，“进步”也罢，他还是一贯。虽然他自己不在乎一贯（例见《新的粮食》），虽然他再三说他自己身上的矛盾。纪德老爱讲他自己身上的互相抵触的根源，例如他在《倘若麦子并不死》里，提起他一出自北部诺曼第，一出自南部于塞司（Vzes）的母家和父家的时候：

要讲不同，无过于这两家了；要讲不同，在法国也无过于这两省了，它们在我身上集起了它们的矛盾的影响。

他常爱确立这南北两省的影响于精神的特点；南部明净，令人易感到官能的快乐；北部沉重，令人倾向于撇弃浮面而探索深度；后者适于基督教精神，而前者宜于异教精神。虽然在这里严格的讲起来，减如斐南台士所说，在逻辑上只能算是相反而不是矛盾。没有关系，纪德总还是在那里一再提调协或统一，直到1937年的日记里还提到说：

一种总想调协的要求折磨我；这是我的精神上的一个乖癖；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心性。我愿意照布莱克（Blake）所说的叫天堂与地狱通婚：“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你怎能调协这两个对敌者呢，就算在你自己身上。”我的朋友马丁·杜·伽尔笑对我说，“这是水与火啊。”从它们的通婚就产生了蒸气，

他甚至说：

大家坚执一见；唯物论者不知道他只有用了精神才否认得了精神，唯心论者又不承认他就是需要物质来思考。

不错，如上边说过的，纪德也不是由否定价值的认识上走向他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也难怪到1937年，就在讲了上述那些对立以后，他又说了：

这些冲突，我在外边遇到它们以前就已经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活动了。我认识它们，而也就凭我个人的经验，我才知道一个人在斗争里如何消磨了自己，如何白费气力。我长久在我的本性里相反的成分之间，维持了这种斗争，直到有一天我问了自己说：有什么好处呢？从此我就不再追寻斗争和一部分的胜利，而追寻了协调；为了我终于明白协调里的各成分愈相违，谐和愈丰富。同样，在一个国家，那是一个阴晦的乌托邦——如梦想一党压倒另一党；梦想一个极权国家，在那里被压服的少数不再能发表意见；在那里，更坏的是，每个人，全体人都千篇一律的思想。合唱队用一个声气歌唱的时

转引自德路（Elizabeth Drew）的《现代诗的诸方向》（Directions in Modern Poetry）美国诺敦书店（Norton and Co.）出版（1940）。——作者注

本来这种天堂与地狱一类的对立（不同于中国由道家发出的阴与阳的对立，那是不牵涉善恶问题的），都是基督教的影响之下看出来的，也就影响了西洋整个的精神活动，我们现在照日立转用来的“转向”原为 conversion，也还是宗教的说法（改宗）。而纪德当初倾向于共产主义，也还是出发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在1933年的日记里也就说了：“不错，这不只是文字游戏，在 Communism 里也正有 Communion”（圣餐礼或神会或共享）。——作者注

候,就不能再有什么和谐的问题了。这果然说得动听,可是也只有说说而已。天下这样的善意人自然不少,可是相反方面的野心家也就总不缺少,既然不能不有不相同。而现在呢,譬如,纪德从法国在1940年对德国停止抵抗以后,听说就居住到非沦陷区,可是《法兰西新评论》要在巴黎复刊,因为要发表他的文章,就发生了问题而搁浅了——这是现实。而现在德国军队开入了非占领区,我们也就由不为这位老先生抱了深切的担心。现实逼使人非此即彼,而我们相信纪德的痛恨纳粹主义还是而且是比痛恨什么主义都强烈。纪德向往的马上就得到的协调怕只有在艺术里可以开花。是的,还是让我们回到纪德早年所说的话去吧:

我常常自认我之所以从事艺术工作者,就因为我只能靠它而实现那些太相异的成分的协合。

也就让我们还是回到艺术作品上来吧。艺术作品调协相反的倾向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纪德的《浪子回家》了。浪子回来而他的弟弟出去。两个主题,诚如斐南台士所说:“造成诗的两重的厚度,每一个对于另一个尽了启迪的功用,而两者互相融化于一种音乐的沉默,那里继续着觉察不出的颤动”(或照我们的现成话来说“余音袅袅”),或简直就是一种音乐的和谐,画家在帆布上的调和色调,在那里“不但相反的超乎时间与空间,而在一种一致里调协了,而且和谐的力量在一个永久的主题上结晶了。”把这番话应用到后来的演变上,我们也尽可以说纪德在实生活上的两个不相同的“回来”——从刚果和乍得湖“回来”和从“苏联回来”——也惟有在《浪子回家》一样的“回来”里才可能得到调协。浪子回来而他的弟弟出去——这里包含了永久性,可是这不是尼采所谓的“永久的回复”。浪子的弟弟是年轻一代人,他如果再回来总是跟浪子不一样的回来,而他自然也有更年轻的弟弟。不错,明年的春天会再来的,可总是另一年的春天了,园子里的花木会一样的开花,可是多少总是改变了一点,增加了枝叶或者相反的衰老了一点,而衰老了一点也是让下辈多舒展了一点,总之,不能不算是进了一步。纪德的晚期内两个“回来”的戏剧,总是他思想史上的两大急剧而确切的激变,而我们也恰好在我们开头所引的那一段话里,那一个公式里,相应的发觉了首五句闪烁的字句以后,比较上是急转直下的最后三句的紧张与明确的节奏。

二 从《地上的粮食》到《新的粮食》

而这个公式不但说明了纪德的文体,说明了文体里透露出来的思想的演变,而且也说明了文体的演变——演变的两个阶段。

当初纪德第一度所谓“转向”的时候,曾经如上边所引的说过“在长时期内我只瞧见我的面前有着空间和我自己的热心的照射;现在我却向着什么东西走去”,这也可以说从空洞、不确定的境界转到了切实、明确的境界。与之相应,我们这个公式里,经过了前五句摇曳,闪烁的节奏里现身的斑鸠、风、枝条、海浪,经过了急剧的好像要把什么都放进去的拦腰一束,就急转直下,明白的说出了意义,——“是我的心在对自己讲述——在对你的心讲它的幸福”。可是这更清楚的说明了纪德从《地上的粮食》一类早期的文体到后期的小说的文体的演变。他的文体到小说时期变成了明确,简炼,干净利落,爽脆有力,每个字都有了它自己的个性,其意义不再系于字句的流动,

见《日记》页1294。——作者注

见《倘若妻子并不死》。——作者注

而流动也不再见于字句的表面，而到了深处，变成了看不见的潜流，代替了字句的颤动，看得见的只是书在流泻。这种可以说后期的文体如《贖币制造者》的文体，卸却了一切铅华，简直成了透明，达到某一种意义上的古典主义的造诣。可是至少早年的那种晨风式的流动还是会回来的，纵然多少有点不同，于是就有组织上与《地上的粮食》大同小异的《新的粮食》。这本小书简直是融合了两种文体，因为一方面其中大部分，尤其是前一部分，文体极似《地上的粮食》，而另一方面“邂逅录”和最后一部分却又正是小说时代的文体。

比较起来，《地上的粮食》里抒情的成分(Lyricism)多于冥想的成分(Meditation)，换句话说，诗多于哲学。而从《地上的粮食》到《新的粮食》，正如文体所表现的，也正如我们的公式里所表现的——从风花雪月到人——长长的岁月里修养上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因为纪德在这一段时期内已经从自传到了小说，从个人的享受到了对于别人的关怀。创作上既然召起了人物，纪德的“唯一的操心”，如里维埃所说，“从此就在于忠实的表现他们为时所发现的一切思想，他认出该由他负责的一切行动，一言以蔽之，讲他们的故事。”纪德早就只爱了“一个讲得好的故事”(unrecitbienfait)，因为，如斐南台士替他说的，“再没有一种文体比小说(roman)更变化多端、层出不穷，在那里诗应该协助，应该阐明，而不歪曲最日常、最平凡的现实。”这不但决定了纪德的艺术的途径，也决定了他向人生里的投身。他觉得“光是打开了人生，尝尝那里的多样性是不够的，还得经验这种多样性，像别些人一样的经验它。”因为纪德的理想小说，如他在《贖币制造者》里所阐明的，也如斐南台士给他摘要说出的“不是画的‘我’，也不是画的‘别一个’，当作唯一的人物的‘别一个’，由于赋给他的重要性和对他的熟悉而不同于别些人的，而是画的‘全体’，还不是反映于一个‘我’中的‘全体’，而是‘每一个’所表现的，所经验的‘全体’。”或者，换一种看法，照纪德早先在《倘若麦子并不死》里说的，小说家教他“关怀别人，跳出自己”。也就是这一种趋势协合了天下为怀的宗教心，使他倾向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者与小说家简直没有多大分别了，如果小说家是这样一个人：

我的心只为了同情而跳；我只藉了别人而生活；藉了代理，或者说，藉了通婚；我觉得我生活得最强烈的时候，也无过于当我避开了自己而变成随便怎样一个人的时候。

而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也就成了或者同时成了《新的粮食》里的一个中心思想。不错，《新的粮食》还跟《地上的粮食》一样的讴歌喜悦，教人放纵欲望，享受官能世界，接触自然，可是已经不如《地上的粮食》里那样的不負責任，例如幸福就有了个是否剥削别人的幸福的限制，而自然也往往只用来说明人了，例如说自然史是最好的人类的历史。《地上的粮食》的作者对于人生的经验其实还是很少，还不知道或者忽略了现实，例如只有到后来在

苏台(PaulSouday)在他的《纪德论》一书中讲到《浪子回家集》一书是纪德的最美的一本书，说它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其实纪德的每一本书都是诗与哲学的结合。——作者注

《贖币制造者》里爱德华说的话。——作者注

见《日记》页1080。——作者注

在这种地方纪德跟歌德的见解很相似，自然可以说受了歌德的影响，同时与两不相干的英国D·H·劳伦思也不谋而合，尤其是写《花与人》一诗的劳伦思，——作者注

《梵蒂冈的地窟》(Les Caves du Vatican)里才提到了《地上的粮食》的旅途上也该少不了的跳蚤、臭虫、蚊子,而《新的粮食》里的“轮番曲”,“出于抒情的表现”,在这里就让“邂逅录”,“出于事实的表现”,来代替了。《地上的粮食》和《新的粮食》写的同样可以说是初醒的境界,可是在同样的年轻的精神里也显出了年龄的并非徒增的痕迹。同样对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惊讶、赞叹,《新的粮食》的作者已经不如在《地上的粮食》里那么天真烂漫,不再那么的纯凭主观,而且不由纪德自己,充满了成熟而炉火纯青的睿智。《地上的粮食》还是一个孤独者的作品,到《新的粮食》里,虚拟的对象娜塔纳哀,那个纪德现在觉得悲凉的名字,换成了宏亮的“同志”。在《地上的粮食》里否定的精神重于肯定的精神,破坏的精神重于建设的精神,到《新的粮食》里也反过了比例。

从这些演变上看来,浮士德那样的追求无尽,在活人的纪德身上也找到了最适于舒展的一块突出的沃土。纪德的价值也就在他的演变上,在他的出名的不安定(inquietude)上,大家也就说他就在不安定里得到他的宁静(serenite)。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或者应该改过来说,他的每一本创作也就是宁静的一度结晶,一度开花,古典主义的理想之一度实现。自然开了花,他又超越前去了。“扔掉我的书”,他说,可是尽管实际生活上得了“鱼”就不妨或应该忘了“签”,艺术上却不能抹杀工具的价值,过程的价值,“签”的价值。尽管时过境迁,这一种结晶是超出时间的,因为它“开花在时光以外”。一种冲势,一种 elan,在纪德是素所心爱,在精神价值上当谁也珍惜。这里又见出了艺术的永久性。而《新的粮食》又正是在曲线的向比较上算正面的那一个方面转去的时期的一个结晶,因此里边也特别充满了明朗、阳光;上引的我们的公式,撇开了节奏,我们在内容上也就面对了“在枝头雀跃的斑鸠——在风中摇曳的枝条——吹侧小白帆的海风——在掩映于枝叶间的海上——顶上泛白的波浪——以及这一切的欢笑、蔚蓝、光明……”

三 一个遗嘱或一种福音

纪德起意写《新的粮食》也确乎就在海边,地中海边。那是远在 1922 年,在他五十三岁的时候。纪德写东西很少一起意就立刻写下来,如他写《浪子回家》。也许也就因此,因为长期的酝酿,他的作品才包含了许多时期的痕迹,尤其是《新的粮食》,这本小书从想写到 1935 年出版,算起来整整的孕育了十三年。在 1922 年的七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提起了他要写《新的粮食》。他是在叶尔(Hyeres)海滨,据他在那几天的日记里所描写的看来,正是他后来在 1934 年八月十八日所说的“一切都浴在一种璀璨的蔚蓝里,就像我在写《粮食》〔《地上的粮食》〕的时代。”从此到 1928 年写下了许多零篇。他就在那一年说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总以为不久于人世了,而常愿意把《新的粮食》当作一个遗嘱,那在我的计划里该是我的《地上的粮食》的一个晚成的副本。”当初他生怕这一本书会只成一个草

见玛尔洛的论《新的粮食》(该文有黎烈文的译文,见《邂逅草》并经《创作月刊》编者转载于该刊第三期)。——作者注

纪德在《倘若麦子并不死》里曾经提到他老早就有古典主义的倾向,说他当初和一个同样年轻的朋友,在首次出发北非洲以前,互相激励去追寻“平衡,完整,健康的理想。这我相信就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古典主义’”。——作者注

见《纳蕤思解说》。——作者注

案，“并不是因为我的思想改变了方向，因为许多事件使我的思想取了确切（precise）的方向。”他不勉强写，因为他一开始就要写得像《地上的粮食》一样的自然而真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有在不由我自主的时候才写得它。要比什么都不加以计划。”书终于写出来了，宛然一本福音书。

不错，虽然纪德劝人家不要听信人家的说教，他这种抒情的冥想对别人也总是一种说教。“我的心在对你的心讲它的幸福”，对了，他正如我们那个公式里到最后所点明的，他是宣传“幸福”，或者如他自己在1929年八月十四日所说的“扩大喜悦”。而这本小书的性质也更可以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它是什么——“爱与思想的交流”。而从这个交流中飞溅出了多少本质（matter）与表现方法（manner）都到了化境的水花，与每一颗都晶莹剔透，一如《纳蕤思解说》里所说的“结晶”，全都足于提高人的感情与思想。例子俯拾即是，要举简直就是抄全本书。纪德要把这本书写得自然而真挚，要举作样本，我们也不妨顺着原书的次序，信手拈去。这里就是充沛了一切的生之喜悦：

一切准备喜悦的组成，而喜悦马上在这里活了，蠢蠢的悸动在树叶中，分之于花中，即成其所谓芳香，于鸟中即成其所谓灵性与歌声，……你就称之为果，当喜悦成甜汁的时候，而，当它成歌声的时候，鸟。

随了“新的亚当”，我们就到了一个目的与手段合一，宇宙与自我合一的简直是乐园里所独有的境界：

新的亚当，今天是在命名。这条小河，是我的渴；这片林荫，是我的睡眠。这个裸露的孩子，是我的欲望。我的爱惜鸟歌以为声。我的心嗡嗡的飞鸣在这个蜂房里。可移动的天际，就做我的界限，在斜射的阳光下，你退得更远了，你渺茫了，你发蓝了。

基督教的利他主义在这里也变成了可捉摸的喜悦的源泉：

仿佛一斧砍倒了自私观以后，我的心里立刻涌出了如许的喜悦，尽够我用来灌溉另外一切的心了。

由不重目的而重过程出发也可以感到“刹那即永恒”：

于一切过逝者都是常在的，神并不栖止于对象，而于爱；我现知道在刹那那里尝永恒了。

我们随了这一句也就感到了风吹弦动式的感激：

空气的最轻微的一抚摩也在我的心里唤起了一声感谢。克己中完成肯定，在这里得到了服人的铨解：

凡是你会不会赠与的一切占有你。没有牺牲就没有复活。一切都唯靠奉献而开花。

从基督教引到社会主义的思考变成了官能自己的推理：

在别人的悲惨上发迹的幸福，我不要。剥夺他人的富足，我不要。倘若我的衣服剥裸了他人，我宁愿裸行。啊，我主基督你广开食桌！天国的盛宴就在于人人都邀请。

“与人乐乐”的平民化主张不再是一种浮夸的肆言，而成了一种真切的告白：

我爱野店的饭菜甚于华宴的山珍海味，公园甚于高墙围绕的最美的名园，我不怕在散步中携带的书本甚于最稀罕的版本，如果我要独自欣赏一件艺术品，它愈加美，我的悲哀愈加压倒了我的喜悦。

从这种神与人的相依为命里，我们也了解了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

创造主需要造物；因为如果他不创造什么，它就根本不再是创造主了。结果彼此相关，相依到如此密切，直可以说彼此不能相缺，创造主少不了造物，人需要神，不会胜过神需要人，我们想象到一无所有，较易于想象到无此之彼，无彼之此。

“天行健”或新陈代谢的永生观念又在具体的形象里化了一次身：

明日的喜悦惟有待今日的喜悦让位了才可以获得，每一个波浪的曲线美全系于前一个波浪的引退，每一朵花该为果子而凋谢，果子若不落地，不死，就不能准备新花，是以春天也倚仗冬天的丧忌。

一切在人或“仁者人也”的道理在这里闪耀着像一颗星：

没有什么不是非人性的，除了人自己。

热心的感染在这里也简直诉之于目了：

我燃烧得如此强烈，似乎我可以把我的热心传给其他一切人，有如传烟卷的火，而且这样只有使我的热心愈加抽旺了。

理想对于现实，对于进步的重要也得了一次雄辩的推尊：

多少年轻的意气自以为充满了勇敢而由于加诸它们的信念的这一个名词“乌托邦”以及怕明达人认为想入非非的这一种恐惧，一下子就泄气了。倒像人类的大进步并不归功于实现了的乌托邦；倒像明日的现实并非造成自昨日和今日的乌托邦……

从自然使命中我们也认识了多样性的美处：

松鼠不嘉纳蛇的爬行。乌龟和刺捐蜷缩的时候，野兔飞奔而逃了。

又如，除了世界人也会变的说服，死之恐惧的祛除，造成痛苦责在人类的证明，用苞衣由保护而自后妨碍芽的历史发展来比的迷恋过去的驳斥，眼睛“不要抬起来对天空而对地平线”的劝喻，“只要人助进，一切可能都可以实现”的信念，由年轻人接去了希望等于“延长青春”的感觉……在这本书里都阐明到纤尘不染的空明。

自然所有这些思想，这些感情，都是交织起来的，在这本书里，还是像在纪德所有的书里，尤其像《地上的粮食》里，一样的取了听其自然发展的方式，低徊，反复，似矛盾非矛盾，此起彼伏，仔细分析起来，还有线索可循，因为这是照纪德的灵魂的最真挚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所举的那个公式里的发展。而这本书本身里也就反映了从《地上的粮食》到《新的粮食》的演进。例如，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还多少更接近《地上的粮食》：抒情的成分重于思索的成分，爱重于思想，诗重于哲学。第一卷里的确还有几首用诗体写的诗而到后来就完全绝迹了，或者纯由“邂逅录”来代替了。就是“邂逅录”，它们原先在文体上与诗截然不同，正如《地上的粮食》与《不道德人》、《窄门》等截然不同，可是到第二卷起，“邂逅录”也逐渐变成了不再纯讲故事而用对话体一类的格式，而融合了故事与哲学甚至于诗的格式——也像到了纪德文体上的演变的最后一个阶段。又如，这本小书开头的情调或声调，还有点摇曳、闪烁、悸动、朦胧、像瓦雷里的《年轻的芭尔该》和《黎明》里的破晓时分的样子，然后太阳出来了，也好像小孩子产生了，周遭的一切都光华灿烂，直到第一卷临了，由“幸福而能思”的一点转到了第二卷整个的对于人生问题或者玄学问题的深思，然后到第三卷里又由“获得了确信，而摆脱了确信”，把问题解决了或者交代了，他重新来摧陷廓清或发挥阐扬起许多较实际的问题，于是到第四卷末尾，给大家具体的解脱了死的恐惧，揭

出了永生的切实想法，人类不但可以延续而且进步的信念。随了思想、感情，到后来，文体也比开头的那些流动的字句来得更明确，干脆了，例如跟上引的早先那些例子显然有了不同的这种字句：

诗，别再在梦里传写了，想法在现实里发现它。如果它不在那里呢，放它进去。

把所有结果子的树枝都拉下来凑你的手，凑你的嘴唇。推倒墙垣，打倒栅栏，不让小气的独占来在上边写：“禁止入内，此系私产。”

而，也还是在最后一部分里，纪德才把“在来的读者”称起了虽然是并不属于任何一党的断然的一声“同志。”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昆明

（原载 1943 年 5 月《明日文艺》创刊号）

附记 解释纪德，本来是极艰难而多分是吃力不讨好的上作，困难恰就如大家所指出的在于他把一切都说出来，因此不可能给他下定义。他又变得那么快。他又是一个艺术家而不像一个哲学家一样的建立了一个思想的系统。要抓住这样一个微妙的灵魂的变幻，就难免穿凿，何况像这样断章截义的挑出了一段文字来解释。不过让我们得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正因为纪德的变化太多端了，用这样一个公式来穿凿的解释起来倒是简单，明白。照纪德的思想推想起来，解释的文字也应该尽于当钥匙的作用，因为纪德自己引导人也往往只引到门口为止，留下的都是被引导者自己的事情。现在如果这里既是一条没有铸错的钥匙，读者也应该超越它，而去追踪纪德，甚或进一步而超越纪德。

凯瑟林·坡特的《开花的犹太树》

——林秀清译本序

无可奈何，应是大家读了这些小说以后首先感到的一个共同点。妓院里的姑娘，受尽凌辱，受尽剥削，挨了毒打与毒骂，挣扎了出去，还是走投无路，仿佛魔法有灵，居然又给召回来了，马上又得上楼去打扮，无可奈何。威蒲太太在艰苦中挣扎着，硬撑着，死也不肯让人家笑她的低能儿；结果却每况愈下，终于不得不把他送往救济院，满以为他该什么也不懂的，却不料他眼里居然滚下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可奈何。《偷》里的女主人公，意识到一生里充满了损失，像饱受了劫夺，手袋失窃后找了回来，偏又平白的挨到也并非全无道理的抢白，说倒是她偷去了人家女孩子的东西，无可奈何。罗拉对于革命感到了幻灭，可是还令人不解的、在那里克尽厥职，对于革命领袖，那个大胖子，每晚来打麻烦，聒耳的弹琴唱歌，厌烦死了，可是还不得不敷衍着听下去，一方面给狱中的同志偷送了一些麻醉剂去，原是为了减少他一点痛苦，偏被他一下子全吞服了，成全了他的自寻短见，以致在夜梦里还不被放过而被责为杀人的凶手，无可奈何。

自然，西方近代以来一切真足以长久感动人的短篇小说，差不多极少不是充满入世的哀愁的，莫泊桑的如此，契诃夫的如此，凯瑟林·曼殊斐尔的也如此。世界上喜剧当然并不比悲剧少。大凡喜剧就自满自足，不大要跑到艺术家的笔下去，所以过去文学作品里这两项的比例并不平衡。而短篇小说，更因为是人世的缩图，乃愈显出这一种情势了。目前这个时代确乎更不是一个舒服的时代，有心人的笔下怎样也不会假造出毫无阴影的快乐吧？

可是读这几篇小说，我们如感到若有所失，一定也会感到若有所得——失，在人生里；得，在艺术上。虽然，坡特女士在庄严的序文里说，艺术也就“像人生，只有在阳光下，在青青的滋长不息的世界中才最会欣欣向荣”，当然有道理，但是人生中之失，只要一表现在艺术里，无有不成其为得。人世的纠纷、扰攘、社会的脱节、全世界的转辗呻吟，集中到坡特女士的笔端，终还是结出了几朵晶莹透剔的小花，在它们的招展之下，叫我们不由不随之而兴叹：无可奈何！

至于叫读者徒唤奈何，有什么用处呢？能够叫我们麻木下去的心里起一些皱纹也就是用处。无可奈何，看起来似属天命，在坡特女士的全不迷信的笔下，用不着说明也叫人看得出，却全由人事。这些小说之所以不是空壳，即以此。也就因此，可歌可泣的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的抒发也就是人类希望的寄托。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

（原载 1945 年 11 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记：由此说来，这些作品的产生、发表、继续存在，亦岂仅是一种“偶然的幸运”而已。而它们在今日中国，居然得到一位肯下笨工夫的译者，不顾困难，加以译，几乎字字直译出来又几乎句句上口，不负原作的风格，这当然更非坡特女士始料所及了，可是也只是一种偶然的运气吗？

又：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生于 1894 年，为美国当代第一流文章家，毕生尽瘁文学，多写作，少发表，至 1942 年止，在《开花的犹太树》以外，仅只有中篇小说一集行世而已，但因之已在近十年来陆续获得了若干种小而可贵的文学奖。林译四篇仅为原集的一部分，但在内容上，各方面的都已经具备了一格。——作者注

大卫·加奈特的《夫人变狐狸》

——冯丽云译本序

世界上很少见这样一本奇书。最足以拿来比拟的自然就是《格利弗游记》，那显然也就是它的祖宗——连文笔上其间也一脉相承。也和斯威孚特的那本名著一样，其中的情景，却只奇在一个人进了两个标准完全悬殊的世界，加奈特这本小书，内容上，除了开头报告的一位夫人变了狐狸那一点既成事件，也就通篇都是眼前的景物。然而可怪者，谁读了都有一点禁不住，说一句中国夸大而陈腐得毫不惊人的老话，拍案惊奇。

做到这一点，自然要看工夫。有人甚至于还说加奈特的成功，全在于说故事的风度，自有几分道理。明明是开玩笑，你看他却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有时还凄凄恻恻。正因为如此，他才分外弄得人哭笑不得。可是这一点，推源其始，还是得力于他所继承的古典作风、古典艺术的节制。

也和古典作家一样，加奈特把这篇故事写得到处都非常近人情。希腊的神话往往比东方的亲切，也就在更能把人性推广到超自然的东西。以凡眼看神，神去了一些表面的条件，也就是人。所以这个神人错综而呈现的怪诞，还不如斯威孚特单把人，只是大小上不同的，搅在一起而表现的，或者《镜花缘》里男女地位颠倒所表现的，更显得离奇。蒲松龄似乎嘲骂人不如鬼，人不如狐，可是他笔下的狐鬼却完全是人，只是好人而已。加奈特却进了一步。他所以写得近人情，就是因为他让人有人道，兽有兽道，都合乎天道。他恶作剧，只在把人道和兽道拉在一起，不让各异而相处，而从这种花样里

反映出人世里的一点可笑亦可怜的什么。

这样近人情，也就是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起来，写实原是何种好文学作品所不可少的，而写实也不必就限用现实来写，女人变狐狸这样荒唐的故事又何害于写实。真切是写实成功的证明，也可说证明了作品的有内容。有内容自然也不愁无意义。

《夫人变狐狸》所以能令人啼笑皆非，大半我看倒还是由于内容或内涵，就是这点人世里的可怜亦可笑的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作者的意思有些人猜是：女子结婚了以后往往就变成了狐狸，这在不“自强不息”的女子大致是不太错的，如果她们不取另一条退路：专上厨房。逢到这种场合，一个深情的好丈夫起初往往还想法扳回局势，逐渐感觉到无可奈何，就隐恶，姑息，放纵，连自己也弄得有点莫名其妙，把一切标准都倒置了也仿佛能够安然，结果愈陷愈深，一发不可收拾，除非自己不但学会了佝偻着走路，而且彻底的做狐狸。从大处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泰布立克夫人，既是狐狸，以狐道来讲，泰布立克先生来干涉，就是违反自然，就是逆天，就难怪回天乏术，自作自受。然而还是让我们撇下超然的眼光而站在我们做人的立场来打量打量，也不必自限于夫妇男女的关系；那么我们不是就看见了乖戾的形成。叫人无可奈何的水之就下，可气又可笑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一个“变”。本来也就在一个“变”字上这本小书在做得这么妙。而艺术真做到了真切，往往正因为无为而无不为。可不是，若说这本小说太荒唐，太不相干，它却比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反而更暴露了我们的现实，现实里的基本方式，发人深省，像一面镜子。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

（原载 1945 年 11 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注：大卫·加奈特（David Garnet）英国当代小说家。父，爱德华，名编辑；母，康丝坦思，以介绍俄国小说出名。《夫人变狐狸》于 1923 年出版后，即连获英国最重要文学奖两种（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和 The Hawthornedon Prize）。——作者注

读沙汀小说《淘金记》

这本书出版了将近一年，还并未受到应得的注意，我却以为该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不管纸张恶劣，印刷模糊，而一口气从头读到了最后一页，第 380 页（全书连标点空格在内约二十万字）。

国内现在大家在困难的生活条件下竟写长篇小说，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只有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难免幼稚的理论才认为小说到现代是进入了短篇时代。世界上以写短篇而被公认为大作家的也只有两位，莫泊桑和契诃夫，而他们两位也各自写了短篇小说以外的较长的重要作品，前者写了长篇的名小说，后者写了多幕的名剧。汽力电力时代速度加快了，反而才有了空前的大邮船、大军舰、大飞机，世界像小了，个人的生活实在更广大了。所谓“江河小说”到二十世纪才特别发达。目前中国情形也无非表明新文学日趋于成年，作者渐渐有了运转大规模的气力。不管怎样，只要能把一大堆材料的千头万绪抓得住，操纵得住，组织或建造得起一个有机的整体，总不应太受小视。《淘金记》里写到的地方虽然只是四川的一个乡镇，场面却不小：一批地方上的恶棍，趁战争带来给后方社会上的大变动，“为了满足随涨的私欲”（见前年《文坛》上发表的沙汀的一封信），如何向一个原先产金旺盛的山

墩，一对富孀母子家的“发坟”，苍蝇逐臭似的一齐进攻，而又相互间剧烈的勾心斗角。他们的心机复杂得不下于道格拉斯飞机厂里的新机器，而得心应手的作者，却跟高悬在这些可恶的可怜虫上边的一个命运似的，稳稳的作了他们的主人。

当然，尽管小说家已经从原料中抓住了像命运一样操纵了全盘的总关键，已经有力量安排出一个有机的整体了，倘若他所创造的故事与人物只是两度的，仍然是不无可憾。只填公式，只描定型，正是我们许多小说的通病。我们大家抱住了写实主义的教条或者标榜着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不尝试也不容许独特而多样的创作活动，宥于一般性而忽略特殊性，耽于抽象的空架子而不接触到实地，结果产生出来的其实往往是从坏意义上讲的浪漫主义的作品。《淘金记》至少是给了我们以“一片”真切的“人生”。多少场面都非常活栩。例如在朝的劣绅白三老爷、白酱丹，和在野的流氓头儿林么长子，听说了烧箕背产金最旺，各自偷偷摸摸去找老工人了酒罐罐探问真情，不约而同的在一处碰齐了，就来了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场面：

“我怕是哪个！”三老爷首先显得惊异的笑着说了，“么哥呢！”

“怎么样，来不得吗？”长子多少有点着恼。

“怎么来不得？这里又没有喂得有老虎呀！”

掩盖过这些充满了心机、计谋和策略的谈话，不识不知的毛笨也在嚷着，半开玩笑的抱怨了丁酒罐罐。他是个新近才由么长子提拔过的光棍，所以他总时刻注意到他所应有的袍哥派头。

“咱们猫虎十会哨，”他急急的嚷着，“真碰齐了！我说等你吗，你说等我；可是袍哥，踩水来不得哟！咱们弟兄一是一，二是二……”

“你做什么？”么长子望着他爆发了，“总是肝筋火旺的！”

“他说他也在等我呢……”

“的的确确，”老头子证实着，“当真等了好半天呢，不过舵长子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那是确是实在的，一天出不了两把金子，我丁酒罐罐不姓丁了！只要你干，我钻山寨海总来一个；不来，不算光棍！”

没有人接上话，大家都忽然莫名其妙的沉默了。

这沉默的主要酿造者是么长子和白酱丹。前者满脸的大不痛快，有哭笑不得的光景。他觉得有点进退两难，后一个是一直浮着冷然的讽刺的微笑，细着眼睛，脸蛋看来更浑圆了。

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含意深刻的微微一笑。

“好，我先走了哇，你们细细谈吧！”

“都听得呀，又不是那个想谋王杀驾！”

么长子锋利的回答着，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留他。主要人物如林么长子，白三老爷，何寡妇，何人种，彭胖，龙哥等无不真所谓要脱纸而出。

例如，这是对彭胖的有趣的刻划：

替胖人刮一回胡子，往往要浪费他很多的时间，因为间或刮到一半的时候，肥人发出鼾声，睡着了。于是代诏立刻停下剃刀，叹了一口气，自己也在在一旁打盹起来了，等客人起来后再又重新工作。这一天没有例外，刚才刮着下巴，老骆就不能不停下来了。

当白酱丹同着何大少爷一道走来的时候，彭尊三还在打瞌睡，神情无挂无虑，非常幸福，三老爷忍不住笑了，接着叫醒他来。

“他的瞌睡像放在荷包里的呢！”他感觉有趣的说。

胖子打了个呵欠，揩揩口涎。

“你们才来吗？”他说。“我才闷了一会儿。……”

“才一会儿，”老骆叹着气，想道，“怕有半顿饭久了呢。”

“嗨！……你站着做什么哇？赶快来两刀刮完了滚吧。”

再看白三老爷吃荤烟素烟的地方作了如此的表现：

他们的误会很快就化解了。而在几分钟后，当主任重新和那游娼逗趣，假装抱怨着自己的年龄太老，说她并不真心爱他的时候，三老爷对于女人虽然早已感觉乏味，竟也很开心的打起合声来了。他把蓄着胡子的微瘪的嘴唇贴近她去，一面亮出自己的一枚缺齿。

“你看我年轻吧，”他说，“连牙齿都没有长齐！”

要说写实，这才当真做到了。

可是，对于现实有这样丰富而深刻的认识，沙汀却并不卖弄。小说家在小说里连篇累牍的作不相干的描写，不相干的议论，实是旁鹜，对于小说本身有害无益。而作者本人，就我所知，不管怎样艰苦，史诗式的克服困难，专注于艺术创造，在目前中国，几乎超过了别的任何作家（我记得他曾经写信对我说过“除了死，任何经验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都有用”）。他这本小说也似乎比别的任何小说都能屏绝旁鹜，而集中本题，以致针线缜密，一笔不苟，洵属形式与内容恰相一致的一出完整的戏剧。

文字也相应的不作任何卖弄，任何违反自然的标新立异，简洁到了一个难得的高度。节制里却处处洋溢着风趣；朴实里间或迸出一两个新鲜的意象。例如，“这镇上的居民能够安安稳稳睡觉，近郊的农民不必一到黄昏便把黄牛水牛牵到街上投店。”又如，“两方都针锋相对，把他们互相间的仇恨悄悄的暗藏在那些原来无关大体的话语中间，就如游击队的埋伏地雷。”白三老爷当然也会口出警句：“你看现在的事情怎样搞得好啊！甚么也不管，就是今天对一桶料子，明天对一桶料子，颜色越新越好。这个来给你一抹，那个来也给你一抹，以为只要刷过颜料，你总该不错了吧，嗨，殊不知天地间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夜壶还夜壶！”从这最后一例也可以见出作者的善用俚语。活用得很好的俚语，土话，也为本书增加不少声色。比这个更现成或许也更生动的例子也俯拾即是，例如，“一根灯草沾缸油，你是稀的，他是干的，沾来沾去，他总要沾你几个的呀！碰见鬼不烧纸钱得了事吗？”

读者读完了《淘金记》也许会诉说出一个大缺点：这部小说只把人黏住和局限在现实里，不给一点出路的提示。可是要使一部小说不止是一点反映，必须把握住现实，使一部小说表现出来的确实是生活。不然不是拖了不自然的尾巴，就是画蛇添足。事实上，《淘金记》到临了也未尝不令人就在“此路不通”的标记面前感到豁然开朗，有如悲剧在叫人流了眼泪以后或者喜剧叫人笑出眼泪以后所予人的宁静、清醒。一场乱搅在一起的人欲的全武行，不管胜者败者，由于连淘金也不行，远不如屯积别种更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更来得容易发财，而好容易把金矿抢到手的也只得放弃，白三老爷到头来发觉“煮在锅里的兔子都跑掉了！”虽然这个挫折只是一个波浪的迸裂，到第二个波浪里，至少这位劣绅，做了屯积，半年以后，得以把“他那签花烟袋也擦得比以前更放亮了”。大家走在自杀的路上，大势所趋，任他翻得多高，还是迟早都同归于尽。其完场实在也和这个段落的末尾一样，就像他老先生

所利用来帮闲的那个落难外甥受他自己的打发一样；当这个可怜的傀儡鬼一样的从黑暗中把头伸出来求什么的时候，“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了。而且从此他便不再觉得他还有个外甥。”（全书的最后一句。）

所以稍一回味，意义是不致就那么容易穷尽的，而且不止在反面。我向来认为发扬光明，黑暗也就自消了，现在虽然不推翻原见，可是也觉得暴露弱点，只要能深入本质，也至少坏不了什么事。沙汀居然制出了这样一面照妖镜，像X光似的照出了我们皮肉底下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底下的人性，居然从这样的腐朽里变出或提炼出了神奇，不是炫奇的把戏，而是有意义的艺术品，反倒使我们更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也不致对它绝望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昆明

附记：自从写了这篇短文以后（原稿写于四月八日），文字上我谨见最近《时与潮文艺》上李长之先生对《淘金记》的推崇。李先生和我，虽是朋友，却并未串通。他大致还不曾见过我这篇短评、甚至连听说都不曾听说过我曾写过它。李先生把沙汀先生的《奇异的旅程》（后改名《闯关》）拿来同《淘金记》比较，我却不敢赞同，因为前者是中篇小说，后者是长篇小说，而小说之分长、中篇，固不仅在字数多少上也。可以拿来并论的应是沙汀先生的新著《困兽记》。——作者注

亨利·詹姆士的《螺丝扭》

“道德的恐怖”这一个名词，时至今日，再也吓不了什么人。闹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听起来也正如这个意象一样的钝了，锈了）。这本书的开场里，讲故事人宣布了“可怕的——可怕”以后，就沉吟而不肯即吐，而自称抄录整篇记载的那位先生就冷冷的问了一句“那东西就这么样吓人？”如今看来，他确有理由这样说。的确，这算得了什么呢？——比诸前不久伦敦上空的“那东西”，比诸那些废墟里肢体狼藉的妇女、儿童的照片，比诸凄厉的怪叫声里饮食店里的一切玻璃器皿陡然显出的煞相和狞光，比诸你一拨开就好像拉动了炸药的火线，而顿时把整所房子都压到你头上来的一个寻常的浴盆塞子……这些算是从远方来的新玩意儿吧，因为我们中国抗拒了更久的异国入侵战争、本国人“围剿”本国人战争，遭受到的肉体与精神的恐怖，已属司空见惯，陈旧到不需多提了。要提近的，要讲新的，那么我们在享受“四季如春”的这里，目前一留意也就俯拾即是。比起来，那些有形的恐怖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比起了“那东西”更看不见的，形之于让同胞正因为替大家打仗而挖空心思来饿空肚子的这些年轻人的枯槁失神，形之于抛在地上的这么一个不幸者的最后一举手挥去，早已像他的将军一样急不及待的乌鸦，形之于“出”所谓“葬”的路上一具代用品棺材里叫出来的一声哀求，“放我出来吧，班长，我还活着呀！”

尽管显得离奇，西方人所恭维备至于我们的——对于自然的敏感，实在正一脉相通，他们所大惊小怪于我们的——冷酷。此中并无不可解处。不顾复杂的整体而局部培养与精练某种感官，实趋于颓废，而颓废若不曾及时匡正，终于会丧尽全盘的感性。美食家把品味力提细到居然想出了叫活鹅在火架上跳舞而集其烤脆的掌皮作成的那碟荒唐菜，就呈现了麻木不仁的确症。换一句话说，他丧失了对于整体的感觉。此所以说“玩物丧志”。衣食不足无从讲礼义，自然。可是到底又是什么造成的这种非人的极致，若不是先失去整体的感觉。最多或者说这里的因果关系也就像鸡生蛋蛋生鸡而已。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靠得住的，一个人决得不到什么解救，如果即便在生存竞争中，钝自己的感性。而感性正是我们必须首先重刷新起来的，否则我们休想理解故事中那位青年女教师绝顶精微的尴尬以及她最后道德的胜利。

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倘若我们中国人不赏识裂成两半的一般西方人的产品。艾德蒙德·威尔孙(Edmund Wilson)确实随了另外一些人断言《螺丝扭》里的那位女教师“是一个性抑制的精神病例，那两个鬼根本不是真鬼而是女教师的幻觉。”许多细节里都给指出了弗路依德说法的精确。性的意象的确似乎随处可见。那位二爷鬼穿了主人的衣服，而年轻的女教师实在对年轻的老爷非常好。男鬼既然出现在塔上，女鬼，那个前任，亦可以解释为情敌的女教师，又出现在水边。虽然艾德蒙德·威尔孙是有声望的当代批评家，这种分析却也反而使人糊涂。正如去年病死在英国的希腊青年诗人卡伯太纳基斯(Capetanakis)所说(据约翰·雷曼转述)“心理学可以解释事物，却决不能揭示它们的意义。”譬如说，认为不但线条，连颜色都有性的意义，推到极端，一幅名画也大可分析得毫无价值。所以还是斯梯分·斯本德(Stephen Spender)所作的结论较为近情理。他认为这篇故事可能是“一个不自觉的性幻想，或者亨利·詹姆士凭直觉加在了女教师的处境上一种较他原属意者更深的意义。”一点精神病的朕兆确乎在这里不难找到。而这种神经失常，对于人类今日所陷入的混乱，人类感性所遭受的大规模戕害或轰炸，也可以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多少年来横扫了欧洲的一种自杀狂，如果没有怎样感染到我们，这也不足为我们庆幸，因为我们多少人久已处到了一种更坏的境地。病究竟比死还离生命近一步。“整个的人”固然是中国过去大可以产出的东西。只可惜“行尸走肉”很容易成为把“整个的人”挖苦了的戏拟，而这种戏拟正是我们今日“大后方”的特产物了。“见鬼”，听听这篇平凡中出奇的鬼故事，也许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发聩震聋的作用。

这篇故事，毫无疑义，不像一本普通的“耸听小说”

(“thriller”)，用意并不在满足惊险感(sensation)的追求——那是另一个戕贼感性的法门。亨利·詹姆士在这里的目标要高得多。那位记载的所有主，实在大有理由如他确实那样的大大方方的承认那些听故事人开玩笑说的——这是言情的故事。正是一种博大的爱，才使得女教师如此魄力惊人的搏斗了恶。这篇故事十足可以拿来当例子说明罗维尔德·麦孙(Ronald Mason)先生在晚近一期《企鹅版新写作》里所称的“创造性的接受梦魇”，那是跟熬劲相辅了终足以“摧毁梦魇”。这点是否能应用到威廉·参索姆(William Sansom)以及其他卡夫卡(Kafka)的追效者所写的寓言式故事，大可怀疑。问题在它们是否够“创造性”。且不论弄玄虚决不是解决迷惑的办法，梦魇式描摹梦魇，离“创造性”的程度总还差一步。在亨利·詹姆士，这一点是确凿的：他采用超自然的东西无非是把自然中的基要的地方表现出来的更直接的办法。诚如他自己对于这篇小说所招供的，他志在“专一、明白和圆融”。他所尝试而成功的，有几分像布莱克所说的“从一粒砂里见一个世界”——如斯特朗(L. A. G. Strong)在同期《新写作》所说的一个“超越的大现实”的一种结晶作用。一场风波就如此，仿佛是，当真给抓在了一只茶杯里了。

现在，我们从感性上对于书中道德的意义有所警醒了，自然就能欣赏作为艺术品的这篇小说的动人处。作者在读者心中所引起的恐怖，正如卡尔·格

拉波 (Karl Grabo) 教授所指出的, 远比“任何显豁的有定限的‘恶’所能唤起的启示”为大, 实得之于他的暗示力。这样一来, 他就驾轻就易, 省了老套, 无须借助背景的怪诞不经、动作的狂暴、言辞的耸人听闻, 安排下了如此平静的一套价值的尺度, 他只消经空气的最轻微的一颤动, 就获致了一个震撼的效果。

于是故事的节奏美也再不能逃过气压计式的心灵了。格拉波颇为卓越的分析了其中动作的波浪起伏, 一波稍平后, 让感情喘一口气, 再作另一波更高的激荡。“这些间歇的调节”, 他总括说, “这种细节的选配, 在量上也在质上, 每一个高点藉以凌驾前一个高点, 从不使读者失望而不仅仅超越他的期望的——一直可以拟诸一部交响乐的演奏, 其中的错综变化, 其中的此进彼退, 都协调和递换得拍合最后最高的效果。”而斯本德先生, 正如一位诗人自然会有的, 又发现它, 跟《诗人的信件》一样的, 有一种“难能可贵而纯粹的诗情, 令人想起格路克的音乐”。如果你有一副赏识舞蹈的眼睛, 你也可以从那些场景中发现许多对称变化的花样, 这一边和那一边互相映发, 一层比一层更加强烈。这篇小说愈捉摸愈有所得, 真仿佛永无止境。

然而你掩卷了, 就像从一场演奏会里出来了, 你不会感到, 对于善的感觉因对于美的感觉磨快了而相应的有所钝。恰好相反, 你会越发愤慨周遭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也正就是这一点效果才使得这一篇故事, 如一般公认的, 超越了一般恐怖贩子的货色, 即使就在惊险感制造的领域以内。它的恐怖宁在于它的内涵。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原载 1945 年 11 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注:《螺丝扭》今日在亨利·詹姆士的小说当中已成最流行的一本。但他自己也不会预料到, 在几种文库以外, 还会被收入美国最通俗的《口袋书》(Pocket Books) 的选集。文字决不是易读的, 虽然还不如他晚年的那一两本里的纠结扭曲。这种文体虽然过火了, 跟这本小说里紧张得叫人咬牙关而又入微的情调, 倒也相称。

最近一期《时与潮文艺》转报导法国文坛的一文中有一点小疏忽。它说法国青年已经嫌普如思忒太微妙, 太俗气, 他声誉没落正如亨利·詹姆士。它所根据的报导我也见过, 那里我记得说普如思忒已被这一代年轻人认为是“俗气一点的亨利·詹姆士”, 而亨利·詹姆士正受他们的崇敬, 跟瓦尔特·佩德差不多。一时的风气自然不能太重视, 可是事实也不妨说说。据去冬艾·威尔孙的报告, 美国文学青年都读詹姆士。作者到晚年, 书出了无法销, 今日因美国的金属版被熔掉, 伦敦的存货被炸掉, 书又很难觅。美国去年, 就我所知, 重印了他的一本长篇小说, 编印了两本中篇小说集, 哈佛大学的麦绥森教授还出了一本讲詹姆士的专著。“今日,” 威尔孙说, “詹姆士在读众心目中活着, 正如他身前倒也许从没有活过。”——作者注

桑敦·槐尔德的《断桥记》

——黄惟新译本序

这本小说里的大事件, 从外表上说来, 就是桥断。十八世纪初, 秘鲁山间的一条索桥有一天忽然断折, 抛落到底下深沟里五个过路人, 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作者在开章就这么轻轻的一句把事情交代了, 以后也只用一句描

写了当时的情形，因为断桥事件本身在意义上并不重要。

亨尼泊教友可不这么想。正不下于那些一听说桥断就闹得满城风雨的利马人，他以为这一定出于上帝的意旨。不过他跟那些庸人不一样，他决心对他们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它。他敲遍了利马市民的家门，搜访那五个大人小孩的事迹，花了六年的工夫，通过了一切困难，好容易编成了一部煌煌巨著。可是在结论中他只是模棱两可的认为同一件桥断的事故一方面把恶人摧毁，一方面把好人拔升天堂。这是谁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的搪塞，难怪叫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恶人蒙德迈侯爵夫人和比奥叔叔，他也不知道大有可能却正是好人。结果他又遭遇了原先暗里试过一番的小实验所给他的嘲弄。他曾在一个疫病侵袭的村子里调查出一张统计表，不但证明不出恶有恶报，却反而证明了上帝偏叫好人遭了殃。那一次的发现，他偷偷的撕了扔在太平洋里。这一次的落到了法官的眼底，就不能放过他，害得他挨了邪说惑众的罪名，陪了它在大庭广众里一块儿焚化。他以身作则也正好证明了上帝的不公正。他以身作则，却也出于嘲弄的，证明了另一点不可测：他满以为没有人相信他的菩萨心肠了，而刑场的人众里竟有许多人相信他，因为他深受他们的爱戴。他以身作则，尤其是，非他自己所知的，不曾白费，而恰好对照出了全书的意义。

原来，那五个大人小孩，正如亨尼泊自己，都是好人。不但如此，尤其是那三个年龄较大也就较主要的人物，蒙德迈侯爵夫人、比奥叔叔和哀思得班，都是经过了由爱而来的最深的磨难而豁然贯通，不再执着，不再无意中放不下自我，而扩大了爱，正在作出新生活的开端。就在这个开头，他们可恰巧碰上了桥断。这怎么解释？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善恶报应在佛家也登不上大乘的台盘。意义在大家走到了一条桥上，桥发生了意外，自在所不计，何况成败也很难说。那五个大人小孩在一个共同点上崩溃了，可是这也正好叫另外那三个与五个死者关系最密切的生者改变了——哀思得班和配碧达的保护人、比奥叔叔一手造就了的名女优亦即亥米的母亲，以及蒙德迈侯爵夫人的女儿。堂尼亚·克莱拉改变了厌恶母亲的态度，老远从西班牙跑来找了马利亚嬷嬷；卡密拉不再自陷于绝望，而从田庄上跑来了帮助马利亚嬷嬷；她们三个走到一起。这位慈祥的女修道院长不但顿悟了念念不忘道统的得传，实属无谓，而且明白了就是错误在爱中也不会久长，尤其到最后，她因而得以作了总结：“即在此刻，就几乎谁也不记得哀思得班和配碧达，除了我自己。只有卡密拉还记得她的比奥叔叔和她的儿子；这个女人还记得她的母亲。可是不久我们就要死了，那五个所留下来的记忆也就要离去人间了，我们自己也将是被爱了一会儿随即忘却。可是爱就够了；所有爱的那些冲动都回到引起它们的爱。对于爱即使记忆也并非必要。世界上有一块生者的国土，也有一块死者的国土，桥即是爱，那是唯一的存留者，唯一的意义。”

如此撇下了那条具体的桥，作者就带了我们走上这条抽象的桥。这个联系不但贯通死者与生者，而且融合了一切宗教精神，实不仅统一了基督教精神而已。布赖克牟（R. P. Blackmur）在去年的《偏向评论》（Partizan Review）夏季号上批评托·斯·艾略特，说应该把他的“宗教是共同的秩序与信仰”倒过来改为“共同的秩序与信仰即宗教”。这用到此处正好合适。艾略特若干年来似乎认为救世唯有靠复兴早已过时的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里的一个保守的宗派。他的深思只使他站在形式上，反不如桑敦·槐尔德抓

住了基要的精神。爱·摩·福思忒(E. M. Forster)也似乎不是艾略特那样的深思者却凭直觉也能(虽然原来并不是针对艾略特的)给他一语道破:“秩序是一件从内演化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件从外强加上来的东西。”而宗教精神固无往而不通的。艾德蒙德·威尔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中说过,“真正有道德的深知灼见的天才发动得了任何引擎的马达。”他提到了(法国的班雅曼·克雷缪似乎比他先提到)普如思忒在他的小说里讲过的道德义务:我们仿佛在前世里结下了宿债,以致在地上本无必要而自己一定要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例如在一位艺术家,“二十次重开始写一段文章,也许终被人赞叹起来,惟有在他的尸体被虫蛆吞噬以后了。”这一点,威尔孙就说,实可以引用到“看不起现世的便宜的每一种道德的、美学的、或智力的热情。”他接着讲槐尔德的《天国是我的目的地》中的宗教倾向,用在基督徒乔治·布拉希(Brush)身上固然可以,也未见得不可以用到社会主义者辛克莱的场合。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槐尔德就在这本《断桥记》里也已经像普如思忒一样的触及了这一点。请看,在卡密拉兴高采烈的下场了回到化妆室,遭受了她的保护人亦即老教师的挑剔而痛哭了一场,两个人随即又彻夜钻研,捻逗戏里的情节与对白以后:“这两位想讨好谁呢?决不是利马的观众。他们是早就满意了。我们来自一个叫我见识过种种难以置信的优美标准的世界,我们依稀还记得不再受我们所抓住的种种美点,而我们就回到那个世界去。比奥叔叔和卡密拉·波理晓尔所以自苦,是努力想在秘鲁建立起卡尔代隆先他们前往的某种天国里的一些戏剧标准。”这也就是宗教精神。

可是作者的理解也犯了基督教兴起以来西洋观念里的一贯的错误。他也见外所谓“欲情的爱”。“这种爱”,他说,“虽然能扩张大度与周到,虽能产生憧憬与伟大的诗境,仍然属于自私的最敏锐的表现。”其实到最高的境界,欲情的爱并不妨害更大的爱,而只有助进更大的爱;它如有什么毛病,那就该在停滞,也就是执着。基督教硬把人分成灵和肉,去肉就灵,而教人只“给”不“取”。劳伦斯作了反驳,不主张光是“给”,而是正因为斤斤较量于“取”,结果实在又不见得能做到他理想的契合。里尔克似乎并不歧视欲情的爱,只是偏重在爱而不在被爱。这已经高出了一等,在爱的态度上原属如此。自然,基督教也明言想“得”的只有“失”,可是“得”也应不致认为非。给了无所得,固然自强不息者也应不致认为失,可是给了且得了只有更增加、扩大和提高“给”。至于自己不争气,经不起顺利,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执着正应解释为进步。

所以作者从这个故事里抽出来的中心,那条抽象的桥,该题上“仁”字,该题上“智”字,实不如让“见”者自定。尤其在文学的立场上说来,这条桥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的真实性,轻松的文笔下撼到灵魂深处的悲剧式的紧张,荒诞的表面下透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正如亥米的母亲临别送给他以备他在夜里睡不着觉起来好看看的那块会在黑暗里发亮的小宝石。而讲到这些地方,只有让书自己给自己来介绍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原载1945年11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注:桑敦·尼文·槐尔德(Thorton Niven Wilder)生于1897年,曾从

1906年起在香港住了三年,又在上海住了五年,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先后任两地的美国总领事。1914年回美国预备进大学,1918年被征入伍。

战后进耶鲁，1920 年毕业，又于 1925 年在普灵斯敦得硕士学位。《断桥记》1927 年出版，出版后立即被公认为现代小说中的小杰作，风行一时，1928 年获普里泽小说奖，居该年度畅销书小说门第一位。近二十年来美国历年小说畅销书第一位至今未被遗忘而仍被批评家一致推崇的，在 1939 年的《愤怒的葡萄》以外，几乎可以说仅此一本而已。槐尔德还写过一些小说和一些戏剧。他前后有两部戏剧都得普里泽戏剧奖。